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重庆市一级期刊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0.1>

9 772096 337247

2024/ 1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本刊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2023年10月修订）反映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敬请作者在投稿前仔细阅读、对照处理，以使稿件经制度化流程得到更高效率的办理。

一、常设专题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三、具体要求

（一）导向。稿件须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用学术讲政治。注意防范具体表述、引用注释或参考文献、图表中的话语歧义与隐形意识形态风险。我刊在审编校全程中对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稿件实行“一票否决”。

（二）选题。立足宽广时空视野，及时回应党和国家战略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角度新颖、力求前沿，坚持大统战视角，立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统一战线议题作出使读者有较大启发的研究，避免“就统战谈统战”。

（三）立论。立论基础坚实，问题提出部分应包含研究背景陈述、文献述评、创新点阐述等内容。要有精到的文献综述，开门见山地指出所研究问题、理论价值和政策依据、现实意义。重视援引前沿成果（含正文论述），且实际引用了大量的期刊前沿文献。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3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不少于10条，同时注意回溯三年以上的代表性论文。

（四）论证。论证中注意材料支撑，使用丰富、可信、有说服力的论据，避免泛泛而谈。题目、摘要、关键词、图表应做到规范、简洁、清晰。

（五）文字。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朴素的文风。表述符合语法规则，主谓宾结构清晰，无病句，无文字差错，无逻辑错误。请逐一仔细核对原文，如发现问题较多、学术态度不端正的，特别是如在编校中发现文字硬伤、低级文字错漏情形，即使已经审理录用的稿件也将作退稿处理。

（六）注释与参考文献。注释使用尾注体例。引用各类文献时务必核实原文，确保准确性。参考文献体例详见《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https://mp.weixin.qq.com/s/kv8cyCnRcp7QbkyXlJeX0g>。

（七）篇幅。不少于12 000字，论述深入的优秀论文篇幅可达1 5000~20 000字左右。

（八）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一般不高于15%。作者在投稿前应明确作者顺序（依据作者的实际贡献），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九）审稿周期。审稿周期为一个月。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审稿流程：一审→二审（含专家外审）→三审。

（十）其他约定。对契合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的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

（十一）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十二）联系方式。电话：（023）62874725；微信公众号：[tyzxyj](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开放获取：<https://cpsy.net.cn/?Tongyi/Zhanxian/>。

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详版请见本刊微信公众号相关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年第1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委：王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俊
李捷 杨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俭 张建 张献生
陈纪 陈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相德宝 袁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长：夏晓华

执行主编：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年第1期（总第43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8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专题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01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源”与“道”

——一个基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 / 黄天柱

26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 / 刘志礼 魏梓桐

统一战线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38 团结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合形态与实践路径

/ 戴洁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52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与话语构建

/ 樊士博 白金艳

65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术阐发与政治建构 / 魏崇辉 王悦

- ◎ CSCI (2023—2024) 扩展版来源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 79 中国国家统一进程中反“独”促统话语叙事的构建 / 张 建
- 90 “以商言政”：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
——以《经济导报》为中心 / 王明亮 付潇仪
- 105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理论
逻辑与实践探索 / 高 旸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 122 国家建构视角下乌克兰的语言冲突：影响及镜鉴
/ 何俊芳 朱国义
- 135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 / 唐 健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4 No.1(Sum No.43) Vol.8

- 01 The 'Source'and 'Way'of the Self-Confidence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Political Science Huang Tianzhu
- 26 The Civilized Value and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Liu Zhili&Wei Zitong
- 38 Modernization of Solidarity:the Integration Form and Practice Path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 Dai Jie
- 52 Modern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 the Identification Concept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Fan Shibo&Bai Jinyan
- 65 The Academic Elucidation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Wei Chonghui&Wang Yue
- 79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Independence Discourse Narrativ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National Unity Zhang Jian
- 90 'Speaking of Politics Through Business': the CPC's United Front Propaganda to Hong Kong'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rcles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Centered on 'Economic Report'
Wang Mingliang&Fu Xiaoyi
- 105 Building a Common Spiritual Home: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Parrative of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Era Gao Yang
- 122 Language Conflicts in Ukra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Building:Influence and Reflection
He Junfang&Zhu Guoyi
- 135 Tibet-related Policy of U.S.in Chinese Relations: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U.S.Asia-Pacific Strategy Tang Jian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源”与“道”

——一个基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

黄天柱

（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面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定和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不仅关涉这一制度自身能否行稳致远，而且对于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既是一个认识问题，即“自信之源怎么看”，要搞清楚制度自信从哪里来；更是一个行动问题，即“自信之道怎么办”，要解决好制度自信如何更坚定。从政治学学科视角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可用历史政治学、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政治传播、比较政治、政治发展作为基本分析框架，从内生演进、文化基因、治理优势、话语体系、制度互鉴、制度自省等多重维度切入，进行历史的、系统的、全面的、客观的、辩证的考察和研究，进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生演进的发展逻辑中树立历史自信，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赖以生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1.001

作者简介：黄天柱，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参政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研室主任、教授，山东大学统一战线学博士研究生合作指导教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央社院—地方社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研究组合首席专家，浙江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基地执行主任，复旦大学统战基础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20ZDA013）；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委托课题“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参政党履职能力研究”（ZK2020023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18AZD016）

引用格式：黄天柱.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源”与“道”——一个基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25.

成的文化基因中感悟文化自信，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际发挥的治理优势中彰显实践自信，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系统构建中建立理论自信，从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互鉴中坚定文明自信，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自省提升中展示发展自信。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制度自信；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实践自信；理论自信；文明自信；发展自信；制度比较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4) 01-0001-25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和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经过 70 多年的风雨洗礼，这一制度的理论不断发展，实践日臻完善，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1]。与此同时，作为“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之争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直是西方敌对势力攻击诋毁的重要目标。在这一关乎国家建设和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概念，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2]。

所谓“制度自信”，是指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制度设计及其优越性的充分肯定^[3]。制度自信是国家得以成长和巩固的精神基础与政治基础，决定着国家的内聚力与竞争力，进而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命运^[4]。“**新型政党制度**”重大论断的提出，是我国在政党政治领域形成标识性概念的重要标志，**展现了充分的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5]今天，我们讲体现制度优势，坚定制度自信，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自信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已植根于我国土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6]

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既是一个认识问题，即“自信之源怎么看”，要搞清楚制度自信从哪里来；更是一个行动问题，即“自信之道怎么办”，要解决好制度自信如何更坚定。近年来，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这一方面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与国外政党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不断暴露出的内在缺陷和

①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架构是“1+8+1”，即中国共产党、八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需要，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活中，无党派人士参照民主党派履行职能，也是多党合作的重要主体。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话语来讲，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力量”。为研究聚焦和表述简洁起见，本文在论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体时，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但本文相关论述和观点，对无党派人士也是基本适用的。关于无党派人士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体的历史逻辑、理论依据、实践价值等问题的分析，可参见拙文：《新型政党制度视域下的无党派人士：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载《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 年第 5 期。

问题密切关联。已有研究成果多从历史、理论、实践、文化、价值、比较等不同视角和维度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内涵和来源，并提出彰显和强化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路径和举措^①。但总体而言，目前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问题进行历史的、系统的、全面的、客观的、辩证的研究的成果仍付之阙如，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近期，中共中央出台专门文件，对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出谋划部署，并提出了努力建设自信自立、务实有效、规范有序、生动活泼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总体目标，这必将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面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文尝试从政治学学科视角，以历史政治学、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政治传播、比较政治、政治发展为基本分析框架，从内生演进、文化基因、治理优势、话语体系、制度互鉴、制度自省等多重维度，体系化学理化思考和回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自信之源和自信之道问题。这不仅关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否真正行稳致远，而且对于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内生演进与历史自信

所谓“历史自信”，是指主体对自身历史轨迹、历史价值和历史前途的充分肯定^[7]。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他郑重提出“坚定历史自信”的重大命题，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8]，强调“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9]。坚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自信，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对于政治发展、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维度看，政党政治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舶来品。相较于西方现代政党和政党政治产生至今 200 多年的历史，中国从 1905 年第一个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建立，到今天也才有 100 多年，而到 1949 年新型政党制度确立时仅有 40 多年。但在此期间，中国人对政党政治模式的“体验”却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探索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民族复兴的历史征途中，尝试和实验过现代政党政治的各种形式、体制和模式。两党制、多党制昙花一现、乱象丛生，并最终流血政治收场（以宋教仁被暗杀为标志）^②。国民党搞一党专制，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

① 具体研究观点可参见祝灵君：《从制度自卑走向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中国政党制度的成本、效能分析》，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何旗：《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与自信——基于美国政党政治的比较分析》，载《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1期；吴志国：《论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来源》，载《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② 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两党制”这一问题，学界观点并不完全统一，大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但也有学者持肯定观点。例如，李君如认为，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党人内部的分化，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形成了同盟会和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两个影响很大的政党，尽管当时并没有说要实行两党制，但实际上已经形

“一个领袖”，垄断国家一切权力，导致众叛亲离、人心散尽、败走台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先后实现两次合作（第一次采用党内合作形式，第二次采用党外合作形式），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政党合作的主体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除国共两党之外，还有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要代表的中间党派^①。但国共两党因利益代表和政治主张不可调和，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而中国共产党与一部分中间党派因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政治民主、人民幸福等方面有基本共识而渐行渐近，最终携手合作、协商建国。在此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中国大地确立起了符合国情的政党制度。

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身的形成发展看，它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萌芽于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实践，在中共“五一口号”催生下，正式确立于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时。新中国成立头七年，是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但 1957 年“反右”扩大化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国内外各种因素和形势的影响，走了一段弯路，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文革”结束后进行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开放开启新的历史时期，遭到扭曲的政治形态复原并获得新的发展，开始了政治形态的转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得以恢复并实现发展，获得主体地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多党合作逐步超越党际关系架构和统一战线政策安排，被确立为一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并通过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载入宪法的方式得以确认和巩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得以不断提高，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0]。

从形成逻辑来看，任何国家的政党制度一般都既是“长成的”，也是“做成的”，往往受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基础和各政党尤其是主导性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智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决定。今天，我们分析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产生和存续的必然性，实际上要从历史逻辑和历史过程两个维度来展开。

历史逻辑揭示的是偶然性中的必然性。作为一种历史逻辑，新型政党制度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政党政治生发、演进的历史结晶，其形成和确立有其必然性。一百多年来中国政党政治探索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道“风景”，不是中国从西方照搬过来的“盆栽”，是一项有“根”有“魂”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存续是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目标的需要。对近现代中国而言，要实现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建立民主政治、实现文化兴盛繁荣等目标，既要解决权威供给，又要吸纳多元参与，即建构

成了两党制政治格局。而且，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革命党人受西方政治特别是美国政治的影响很深，他们在主观上是接受这样的两党制政治格局的。参见李君如：《你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吗？》，新世界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51-54 页。

①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1927—1949 年），国民党、共产党之外的中间党派有数十个。据日本学者菊池贵晴的研究，当时这样的中间党派有 40 多个（参见菊池贵晴：《中国第三势力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页、第 4-6 页）。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编写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档案出版社 1992 年版）整理收录了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国民主党、中国农民党、中国新社会革命党、中国三民自由党等 36 个小党派的相关档案资料。

多元一体的政治秩序。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存续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反映，是大一统、天下为公、家国情怀、以民为本、和合文化、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和体现。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存续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概言之，它符合中国国情，匹配中华文化，能够真正有助于解决中国实际面临的问题。正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深刻指出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的结果^[11]。这既是历史自觉，也是历史自信。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有其或然性。必然性不能脱离偶然性而孤立存在和起作用，必然性往往存在于偶然性之中，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和确立的历史必然性，也是政党制度各主体在关键历史节点坚守制度选择的结果。尤其是作为新型政党制度重要主体的民主党派，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存废问题被多次提出。周恩来曾说，民主党派“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12]。那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底是怎样的“土壤”孕育和推动了民主党派的产生呢？笔者认为，国共两党关系格局的变化是民主党派产生和存在的政治土壤^①；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社会中间阶层的广泛存在，是民主党派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土壤；民国时期政治思潮的多样化发展是民主党派产生和存在的思想理论土壤；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情怀、积极入世的行为取向是民主党派产生和存在的文化土壤^②。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民主党派存在的土壤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土壤没有了，有的土壤慢慢发生了变化。因此，每当社会政治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都会有人提出民主党派的存废问题。

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有人提出民主党派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可有可无”。针对这种声音，毛泽东提出了“一根头发与一把头发”的重要论断，即认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存在，民主党派是联系和代表他们的，因此民主党派发挥的不是“一根头发”的作用，而是“一把头发”的作用^[13]。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是民主党派存在仍然有它的社会土壤。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不复存在，这时又有人提出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基础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从理论上回应和解决了这

① 民盟领导人梁漱溟曾表示，民主党派的生存空间来自于“国共两党之矛盾对立”，“若是两大党融洽无间”，“亦许没有此第三者的出现”，“反之，他们的尖锐独立，恰便促成了现在的民盟”。参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页。

② 当然，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传统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君子群而不党”。尽管自19世纪60年代之后，经过40多年时间，中国人完成了对“政党”概念的“脱敏化”处理，使政党从一个“坏东西”变成了“好东西”，甚至认为只有政党政治能够救中国（参见方维规：《西方“政党”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7年4月号）。但在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心理上仍有一定的障碍。之所以中国民主党派很少有直呼为“党”的，而多数称为“会、盟、社、团”等，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障碍可能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也直接决定了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政党相比，中国绝大多数民主党派自成立之初就具有一个特点，即普遍对掌握政权没有非常强烈的诉求。事实上，这种特点一直延续至今。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及其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从事政党政治活动的影响，北京大学金安平教授有专门研究。参看金安平：《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一问题。这里强调的是民主党派存在可以发挥监督共产党的作用。这种监督在 1957 年春季开始的整风运动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但很快被紧接着的反右派斗争所取代了，之后“互相监督”就主要变成了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单向监督，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日益边缘化和弱化。因此，在反右派斗争和“文革”中，不断有人提出取消民主党派，但毛泽东等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却始终没有松口。在当时民主党派几乎已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人坚持保留了民主党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将多党合作从一种党际关系、统一战线政策上升为一项国家政治制度，就是为了从制度上把多党合作稳固下来，使这种制度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意志的转移而转移、兴趣的转变而转变。

从历史回到现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别是民主党派存在的现实基础问题仍需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有效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今天新型政党制度和民主党派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是什么，现实合理性在哪里？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包容性日益扩大、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日益拓展的条件下，八个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新型政党制度和民主党派对于中国政治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自信不仅要在历史演进中得到论证，更应在现实发展中得到新的确证。

从历史自信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留给中国的一份宝贵的政治遗产与制度资源。它使当代中国政治在理论上有更大的主动性，在实践上有更大的回旋和开发空间。试想，当时如果取消了民主党派，那么今天中国政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将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但这份遗产和资源要怎么用，才能在新形势新条件下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发挥出应有的功能与作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14]。如果只是徒留一个制度形式和框架，而没有良好的制度运转与效能，是不可能真正的制度自信的。进入这个层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空间仍然很大。

二、文化基因与文化自信

现代政治实践表明，文化对政党组织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15]。文化不仅影响着政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运行机制。可以说，任何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基因和土壤。纵观历史发展，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成果。5 000 多年文明发展孕育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新型政党制度植根的文化沃土，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突出优势。中华文化崇尚和传承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贵和尚中，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理念，承载着家国情怀，彰显着“和合”精神，蕴含着民本意识，强调国家整体利益优先、社会和谐共生、个人积极进取、民本主义等核心价值，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思想资源。

所谓“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自信和坚定信念。文化自信体现在对本国传统文化、历史、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自豪感、认同感以及对这些文化元素在当代社会中的积极意义的信心。文化自信的核心是相信本国文化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这种信心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上，还包括对当代文化创新的自信，认为本国文化能够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脱颖而出，为国家赢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16]；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7]；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2]。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18]。这一重要论断表明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关联，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制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秉承历史文化传统、坚定文化自信，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借鉴传统政治智慧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文化传统对于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具有深刻的影响，这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也有集中体现。**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对政治发展道路的深刻影响，是新型政党制度文化发生学的深层原因。尤其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方式，确实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高度契合。**从古及今，中国政治生活中有一对范畴极为关键，那就是“一”与“多”。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总会面对一体与多元的对立统一关系^[19]。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尤其在封建社会和战乱时期，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不可谓不激烈。然而，这并未阻碍中国文化对和谐共处的向往，集中表现为中华民族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始终倡导和追求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价值理念。我们承认“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主张多比一好，单一的东西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形态。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多样性可以带来不同的视角、观点和创新，为社会提供更为丰富和全面的资源，这也符合现代社会对于多元性和创新的追求。但同时我们也认为，没有天下归一的“多”，也会导致“物之不存、天下无序”（《孟子·滕文公上》）。这一观点也意味着，如果过度强调多样性而缺乏一定的整合和归一性，可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无序。中国文化强调要在多元性中寻求共同点、在差异性中谋求一致性，以维护整体的秩序和稳定。多样性不应成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而应当在一种有序、平衡的框架内实现，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所以，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会认为割裂事物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做法，不是一种正确的做法，或者说不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法。这与西方哲学和宗教中二元对立、物我两分的思维方式存在明显区别。这种文化心理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壮大统一战线心理基础，也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这也反映出中国新

型政党制度在融合本土文化和适应时代需求方面的独特性。文化传统的理念不仅影响了政党制度的设计，也在实践中对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等方面产生着实质性的影响。

从辩证的角度看，我们也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中国文化当中可能会影响和制约新型政党制度良性运行、健康发展的因素和成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很难简单用“好”或“不好”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为自然经济的经济基础和专制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服务的，那些带有封建性的思想糟粕在社会意识中也都有所表现。比如，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记·含文嘉》）等观念，社会心理中的权力崇拜、圣君清官情结、宗法等级观念、义务本位等臣民心态，国民性格中的实用、功利、中庸、嫉妒、自私等特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等主张，影响至深。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很早就有民本、“民主”思想，如强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书·泰誓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等。这些论述意识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等，要求统治阶级面对“天心”即“民心”时，必须“怀”“抱”“顺”“承”“度”。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它们都是就君民关系而言的。“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周书·多方》），求的还是为民做主的君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表露出来的还是对觉醒的、组织起来的、有主体意识的民众力量的恐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和消极性因素，同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追求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理念，是格格不入的^[20]。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如果受到这些思想糟粕的影响，就会背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实现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制度载体的初衷和定位。总的来说，目前对这个方向上问题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下一步应秉持实事求是的立场态度，客观辩证全面思考和研究中国文化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良性运转提供正面的、积极的思想和文化支持、精神和价值指引、理论和政治智慧。

从文化自信延伸至制度自信的底层逻辑是通过文化认同建构政治认同。这里面有几个理论问题需要注意和考虑。第一，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转变是一个动态和复杂的过程。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是紧密相关的，但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文化认同包括人们在价值观、信仰、习惯等方面的共鸣和共同体验，政治认同涉及对政治制度、权威和公民身份的认同，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多样的交织。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是深刻的，但影响方式往往是间接的，文化认同也并不会直接导向和转化为政治认同，因此必须深入研究实现这种转换的路径和形式。第二，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在同一种文化传统的土壤上可以生长出不同的政治形态和制度形式，同一种政治形态和制度形式之下可以是不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因为，在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之间，还有其他诸多影响变量，比如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力量对比、阶级阶层结构、国家规模等。所以，我们要重视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但不能陷入“文化决定论”，否则容易掉入“理论陷阱”。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而唯物史观的第一原理是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社会决定文化和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是第一性的，文化是第二性的。因此，要重视文化，同时更应该重视观察和研究经济社会变化对整个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当然也包括新型政党制度）带来的深刻影响。第三，文化是一个复合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5 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基本支撑。其中，**作为根文化、源文化、母体文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含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对中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潜在影响极为深刻。同时，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革命文化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坚持统一战线、践行群众路线、倡导协商对话，在这些实践基础上孕育出的大团结大联合、党内外合作共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民主协商等重要理念和文化，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看，共产主义价值观影响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始终强调要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追求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念支持和吸纳各民主党派规范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对党外人士包容体谅并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型政党制度加强思想引领、广泛凝聚共识提供了价值基础。

总体而言，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文化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关系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主要聚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而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明显不足，这在下一步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需要着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两个结合”的宏阔进程中交融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重要基础。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自信，要进一步立足文明视域，整体、深入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文化的多维立体关系，自觉自主地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视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增量性原创成果，在政党制度领域以坚定文化自信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三、治理优势与实践自信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这句话出自中国近代思想家魏源的哲学著作《默觚》，意思是说，每一个人的鞋子大小不必相同，关键是要适合自己的脚；每个国家的治理方法不必雷同，关键是要有利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引用过这句话。这句话促使学界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治理绩效问题的关注和重视。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

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成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制度自信的背后是理论的坚定性与发展的有效性，而其现实根基就是全社会对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所形成的基本认同^[41]。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所有的制度认同都是建立在制度所创造的效能与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追求具有内在契合性基础上的^[22]。具体到政党制度，**判断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好或不好、适合或不适合，不能仅仅看形式和程序，不能简单地采用政坛上有几个政党、选举中有没有政党轮替、政党间有没有制衡等标准，更重要的是要看其治理绩效，看其是否真正管用，是否能真正有效回应和解决国家治理中面对的各种问题，是否能够为国家的长期繁荣、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的福祉增进作出积极贡献。**政党制度一旦形成并稳固后，事实上就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依托。不同的政党制度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性关系与功能性特点，在现实的国家治理中也往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体现着不同的价值。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的以两党制、多党制为主要代表的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同于苏联等国家曾实行过的一党制，也不同于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独大（居优）制。这一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本质特征，以多党派参政为重要内容，以政治协商为基本运行机制，有自身鲜明的结构特点。从参政党角度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平等但不对等、参政但不分权、监督但不制衡、合作但不同一^[23]。自正式确立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已走过了 70 余年的发展历程，已全面嵌入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与政治过程，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资源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并在实践中展现出了独特魅力和鲜明优势，显示出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在 2018 年 3 月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新型政党制度”重大论断的同时，将这一制度与旧式政党制度置于同一个天平上进行比较，用三个“新就新在”高度概括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功能优势。他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

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视角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价值可概括为：以政治沟通优化决策、以一核多元维护稳定、以互相监督改进治理、以协商合作柔化权力、以有序参与深化民主^[24]。这些功能价值落实于具体的制度运行中，其实践优势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作为唯一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拥有绝对权威和能力实力，其领导地位得到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确认和保障，在多党合作中拥有决策主导权，在体制内外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庞大组织体系，通过统一战线团结引领广大党外人士，通过意识形态工作加强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从而实现对国家和社会

黄天柱.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源”与“道”——一个基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25.

全面、有效的领导。第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力量的无党派人士，依托新型政党制度，拥有丰富而畅通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渠道，可以规范有序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第三，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保持战略定力，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提出愿景、制定规划、谋划工作并承担责任。第四，通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建构起的一个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政治沟通信息网络，各种思想智慧、意见建议、愿望诉求可以进入决策者视野，使决策信息更加充分、决策方案更加完备、决策依据更加准确，从而推动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第五，通过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视角，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发现一些单靠中共党员没有或不容易发现的错误和缺点，促进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并及时纠正一些政策和工作中的误差和偏差，从而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第六，通过“一核多元”（即一元领导核心与多样参加主体）的主体结构，有效解决政治权威的供给和保障、多元社会利益的协调与整合、各种社会群体的凝聚与动员、新兴社会力量的吸纳与引导等问题，促进政治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发展合力。第七，强调集中决策、快速反应，谋求上下同心、全国一盘棋，强调垂直管理、令行禁止，使执政党和国家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社会号召力、群众组织力和资源调配力，有利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实践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外政党制度尤其是以两党制、多党制为代表的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相比，在国家治理的能力和绩效方面具有明显优越性。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的政治秩序和治理效率，进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25]。近年来，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金钱政治、短视政治、否决政治、作秀政治、民粹主义、低效治理等弊病，“以民主程序吞噬了民主实质”^[26]。这不仅打破了国内一些人对西方民主和政党制度的迷信，也使大家更加理性和客观地认识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国情的适应性及其在维护国家多元一体、实现国家有效治理、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优化公共政策过程、吸纳社会有序参与、整合协调各方利益、保持政局团结稳定、组织动员凝聚力量等方面的鲜明优势^①。因此，当今天西方社会都普遍对政党政治表示不满，认为政党政治已经在走下坡路、政党功能在衰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则明确向世界宣示：“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27]，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28]。这些重大论断的背后，是建立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优势基础上的实践自信。

① 相关研究可进一步参见林尚立：《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性贡献》，载《求是》2013年第13期；周淑真：《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基于内涵要义、演进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7期；张献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之源、生命之花和生命之光》，载《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6期；杨德山：《试论新型政党制度之“新”：比较政党制度视角下的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3期；韩慧、臧秀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契合互动》，载《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黄天柱：《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与优势》，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杨爱珍、王俊华：《政党制度研究的视角转移：基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功能和效能的讨论》，载《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四、话语体系与理论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自信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9]政党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志，是当代政治舞台上最主要、最活跃的角色，是各国国家治理过程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政治主体。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在当今世界，所谓政治几乎就是指政党政治^[30]。在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了 20 多个是君主制或政教合一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政党^①。在现代政治框架下，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形成的制度性政党关系、行为规则和运行形态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政党制度不仅规范着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功能和运作方式，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担负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责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31]，是现代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今天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是中国基于本国国情、以自己的方式对政党政治这一普遍性问题作出的回答。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性与适应性。我们有理由也有底气把这一制度背后的各种道理尤其是它的中国性与世界性或者说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说清楚、讲明白，这必将是中国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作出增量性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标识性概念，鲜明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制度话语的自觉重塑和自主建构。“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从原来更多强调多党合作制度的“中国特色”，到如今在“中国特色”基础上更加强调这一制度的“新型”特点和优势，更有利于讲清楚一个基本道理，即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有根有魂、具有内生性，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和文明价值。话语转变的背后，体现的正是高度的制度自信。发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等重大场合安排民主党派中央主要领导人亮相并发声，都是彰显制度自信、展示制度形象、扩大制度影响力的有力举措。

构建具有公信力、感召力、说服力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故事，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2022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构建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任务和要求，中央出台的最新文件作出了专门部署。当今世界，话语权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而言，挨打、挨饿的问题已基本解决，现在面对的是如何解决挨骂的问题。要解决挨骂的问题，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至关重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党政治模式，这项制度要真正立得住、行得稳、走得远、说得响，一方面要靠实践有效，即用事实说话；另一方面要靠逻辑自洽，即用道理说话，尤其需要建立一套自己讲得通、别人听得懂并且听得进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干得好、讲得好，才是真的好，才是**

^① 根据对世界各国及各地区政党政治发展状况的研究，结合中国相关网站对各国政党的介绍，以国家注册和进入国家议会的政党数目为标准，截至 2021 年，全世界政党总数约有上万个。参见周淑真：《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2021—2022）》，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 年版，绪言第 2 页。

黄天柱.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源”与“道”——一个基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25.

真底气。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关键是加强基础研究。要从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从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互动中、与世界上各种类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中,系统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理念、结构样态、实践形态、运行机制、功能作用、发展空间、世界意义、文明价值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讲清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以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指导实践的前瞻性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吸引力、说服力、引导力,努力为世界提供一套有别于西方的、更符合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讲清道理,需要揭示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把文化基因、历史渊源、功能价值、特色优势总结好、提炼好、概括好。讲明学理,需要推动纳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计划,建设一批理论研究基地,推动党校、社科院、社会主义学院、高校等加强对重大基础问题的学理化体系化研究阐释,构建相关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讲透哲理,需要对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政党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现象。现代政党诞生于西方,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政党研究给予了足够重视,形成了丰富的政党学说^①。纵览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研究的成果,其研究对象和内容非常广泛。从政党本身出发,西方政党理论针对政党的定义、政党的功能、政党组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政党外部来看,西方政党理论着重从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两个维度出发,集中探讨了政党与社会结构、政党与社会资本、党国体制、政党法、政党财政等关键问题。近年来,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不少学者对政党的未来,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全球化时代政党及政党政治

① 较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有: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1902, Chicago:Quadrangle Books, 1964)、罗伯特·米歇尔的《政党》(1911, 1st Eng. edit, New York: Free Press, 1915)、谢茨施耐德的《政党政府》(1st Eng. edit,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42)、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政党》(1st Edit, London:Methuen, 1951)、约瑟夫·拉帕隆巴拉和迈伦·韦纳主编的《政党与政治发展》(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和施泰因·罗坎主编的《政党体制与选民联盟》(New York:Free Press, 1967)、乔范尼·萨托利的《政党与政党制度》(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里昂·爱泼斯坦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NJ:Transaction Books, 1980)、克劳斯·冯·贝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Aldershot:Gower, 1985)、伯特·梅尔主编的《西欧政党制度》(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马丁·瓦滕伯格的《美国政党的衰落》(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让·布隆戴尔和毛里奇奥·科塔主编的《政党与政府》(Basingstoke, Hampshire:Macmillan, 1996)和《政党政府的性质》(Basingstoke, Hampshire:Palgrave, 2000)、罗塞尔·达尔顿和马丁·瓦滕伯格主编的《没有拥护者的政党》(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理查德·卡茨和威廉·克罗蒂主编的《政党政治手册》(London:Sage Publications, 2006)等。

国内已翻译出版的西方政党研究方面的主要代表著作有: [法] 莫里斯·迪韦尔热:《政党概论》, 雷竞璇译, 香港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1 年版; [德] 罗伯特·米歇尔:《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意] G.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法] 让·布隆戴尔等主编:《政党政府的性质——一种比较性的欧洲视角》,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法] 布隆戴尔、[意] 科塔主编:《政党与政府: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与支持性政党关系探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英] 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美] 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主编:《政党与民主》,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意] 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3 年版; [美] 爱泼斯坦:《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谢茨施耐德:《政党政府》,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理查德·卡茨、威廉·克罗蒂编:《政党政治研究指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奥斯特罗果尔斯基:《民主与政党组织》,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此外, 西方学者还创办了《政党政治》和《西欧政党》这两份主要研究政党问题的刊物。

的转型趋势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和研究。在我国，学者对政党的关注是随着政党政治实践的展开而出现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和世界的交往越来越深入全面，国内学界对政党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更加注重把各类政党作为整体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并从中发现政党活动中共同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32]，“政党学”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①。

综合来看，中外政党学的知识谱系大致包含以下这些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党发生学。主要研究：何为政党，政党如何产生？政党到底是代表部分，还是代表整体？政党究竟是冲突的力量，还是整合的工具？二是政党历史学。主要研究：政党的演变，包括观念、组织、技术、形象等方面。三是政党组织学。主要研究政党的组织结构及运行（成员、组织、目标、活动、经费、组织原则和活动规律等），以及政党自身建设（党员招募、党内教育和培训、政党形象塑造；党内民主；政党经费的筹集和管理等）等问题。四是政党文化学。主要研究：政党意识形态，党章、党纲，党徽、党旗、党歌，党刊党报，党员纪律，党内民主生活等。五是政党政治学。主要研究：政党如何推动国家政治的运行，具体包括政党的功能、政党与国家权力（政党与代议机关、政党与行政机关、政党与司法机关、政党与军队）、政党与民主政治、政党与政党制度等。六是政党社会学。主要研究：政党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基础，政党与社会整合（政党与阶级关系、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政党与政治沟通，政党与媒体，政党间关系（党际关系）等。七是政党类型学。主要研究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分类标准及分类体系。八是政党比较学。主要研究不同国家、不同类型政党及政党制度之间的比较。九是政党发展学。主要研究政党发展的环境、动力与前景等问题^[33]。这样一个知识谱系为思考和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提供了重要参考。下一步可考虑从历史、主体、关系、机构、机制、功能、文化、比较、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入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既有世界性又有中国性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

然而，现有的理论远远没有把丰富多彩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背后的逻辑和道理讲透彻、说清楚，仍然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今天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故事，既要运用改革开放成就论证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性，更需要进一步讲清楚新型政党制度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从学术话语看，这就是要讲清楚两者之间的因果机制。目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研究得比较多，也比较深入。讲清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也要讲清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讲清楚这样一种以“1+8+1”为主体框架，以党的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为核心要素的新型政党制度，其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哪些是中国的特色和个性，哪些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尤其是政党政治文明的规律和共性。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从全球视野、全局眼光的要求研究和思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时候，讲清楚普遍意义和规律性原理并且能被更多人理解和认可的时候，相较于一味强调这一制度的中国特色与个性，更有说服力，更有意义，也更有助于增强我们对这项制度的自信。**诚如有学者所言：“当我们强调政党制度自信时，应

① 代表性成果有：《政党论》（王长江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政党政治学》（周淑真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政党政治论》（王韶兴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政党学概论》（余科杰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政党政治研究手册》（郭定平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等。

不是仅仅强调中国政党关系独特而自信，而是须说明这种独特是建立在普遍共性基础上的，是更高层次的独特，这样才是真正的自信。因此，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关系，需要论述这种‘特色’之中蕴含的普遍性，证明特色不是特立独行，而是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这样的特殊性或特色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34]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重点是融通内外交流。要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和叙事体系，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一方面，国内各方应努力形成话语共识。客观而言，目前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内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之间，高校和党校、社科研究机构、社会主义学院的研究者之间，官方和民间，学术界和大众传媒之间，话语体系很不一样，交流对话有一定的难度，存在不同程度“自说自话”“圈内循环”等相互割裂现象。因此，当前一项基础性工作，是要逐步打破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统战部门、民主党派、人民政协、大众传媒等机构、组织和单位之间的话语壁垒和藩篱，围绕着如何进一步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这一共同任务，加强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实践者、传播者之间的跨界对话和交流，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范畴、表述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和共同话语，推进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一体化建设^[35]。另一方面，面向国外，要努力把握世界各国政党的研究兴趣点、利益交汇点、议题聚焦点、情感共鸣点，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把新型政党制度外宣工作纳入国家总体外宣大局和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发挥国内主流媒体对外新闻发布平台作用，用好国际主流媒体、社交媒体，改进叙事方式，创新宣传手段，扩展宣介渠道，提升传播效果，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跨文化、跨语境、跨国界传播，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效能优势转化为舆论优势、话语优势，使这一制度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了解、理解、认可。

在面向国外尤其是国外普通民众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故事时，采用“求同存异”的策略往往更有效，这意味着强调与他们熟悉的政治概念和价值观的共通之处，同时承认并说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之处。从人性上说，人们更容易理解熟悉和类似的事物，而不容易理解陌生和迥异的事物。“求同存异”意味着通过诉诸“同”的方面来让对方理解，但“同”并不否认“异”。只是说如果“同”的东西多于“异”，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反之，就比较困难^[36]。首先，可以通过强调共同的目标来建立共鸣。例如，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同样致力于实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福祉等方面的目标，让国外民众感受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追求，从而降低他们对陌生性的敏感度。其次，通过突出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解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性，包括强调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治理理念，以及对民主和法治的理解。这样的解释有助于国外民众更好地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中国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下的发展过程。此外，通过实际的案例和事例来说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作方式。运用具体而生动的例子，向国外民众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如何参与国家治理以及如何回应社会需求。这有助于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制度的实际运作，减少对制度的陌生感。

对外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能够发挥特殊重要作用。要综合运用官方和民间资源，统筹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海外知华友华力量，多方位宣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作用，提升国际影响力。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和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主体，有责任也有条件通过现身说法介绍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治理成效，尤其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动实践，争取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规定，要发挥民主党派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应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落实好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参加有关外事活动的各项政策。要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搭建更多的工作平台，发挥他们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如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主持的外事活动、有国际影响力的政党会议（如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通过现身说法，从当事人视角向海外介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中国共产党讲和各民主党派讲相结合。这样能够在讲好中国新型政党故事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参与、塑造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助推国家总体外交。

五、制度互鉴与文明自信

文明和文化是一对既密不可分又有深刻区别的概念。从制度自信的角度看，文化自信立足多样性、丰富性、特殊性、民族性，文明自信体现普遍性、一般性、通约性、世界性。与文化自信相比，文明自信是一种层次更高、底蕴更深的自信。这里的普遍性、一般性是从理性和哲学层面来讲的，通约性、世界性是从实践层面来讲的，是指对全人类都可通用和适用的东西，是人类所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东西，是人类普遍的共鸣。具体到某一项制度而言，其是否具有文明自信和文明价值，关键是看这项制度能否回答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并且其价值理念、机制安排能否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解决治理难题有积极参考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37]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从文明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辉煌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成就作出总结概括，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论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38]。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政治文明新形态最具中国特色；在政治文明新形态中，制度文明新形态最为根本；在制度文明新形态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具魅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为下一步从文明自信高度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指明了方向、谋划了蓝图，也提出了新的重点和更高要求。

一方面，**要在文明比较和传播中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制度类型、一种新的执政和参政方式、一种新的政党关系、一种新的民主实现形式、一种新的现代治理方式^[39]。**从文明比较视野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诸多方面的特色优势具有重要的文明价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协商对话代替选举至上，以合作共事代替恶性竞争，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的制度理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为内在特质，致力构建既能吸纳社会各方广泛参与又能有效维护社会团结的包容型制度，较好地以制度化方式解决了在发展民主的同时保持社会团结这一世界各国面临的长期且普遍的难题，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增添了新的制度形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致力追求利益代表的真实性、广泛性、持久性和奋斗目标的一致性，以建立在广泛有序参与基础上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社会团结超越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的社会撕裂，以一体多元的主体架构广泛吸纳、聚集和培养全民族精英人才，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创造了新的制度效能。对于这样一种将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步性和时代性、一致性与多样性有机结合起来政党制度，我们应有充分的自信。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开展比较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共性与个性（或者说普遍性与特殊性），分析共性背后渗透的人类社会治理与政治发展的规律以及个性背后体现的不同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特色。比较研究不可避免会涉及对每一种制度的优势、劣势或者说长处、短处的分析和评价。但就根本而言，比较不是为了简单分个高低优劣，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改进自己、完善自己。这应该是开展比较研究的基本态度和出发点。基于这样的态度和出发点，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自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无法在世界政党制度的类型学分析中给这项制度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结果往往是在西方主流政党理论划分的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之外^①，自己加一个“一党领导制”，或者表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属于西方政党类型理论所指称的任何一种，是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类型。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到底是只能独中国一家、别无分号，还是可以真正成为人类在面对和解决政党政治这一普遍性命题时采用的一类制度？这里面同样存在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

纵观几百年来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仅在一国实行的政党制度，很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强大话语权的政党制度；只有超越一国范围，为越来越多的

① 政党制度类型划分，是中西方政治学者普遍关注的重点。国外学者在对政党制度进行分类时，研究对象主要是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很少被纳入其研究视野。根据样本选取和分类标准的差异，国外学者对政党制度有三分法（迪韦尔热等）、四分法（让·布隆戴尔、J·拉帕隆巴拉和韦纳、达尔等）、五分法（班克斯和特克斯特、斯坦因·罗坎等）、七分法（萨托利等）。其中，三分法（根据可能获得执政地位的政党数量，将政党制度划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是最为传统且影响最广的分类方法。关于政党制度类型的相关研究和分析，可参见郭定平主编：《政党政治研究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7-202页。

国家所借鉴或参考，政党制度才有生命力、影响力、话语权，也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成为标杆和模范。英美的两党制、法德的多党制，就是在传播、复制、移植到其他国家以后，才逐渐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影响力和话语权。讲到一党独大（居优）制，人们也能一下子想到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印度的国大党、日本的自民党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等。尽管在制度传播、复制、移植过程中，时常也会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影响而出现水土不服现象，导致制度变形、变异、失败甚至崩溃。但“东方不亮西方亮”，只要一种制度的精神和要素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体现和借鉴，那么这种制度就更能找到和确立类型学意义上的自信。这种自信的背后是具有某种普遍性、一般性、通约性的文明价值。

从纵向比较维度看，二战后建立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中，除中国外，还有几个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分别是亚洲的朝鲜、越南，欧洲的波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有关方面专门组织力量对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合作的经验与做法进行了总结提炼，希望能为我国多党合作制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①。不曾预想，随着东欧剧变，多党合作在东欧四国中断了^②。但我们不能因为在这些国家这种制度最终中断了，而否认它在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一种重要类型的历史事实。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坚定制度自信，必须跳出“幸存者偏差”的思维陷阱，对这种制度在原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实践经验和最终中断的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尽管东欧剧变有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但如果从政党制度的角度作反思，是不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也有其一些内在的缺陷和问题？^③这些缺陷和问题在今天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运行过程中是否也可能存在？如果存在，那么要如何克服和解决，从而使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在中国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系统、深入总结它们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40]。

同时，要欢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考察和学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与经验。在政党制度上，我们历来强调民主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强调要尊重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及其政治选择。这个主张是相互的，一方面是希望其他国家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认识和理解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当然，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这一主

① 1988 年，部分研究成果由春秋出版社以《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问题研究》为题正式结集出版。

② 1988 年，越南民主党和越南社会党宣布解散，越南共产党成为越南唯一存在的政党。朝鲜的社会民主党和天道教青友党虽仍存在，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③ 从历史上看，东欧四国当时实行的多党合作制在制度形式上与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最接近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为什么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学者认为是因为这些国家领导执政的共产党长期未能摆脱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控制，并受苏联一党制模式的影响，推行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没有充分发挥其他民主党派的作用，各民主党派只是被当作“花瓶”摆设，未能对共产党真正起监督和制约作用（参见高放：《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 期）。有学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建立多党合作制不是共产党适应形势发展进行的自觉的政治选择，而是在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内部和外部、历史和现实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城下之盟”（参见张献生：《东欧国家政党体制的演变对我国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启示》，载《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4 年第 2 期）。也有学者指出，当时这些国家虽然形式上有多个政党存在，名义上是联合执政党，但实际上仅是一种策略需要，以政治安排为特征的合作形式，随意性很强，没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保障（参见李金河：《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研究》，九州出版社 2016 年版，导论第 5 页）。

张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提出的, 强调的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 不论国家大小、国力强弱, 一国的主权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但同时, 在全球化条件下, 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日益频繁和密切, 对当今的每一个主权国家而言, 国际关系、国际环境已经日益成为其国内政治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所不同的只是影响的方式和影响的程度。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也是今天致力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责任正日益凸显。未来的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独善其身”显然不够, “兼济天下”必须考虑, 这既是世界对中国的要求, 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责任。由于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实行得很好, 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这一制度也表示赞赏, 觉得可以学习和借鉴^[1]。**对中国而言, 通过制度比较和对话, 在尊重别国主权和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前提下, 基于政党制度发展的普遍性与规律性, 进行必要的制度倡导, 成为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搞制度输出, 但应该欢迎其他国家及政党来考察和学习, 对于那些认同、需要、希望学习我国政党制度的国家, 可以创造积极条件, 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精神要义和实践要素更多为他们所认知、了解和运用。**只有成为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政党制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才能以一种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另一方面, **要在文明学习和借鉴中永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活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党制度, 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地位是法定的, 两者之间在执政权归属问题上不存在竞争性。它与苏联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不同, 不仅没有取消执政党以外的其他党派, 而且注重吸纳这些党派的成员参与政权机关建设。它与新加坡等国家的一党独大制也不同, 民主党派从制度设计和政治现实上均不存在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尽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自身特殊性, 但并不是特殊得完全无法与其他政党制度进行比较和对话, 因为其背后仍然具有政党制度的一些共通性。**例如, 与所有其他政党制度一样,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使命主要也是解决多元共存一体的问题。不管政党制度是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样的形式确立, 其内在的倾向都是共同的, 就是最大限度地创造国家整合, 减少党派的无序纷争可能带来的社会分散和国家分离^[41]。再如, 在多个政党并存的条件下, 执政党都力图维持执政地位, 这使得执政党在处理与国家、与社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以及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往往表现出一定相似性。又如, 中西政党制度均反映了民主的价值。在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下, 人民主要通过选举实现当家作主;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 除选举外, 更强调人民通过协商和参与实现当家作主^[42]。

新型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来认识和把握这一制度, 看它是从什么样的“土壤”中孕育和产生的, 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都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 否则就容易作出一些隔靴搔痒、脱离实际的认识和预判。

新型政党制度的共通性则要求坚持比较的视野, 跳出中国看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除前述从纵向比较维度总结反思多党合作制在原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和中断教训外, 还要从横向比较的维度客观辨别当今国外政党制度理论和实践中的糟粕和精华,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有针对性地予以扬弃。现代政党和政党政治首先产生于西方、成熟于西方, 尽管近年来西方政党政治发展中暴

露出了诸多弊端和困境，甚至在部分国家出现了政党衰败的现象，但是政党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依然不可替代，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实践中仍有不少操作和技术层面的经验和做法，值得研究和借鉴。比如，西方竞争性体制下，在野党、反对党是如何实现对执政党和公权的有效监督的；在欧洲一些实行多党制的国家，组成联合政府的各个党派之间是如何开展协商与合作的；以绿党为代表的“议题型政党”是如何兴起并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西方政党是如何处理与群众（选民）之间的关系的；西方政党是如何发挥思想库的“外脑”作用的；西方政党是如何通过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开展政治沟通、引导社会思潮、塑造政党形象的；等等。对于这些经验和做法，应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总体要求，以一种开放心态予以关注、研究和借鉴，使之成为我们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资源。

六、制度自省与发展自信

一项制度是否具有自我反思的精神和能力，既是制度自信的条件，也是制度自信的体现。我们真正树立制度自信，不仅需要通过“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来突出优势，也需要通过反思不足来发展完善自己的制度，坚持“破”（批评别人）与“立”（发展和完善自己）结合，以“立”为本。我们要更好地发展和完善自己，既要客观评价和充分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也要理性分析和有效解决我们的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既能看到优势、发挥优势，又能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自信。事实上，当我们把一个个问题都研究透，并从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角度提出可能的出路和方向，我们对自己制度的自信只会增强，不会削弱。

在看到当前西方政党政治乱象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面对这种乱象，西方国家本身是否具有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的能力。近年来，西方学界对西方民主政治包括政党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民粹化、金钱政治、民众的政治冷漠现象、中产阶级萎缩、政党趋同化与政党极端化并存、为反对而反对等）都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同时在实践层面进行必要的适应性调整。近年来西方国家选举中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包括特朗普的上台，我们既可以把它看成问题和乱象，但也可以把它看成西方选举政治对社会问题和选民诉求的回应。特朗普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特朗普在选举中提出的问题（包括精英政治的问题、非法移民带来的就业和治安问题、全球化对美国国内企业和劳工的冲击问题等）是客观存在的。这表明，在西方国家，政治对社会仍有回应性的。西方国家的制度既然有回应性，自然也就有自我调整和自我矫正的可能性。

有自省就会有发展，有发展必将更自信。作为一个从中国五千年文明土壤之中生长出来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有着世界上绝大部分政党所不具备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省能力。从延安时期的“窑洞对”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赶考论”，从化解“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到“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与时俱进，不仅使自己始终保持着旺盛生机和活力，而且持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和事业不断健全完善和发展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 对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进行全面谋划部署。在此过程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完善的基本思路逐步清晰。该基本思路主要涉及两个关键词: 一是“制度自信”, 二是“制度效能”。两个关键词背后的基本逻辑是: 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它有自身的文化土壤和国情基础, 它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能够推动中国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业。对此, 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和底气。但这种自信和底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必须建立在我们自己要把这项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并使这项制度内含的功能和价值充分展现的基础之上。紧紧围绕提升制度自信、发挥制度效能, 中共中央就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推动理论、政策、实践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一, 理论创新方面。明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 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无党派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力量”, 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 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是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等重要论断, 为进一步提升这一制度的地位作用、坚定制度自信、发挥制度效能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其二, 政策创新方面。着重在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政协工作、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 制定了一系列文件, 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完善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撑。以中共中央名义制定出台的三部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 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关政策规定更具刚性和约束性。中共中央就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新型政党制度出台专门文件, 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出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和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文件, 首次就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制定十年规划, 协助各民主党派中央围绕组织发展、内部监督、民主生活会、纪律处分、述职和民主评议、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出台一系列文件, 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和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体系框架日趋成熟。

其三, 实践创新方面。政治协商更加规范有序, 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 坚持亲自主持民主协商会, 坚持每年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坚持每年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参政议政更加精准有效, 尤其是通过制定支持民主党派中央开展重点考察调研的专门文件, 使重点考察调研工作保障力度更大、成果质量更高。民主监督开辟崭新领域, 支持各民主党派加强对重大改革举措、重要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和国家中长期规划中的重要约束性指标等的专项监督。2016年以来, 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先后围绕脱贫攻坚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有利于民主监督作用发挥的制度环境正在逐步形成。此外, 逐步开发民主党派的新领域和新空间, 如支持民主党派发挥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联系团结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归国留学人员、对外交往等领域和方面的

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影响了制度自信的提升，制约了制度效能的体现。

比如，**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上仍有没解开的结**。有的党员干部仅仅视民主党派为“智囊团”“思想库”，而不注重发挥其“晴雨表”和“监控器”的作用，片面强调“一致性”，忽视“多样性”；对待政治协商，更多还是程序性考虑，觉得“作为一个程序要走一下，但没必要太认真”；不能正确看待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甚至认为民主党派发展成员是跟中共“抢人才、争地盘”；戴着有色眼镜看党外人士、党外干部，觉得与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干部相比，党外人士、党外干部不好用、不好管，用起来不放心、难放手。究其原因，这些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跟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政策不多、认识不够深刻有关。调研发现，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政策尚未常态化进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主体班次。

又如，**党外代表人士培养使用有政策但实施情况不均衡**。一是对相关政策理解和执行有偏差。一些基层单位没有充分重视和贯彻落实“有意识地把一部分优秀人才留在党外”的政策，甚至出现给民主党派发展成员设置障碍的现象，客观上给党外代表人士水源涵养造成了消极影响。调研中，有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负责人表示，感觉现在党派成员发展进入到了一个“迷茫期”。一些医院、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银行、文化机构等片面理解和执行“一岗双责”“双带头”等政策，限制和减少了党外干部在中层正职岗位上的任职和锻炼机会。二是对党外代表人士培养缺乏长远规划。一些地方民主党派组织高层次人才和旗帜性人物相对缺乏，代表人士队伍存在断层现象，年龄层次过于集中，没有形成梯队，导致政治安排中“拿着帽子找人”，甚至“拿着帽子找不到人”。三是将党外干部纳入党政领导干部交流总体安排不够，党外干部实践锻炼的渠道和平台偏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实施后，一些党外干部挂职锻炼的形式取消了；一些地方原有建立的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这几年大多终止了；中央有关部门对乡镇班子成员中配备党外干部有新规定，党外干部在乡镇的锻炼机会和渠道有所减少。四是实职安排没有实现应配尽配。一些地方民主党派省级组织主要负责人未进省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班子，一些地方配备党外领导干部的政府工作部门数量与相关文件的规定有较大差距，市县司法机关领导班子中党外干部配备的覆盖面不高，县（市、区）政府领导班子中配备党外干部的数量与上次换届时相比有所下降，政府工作部门中配备党外正职比较困难。五是政治安排没有全部落实。党外人士在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候选人建议名单中的比例要求，在一些市、县没有落实到位；部分县（市、区）政协班子中党外副主席的配备未达到 50%。

再如，**参政党能力建设与执政党能力建设不匹配**。世界上政党之间的关系无非是竞争与合作两种，竞合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理解政党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4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多党之间的关系是以合作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以竞争乃至斗争为基本出发点^[44]。这种政党制度的运作和发展，客观上特别要求参政党能力与执政党能力相适应。因为，只有执政党和参政党的能力都提高了，并且能够相互匹配和适应了，中国新型政党

制度才站得住脚。反之，如果没有合格的合作对象，这一制度本身也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更谈不上什么优越性了。总体而言，参政党能力建设仍滞后于执政党能力建设，民主党派“本领恐慌”现象是调研中发现的一个共性问题。党派成员普遍反映，从民主党派自身角度看，影响多党合作质量和效能的主要因素，还是民主党派自身能力不足，人才队伍建设（包括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和资源整合能力跟不上中共期待和形势要求。有的党派领导表示，虽然现在各党派主委每年与中共党委书记面对面协商座谈的场合和机会很多，但是不能保证每次都能够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尤其是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更是不敢提出来。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党组）及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多党合作，把协商仅仅当作一个程序，把配备党外干部仅仅当作一个结构性要求甚至“点缀”，其中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是没有从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和与党外干部的合作共事中真正听到对改进决策和工作有价值 and 帮助意见建议。

另外，**党外人士履职激励与保障有规定但难落地**。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规定和精神，对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多党合作相关工作，所在单位要给予支持保障，重要履职成果要纳入绩效考核考核内容，可作为代表性成果参加职称评审。但这一规定在基层单位的执行难度很大，“兼职闹革命”“业余做奉献”成为部分党外人士履职的客观现实，成为制约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老难题。甚至在有的单位，党派成员在工作日时间参加党派活动，被视为“不务正业”；党派成员在党派工作中的履职成果和荣誉，所在单位不予承认。这些现象在基层仍普遍存在，影响了党派成员参加党派工作的成就感、效能感和积极性、主动性。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反过来直接影响了这一制度的社会评价以及我们对这一制度的自信和底气。因此，发挥制度效能，成为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点和关键所在。直面问题，摸清偏差，找出原因，制定实施有效举措，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高政党协商质量、健全议政建言机制、有序开展民主监督、拓展发挥优势作用的平台载体、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高自身建设水平，努力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实现“说的”与“做的”相统一，制度自信将是水到渠成之物。

坚定制度自信是为了更好地砥砺前行。面向未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更加坚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实践自信、理论自信、文明自信、发展自信。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旧的矛盾和问题会得到缓解和解决，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可能产生和出现，我们要在解决新矛盾、应对新问题中不断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国家和社会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和进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必将呈现出更加自信自立、务实有效、规范有序、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凝聚磅礴力量和完成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历史使命的重要制度支撑。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伟大的政治创造——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N]. 光明日报, 2018-10-19 (16).
- [2]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N]. 人民日报, 2018-03-05 (1).
- [3] 田克勤, 张泽强.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J]. 思想理论教育, 2013 (5): 4-9.
- [4] 林尚立. 制度与发展: 中国制度自信的政治逻辑 [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6 (2): 61-69.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51.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74.
- [7] 肖贵清, 张鉴洲. 中国共产党坚定历史自信的理论探析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 (4): 45-51.
- [8]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2 月 20 日) [J]. 党建, 2021 (4): 4-11.
-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强调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12-29 (1).
- [10] 黄天柱.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史发展与国家治理变迁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3): 14-22.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2021 年 6 月) [N]. 人民日报, 2021-06-26 (2).
- [12]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71.
- [13]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 [G].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88: 6.
- [14] 黄天柱. 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 以政策过程为视角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74-75.
- [15] 柴宝勇, 黎田. 在“新型”与“传统”之间: 影响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因素探析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9 (5): 82-89.
- [16]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10 月 15 日) [N]. 人民日报, 2015-10-15 (2).
- [17]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6 年 11 月 30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6.
- [18]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6 月 2 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19] 徐锋, 高国升. 正谊明道: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何以为新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08.
- [20] 林怀艺. 一路走来: 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1: 337.
- [2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6 年 7 月 1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3.
- [22] 林尚立. 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8): 22-46+204-205.
- [23] 黄天柱. 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征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 (5): 10-17.
- [24] 黄天柱. 现代国家治理视阈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与优势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6): 94-102.
- [25] 林华山. 多维互嵌: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功能 [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黄天柱.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源”与“道”——一个基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25.

(6): 32-41.

- [26] 周淑真. 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 (2021—2022) [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 1.
- [27] 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2017年12月1日) [N]. 人民日报, 2017-12-02 (2).
- [28]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2023年3月15日, 北京) [N]. 人民日报, 2023-03-16 (2).
-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7.
- [30] 郭定平. 政党政治研究手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前言 1.
- [31] 周淑真. 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基于内涵要义、演进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 (7): 6-13.
- [32] 李理. 我国的政党研究正迈向“黄金时代”——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 [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09 (12): 1-4.
- [33] 黄天柱. 中国参政党理论研究: 学术史考察及体系构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2): 25-39.
- [34] 周淑真. 从中西政党关系的异同辨析看制度自信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 (4): 5-10.
- [35] 林华山, 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26-144.
- [36] 郑永年, 杨丽君. 中国叙事: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3: 18.
- [3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10月18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1).
- [3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39] 张献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政治文明新形态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213-259.
- [40] 黄天柱. 可持续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研究的新议程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1): 11-15+92.
- [41] 林尚立. 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 [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09 (5): 5-14.
- [42] 黄天柱. 新时代参政党建设的整体态势与路径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5): 41-57.
- [43] 张春满. 21世纪国外政党政治研究: 理论、前沿与情势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160.
- [44] 萧超然, 晓韦.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310.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

刘志礼 魏梓桐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 “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 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视野赋予了这项制度独特的文明底蕴和鲜明的世界意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造的现代政党政治文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文明本体之间存在互促互进的深层次关系, 展现了丰富的文明本体价值。它不仅塑造了人类政治制度文明新形态, 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战略机制和重要组成部分。从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政治制度基础, 并传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路向、主体结构及其文明特质, 建构了当代中国基本政治结构、经济体系、文化精神和社会秩序, 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破解人类文明悖论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生产方式不平等提供了政党制度支撑, 促进消除了中国长期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 创造了走向全面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从消除现代文明危机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作出了独特贡献, 为破解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及文明形态内部的系统性危机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理念。从促进不同文明交流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不仅提供了消除文明隔阂、超越文明冲突的方式和途径, 更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政党的智慧和方案。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1.002

作者简介: 刘志礼,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魏梓桐,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研究”(23AKS004)

引用格式: 刘志礼, 魏梓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1): 26-37.

刘志礼, 魏梓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26-37.

关键词: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明价值; 世界意义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1-0026-12

2018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的重大论断, 创造性地实现了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的制度形态从“一国政党制度”到“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政党制度类型”的理论创新和概念升华, 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视野赋予了其独特的文明底蕴和鲜明的世界意义。2023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传承中华文明独特基因、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仅塑造了人类政治制度文明新形态, 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战略机制和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和审视这一政党制度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政治文明本体进步的重大作用, 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客观需要, 也是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打造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必然选择, 更是在深刻把握人类政治文明本质规律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建设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进一步为新时代从中华文明历史根脉和文化基因中探寻和解码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提供了根本遵循。与之相应, 学术界近年来从文明的视角和高度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成果较为丰硕。部分学者认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形式创新、制度设计、结构安排, 以及其彰显的显著特征和治理效能等方面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中独辟蹊径、独创新制, 从而“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3], 是“对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4]。还有学者指出, 这一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民本智慧、和合智慧、包容智慧”^[5], 使自身蕴含“效能、环境、视野、形式等契合性的价值基因”^[6], 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文化因素合力的结果”^[7]。还有研究认为, 崇高的价值追求赋予该制度的结构优势、程序优势、治理优势、比较优势^[8], 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获得深入发展而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9]。

可见, 现有成果围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视角, 聚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路径、构成要素及制度价值等的独特性、有效性和优越性, 深入剖析了其制度内涵、文明意蕴及世界贡献, 为我们从文明视野和范畴加深对这一政党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奠定了学术基础。然而, 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本体的积极意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 本文将深入挖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破解人类文明悖论、消除现代文明危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中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 进一步回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文明本体的创新何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

一、为实现中华文明复兴构建政党制度保障

中国古代多元的文化因素在交互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和结构关系, 铸就

了中华文明“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2]的独特基因。然而，随着近代工业文明崛起，西方列强的入侵一度使中国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文明也因此被贬低为“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10]的所谓“低等文明”。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危机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同在中华民族遭遇劫难中艰难抗争的民主人士及其先后建立的民主党派，在挽救民族危亡中逐渐形成了命运与共的亲密合作关系，共同创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新型国家政权体系，完成了中国社会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全面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物质、精神、制度等各方面基础，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政党制度基础

中华文明是一种原生型文明，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唯一一个从未中断的文明，但这样一个具有突出连续性的文明却在近代以来遭遇了难以赓续的严重危机。近代中国是一个“具有结构性变迁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变革的艰难性和渐进性、变革过程中矛盾的复杂性和整合资源的艰巨性”^[11]的超大体量后发国家。这样一种国家摆脱民族劫难，进而实现现代化的任务非常艰巨。近代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凝聚各种政治资源并形成统一意志，协调平衡“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保证中国社会始终维护其内在的团结和统一。由此，“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2]。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领导地位与使命的自觉意识，促使其主动团结中国社会各革命和进步阶级，建立广泛同盟，进一步充分发挥整合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现代化与民主发展的核心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唤醒民众”，采取“组织起来”战略，联合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并通过先进的指导思想、政治主张以及民主协商、团结包容、照顾同盟者利益等方式，使民主党派自觉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民主党派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政治原则，纷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13]。经过艰辛的多党合作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以政治化、组织化的形式确立了以自身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政治框架和制度结构，实现了广大人民力量和意志的团结整合，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政权体系。这一新型国家政权体系的建立，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使传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仍然能够以单一制国家的形态得以赓续发展；更意味着党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构了权力、权利、政治共同体、责任等等政治学理论的关键词”^[14]，从而“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2]，使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将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人民大众的政权在中国大地上建立，更以一种崭新的现代文明形态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构建，以不同区域、不同界别的人民通过其代表在不同层面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现、巩固并发展人民民主，进一步在新型国家政权体系下构建了以党的领导为本质属性、以“多元一体”为基本内核、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要求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结构。

（二）为传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路向构筑政党制度保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的结

果”^[15]，其植根于多元并存的中华文明实体形态，发展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目标、共同事业，为当代中国传承“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并构建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的全社会大团结、大联合的文明主体结构提供了制度化途径。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通过以新型政党制度为重要支撑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民主制度体系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选举民主制度体系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式创造性解决了新型国家政权体系建设中保障党的领导正确性以及保障社会各阶层群体在党领导下的团结性两大基本问题，为进一步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结构提供了重要制度资源。一方面，这种制度化、规范化的利益整合和表达渠道，保障了各区域、各民族、各界别能够以合法有序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通过其代表履行基本职能把分散的、个人的愿望转化成为集中的、有组织的体制内政治参与。这不仅有利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考虑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合理诉求的基础上进行决策，更有利于汇聚各方智慧实现政策矫正纠偏、推动决策不断优化，确保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人民民主效能的发挥极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这一点既体现在党的各项政策的制定能够广泛汇聚来自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更体现在决策的部署和贯彻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及其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各项体制机制及时有效地传达扩散到全社会，并迅速转化为社会各方的共识和行动，形成步调一致、协调共进的强大执行力。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动员、组织和整合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多元主体力量，进一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主体结构和“一元核心领导、多元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见证了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并通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广泛深度参与了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从而成为破除中华文明蒙尘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力量。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为制度基石，以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为关键因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不仅为当前我国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发展繁荣创造了政党制度条件，也必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程中，为世界人民携手走向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二、为破解人类文明悖论开创政党制度范式

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16]在恩格斯的论述中，这种进步与不平等的相伴相生即文明的悖论。政党作为文明发展的塑造者和引导者，本质上正是为了破解人类文明悖论而产生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发展演进中孕育而生的政党却成了部分群体和利益的代言人，政党制度沦为资本利益、特权阶层进行斗争的工具，非但难以消解人类社会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等矛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强化人类文明悖论的推手。“真正的民主必定是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文化平等的相互促进，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历史统一。”^[17]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文明的独特品质，在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

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发展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赋予其独一无二的现代文明价值，使其创造性地为破解人类文明悖论作出了独特贡献。

（一）为从根本上解决生产方式不平等提供政党制度支撑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之一，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愿景和追求，内蕴着中华民族朴素的平等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致力于领导中国人民将这一理想蓝图不断变为现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由于生产资料个体所有造成的贫富差距，中国共产党于 1952 年底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并逐步推进三大改造。各民主党派也积极动员、团结、教育成员及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在民主党派的支持和帮助下，“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18]。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虽然不同阶层群体还存在着具体利益上的差别和矛盾，但中国社会从根本上消灭了阶级剥削，也相应地消灭了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集团，实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使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共同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各政党在共同利益目标下构成了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其中，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政权，是领导党和执政党。其在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将民情民意体现在自身的施政纲领和政治决策中，最大化反映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各民主党派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成员纷纷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也相应地成为联系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已经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19]，以建言献策、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多种方式为执政党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提供支持和帮助，进而服务于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一方面推动了执政党与参政党在共同的制度框架和价值体系中把握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具体利益，并基于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将全体人民的共同要求体现在执政党治国理政中。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社会各阶层群体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发挥协调各方利益的功能，妥善化解矛盾问题，对巩固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促进社会平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为消除中国长期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发挥政党制度效能

贫困是社会物质生活及相应的精神生活匮乏的状态，是人类文明演进中广泛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演进过程中，自然条件的制约使得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建立在农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态。工业文明的演进与发展为人类减少贫困提供了相对充分的物质条件。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作为传统农业社会要素的农民的贫困问题仍十分突出，甚至成为工业文明的牺牲品。尽管中国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但贫困问题始终存在。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来说，消除现实中的绝对贫困是一项纷繁浩大的社会工程，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

在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中，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传统，这种政令统一的状态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理念和显著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文明有机统一，

创造性地构筑了一种既具备强有力的领导主体, 又拥有众多合作力量予以协助、推动和支持的强大国家组织能力, 从而确保自身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组织和动员功能得以最大化实现。在新型政党制度中, 中国共产党通过嵌入各级党政机关、乡镇机构、社区街道、企事业单位及群众组织等建立党组织, 构建并形成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 实现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面领导, 使得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扶贫开发工作大幅提升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保证党的扶贫减贫政策能够有效贯彻落实。同时,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更体现在领导、组织和整合其他政治资源服务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整体目标。在脱贫攻坚战中,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和人民军队等都积极行动……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千千万万的扶贫善举彰显了社会大爱, 汇聚起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20]。凭借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和统一战线优势,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不仅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华文明演进中长期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 更为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中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

(三) 为开辟走向全面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政党制度驱动

在中国宣告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 “中国将继续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不断提升民生福祉水平”^[21]。共同富裕作为人类的共同理想和追求, 不是仅仅依靠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相反,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产生的社会分化现象, 才是文明发展的客观结果。社会贫富差距更不会由于文明的前进而自然消除, 必须通过国家力量干预整合、缩小差距, 进而在国家统筹发展进程中实现全面共同富裕。

“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 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2] “中国政党制度的目的是完成多元一体的整合, 实现国家的一体化。”^[22] 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形式确保社会多元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得以有效协调和整合, 从而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实现区域发展、社会分配上的“多元”相统一, 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这种内在要求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深厚社会和政治基础。这一政党制度以增进共识、促进团结为基本价值取向, 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重要着力点, 通过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广泛收集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立足国家建设发展全局, 把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 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阶层实际, 突出区域化和精准化政策帮扶, 在协调利益关系中促进价值共识凝聚,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把增进民生福祉、走向共同富裕与推进国家发展一体化有机结合起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党和国家进一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分配制度等,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3], 创造了一条快速发展与消除贫困同步、文明前进与共同富裕同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实践表明,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 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 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2]。其领导创造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将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相贯通, 开创性地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国家各项工作的体制机制中吸纳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参与, 以结构性功能保障了这一政党制度真实、广泛、持久体现国家意志

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显著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有效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通过消除社会不平等来实现文明的同步正向发展，为破解人类文明悖论作出了独特贡献。

三、为消除现代文明危机提供政党制度路径

“现代化催生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主导现代化。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共生与互动，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大逻辑。”^[24]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西方国家依靠资本的力量率先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社会转变，并建构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与结构关系。在此后的世界历史中，凭借强大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优势，西方国家更是将其文明形态的要素结构标榜为“普适性”的标准模式，构筑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话语陷阱。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5]在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格局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不可替代的重要政治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5] 2}。

（一）为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提供政党制度优势证明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设计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各自不同的政治角色进入国家政权，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维护政治稳定、推动社会整合、发展政治民主，以及组织凝聚等功能作用。这一政党制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势和效能更加凸显，有效克服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固有弊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26]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看，“现代化”是“文明”跃升的外在表征。如果说不同文明的前进必然指向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那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必然内生并通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而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新型政党制度正是因为“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2]，才能在中华文明赓续发展中深刻把握集中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形成治国理政中党的全面领导与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有机统一，决策施策的高效率、高质量与发扬民主的全过程、全方位深度结合，并始终契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需要，成为“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基本政治制度”^{[15] 35}。在这一政党制度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支持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在亲密合作、协同共治中共同推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同时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调自己“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2]，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中政党恶性竞争、利益集团干预等造成的政治极化、政策失灵和社会撕裂等问题。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通过“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帮助中国共产党更好治国理政来实现自身的政党功能。执政党与参政党在民主协商中以“谋求共识”代替“非此即彼”，增加了国家治理中的“协商点”，减少了“否决点”。这对于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起到了基础性保障作用。新

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型政党制度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推动这一政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以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势和效能更加突出。这项制度进一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显著成就，为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为破解西方现代文明形态演进的本质矛盾和深层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伟大实践贡献政党制度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各民主党派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心任务凝心聚力，共同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不同于“串联式”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的“并联式”发展历程，统筹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领域齐头并进、叠加发展，旨在打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7]的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更大胜利的总布局、总方略，同时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多党合作的中心工作，这一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客观上要求各民主党派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现实关切，与中国共产党一道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的政治秩序和治理效率，进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28]。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不断探索完善多党合作、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的有效方式，不断创新发挥自身作用和功能的有效途径，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持。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充分利用自身成员分布广泛、信息和智力资源雄厚的显著优势，积极从专业角度给予中国共产党各领域建设的专业性意见建议，帮助共产党有效提升决策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作为参加国家政权的参政党，民主党派所特有的从政权内部认识和理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建设的多维视角优势，有利于其更为客观地提出建设性的思路，进而帮助共产党提升执政能力和水平。此外，民主党派的监督对于保障和推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继 2016 至 2020 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对脱贫攻坚这一国家重大战略工作进行专项监督，并高质量助力党和人民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后，自 2021 年起，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又围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了为期 5 年的新一轮民主监督。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6 月，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共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 13 份、监督报告 18 份，向对口省市反馈建议 700 多条，为加强和改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卓越贡献^[29]。

由此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制度安排。其中，共产党领导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政治保证，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是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既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政治格局，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这一制度超越了西方文明体系发展与西方现代文明形态中政党之间对立斗争的结构关系，形成了政党有效合作、同频共振的崭新范式。这不仅有力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迷思，同时也为破解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及文明形态内部的系统性危机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理念。

四、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贡献政党制度理念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的世界不同文明，只有尊重各个文明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并深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才能汇聚推动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强大合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议的，我们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30]。在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文明一元论”“西方中心论”等错误论调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31]。“意图将某个国家的现代文明发展方案视作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范本，无异于天方夜谭，且事实已经证明，在以‘还原论’和工具理性为主线的西方文化中，其现代化最终结果带来的是理论上的错乱与实践中的混乱。”^[32]政党应该担负更多更大的责任，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助推器，成为推进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力量，发挥重要的政治引领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倡导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政党的责任”等，以及其所推动构建的不同国家政党间的新型政党关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不仅提供了消除文明隔阂、超越文明冲突的方式和途径，更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政党的智慧和理念，凸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为不同国家政党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政党制度方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之一是坚持胸怀天下。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3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34]，不仅自身要“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35]，更要立足人类发展进步潮流，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担当起大党责任。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三次全球性政党高层对话会一脉相承，都把“政党的责任”列为主题，倡导世界不同国家的政党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凝心聚力。201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为主题，呼吁国际社会作出积极努力，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主题聚焦“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提到政党应努力担负起五大责任，即引领方向的责任、凝聚共识的责任、促进发展的责任、加强合作的责任、完善治理的责任。2023年3月，这一高层对话会的主题为“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再次强调，面对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30]。与此同时，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也注重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例如，《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把“为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36]作为其现阶段任务的重要内容。可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中目标一致、步调一致。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政党的世界责任，超越了西方政党制度下政党责任的认知范畴，拓展了政党责任的空间场域，更加有利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二）为超越文明隔阂及认同困境贡献政党制度价值指引

当前，中国共产党直接与160多个国家的400余个政党以及社会党国际、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等

政党性国际组织开展经常性交流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37] 2023年3月，为进一步凝聚推动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全球共识，中国共产党倡导召开了第三次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来自15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包括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他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不断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30]。通过构建政党高层对话会这一平台机制，世界各国的各类政党聚在一起，超越地域、文化、宗教、民族、种族、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差异，进行深入交流沟通，共同商讨人类发展、文明交流等重大问题，从而为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政党力量与智慧。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中，各民主党派可以为执政党决策提供国际事务信息和对外交流决策建议；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受邀参与重要外事活动，可以通过人民政协参加对外交往工作。民主党派自身开展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不同形式的对外联络、海外联谊活动，既发挥了其提高中国国家、政党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的作用，又扩大和促进了政党对外交往交流。此外，人民政协在我国外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的对外交往领域不断拓宽、手段日益多元、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我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独特机制和重要平台。

总而言之，政党是人类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各国政党应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担当起引领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中国政党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更为世界各国的政党促进文明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光辉典范，各民主党派也积极贡献了自身力量和智慧，共同有效推动了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五、结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造的现代政党政治文明。这一政党制度不仅由于设计理念、政党关系、制度架构、价值取向、治理优势等的独特性、科学性和优越性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更是在塑造中国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了推动现代文明进步发展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新时代新征程，系统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文明本体之间互促互进的深层次关系，不仅对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政党制度为重要依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利于通过整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要素和结构关系来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在人类政治文明体系中深度构建政党政治文明的中国样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N]. 人民日报, 2018-03-05 (1).
- [2]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蔡奇主持 [N]. 人民日报, 2023-06-03 (1).
- [3] 周淑真. 中国共产党与政治文明新形态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 (6): 4-11+71.
- [4] 张献生. 我国政党制度是对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 [J]. 红旗文稿, 2017 (5): 15-17.
- [5] 刘秀玲. 新型政党制度所蕴含的中国智慧 [J]. 理论探讨, 2021 (1): 125-131.
- [6] 王露, 王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方案的陶铸 [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0 (4): 46-53.
- [7] 靳晓霞.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征优势及其传统文化根源与创新 [J]. 科学社会主义, 2022 (1): 94-101.
- [8] 蒋英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四重来源及其整合——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视角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 1-13.
- [9] 王新影, 温林森. 新型政党制度: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政治成果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5): 40-52.
- [10] 黑格尔. 历史哲学 [M]. 王造时, 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6: 110.
- [11] 张献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政治文明新形态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104.
- [1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 年 7 月 1 日) [N]. 人民日报, 2021-07-02 (2).
-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 [M].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217.
- [14] 王天海, 王彩玲.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发展逻辑与文明价值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0 (1): 68-75.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2021 年 6 月)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0.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18.
- [17] 孙代尧. 中国政治发展新道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 (12): 67-75.
- [1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4.
- [19] 李维汉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309.
- [20]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1 年合订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7-48.
- [21] 习近平向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致贺信 [N]. 人民日报, 2020-12-15 (1).
- [22] 林尚立. 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76.
- [2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N]. 人民日报, 2023-08-16 (1).
- [24] 王韶兴.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6): 4-24.

刘志礼, 魏梓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26-37.

- [25]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3-02-08 (1).
- [26]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开班式 刘云山主持开班式 [N]. 人民日报, 2014-02-18 (1).
- [2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2-23.
- [28] 林华山. 多维互嵌: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功能 [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6): 32-41.
- [29]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显成效 生态优势“激活”发展新动能 [EB/OL]. (2023-09-14) [2023-11-20].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3/09-14/10077935.shtml>.
- [30]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蔡奇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3-03-16 (1).
- [31] 崔延强, 张子扬.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阐释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1): 14-26.
- [32] 魏崇辉.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基本定位、方法遵循、根本依托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23-34.
- [33] 毛泽东文集: 第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56-157.
- [3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67.
- [3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6年7月1日)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6: 20.
- [36] 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 [EB/OL]. (2023-01-12) [2023-11-20]. <https://www.cndca.org.cn/mjzy/mjgk/mjzc/1807287/index.html>.
- [37]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J]. 求是, 2022 (14): 4-8.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团结的现代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合形态与实践路径

戴洁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西方式现代化内蕴的分裂风险，开辟一条以团结为核心价值的现代化道路，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使西方国家与社会呈现愈演愈烈的分化与分裂趋势，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贫富悬殊，政治领域的利益博弈与对抗，社会领域的狭隘个人主义与原子化，生态领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全球视野的文明冲突等。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导致国家与社会乃至国际关系深刻的分化与分裂危机，值得反思。中国创新性地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团结为核心价值理念、增进团结的现代化，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合形态。其实践路径具体表现为：政治文明上追求同心同向，物质文明上追求共同富裕，社会文明上追求共享共有，生态文明上追求和谐共生，全球文明上倡导和平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团结现代化的机制，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合开辟了实践路径，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中国式的典型样本与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团结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整合形态；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1-0038-14

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运动，引导人类文明发生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具体表现为：在经济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1.003

作者简介：戴洁，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引用格式：戴洁. 团结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合形态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38-51.

结构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型，在社会结构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意味着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变迁，“就是指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社会系统所发生的任何非重复性改变”^[1]；“是指同一系统在前后不同时点状态之间的差异”^[2]。自人类文明开启现代化发展进程后，全球社会的演化和变迁可谓日新月异，使世界各国卷入波澜壮阔的革新浪潮之中。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内蕴着深刻的分裂危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早在 17 和 18 世纪就已经发轫，是一条趋向个人主义与社会分化的现代化道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3]，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4]。这意味着西方现代化道路中蕴含着否定自身和走向分裂的力量。盲目借鉴西方现代化运动的早期经验，甚至将其视为现代化发展的普适模式，给诸多后发展国家（直至 20 世纪民族独立运动后才开启现代化）带来国家与社会的分裂危机。以拉美诸国为例，其在二战后全盘接受了西方现代化模式，采取市场自由化、资本私有化、政府全民选举且对经济不进行宏观干预和调控等举措。在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起飞之后，它们迅速陷入极端的贫富分化、压抑的阶层隔离、剑拔弩张的政治博弈等困境，进而撕裂社会成员的整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国家弥漫着分化与分裂的危险。

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5] 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甫一提出，便引发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差异的探讨。任剑涛基于现代化的独异性视角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党的领导和中国国情紧密关联^[6]。程赞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在于其是一条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客观实际、文化传统、制度体制、思维方式等要素推动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7]。蒋永穆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发展道路探索的历史经验^[8]。臧峰宇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9]。袁红英论析中国式现代化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逻辑关联^[10]。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文明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和包容性。他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11]。中华民族文明现代化迅速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胡佳等阐述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选择^[12]；魏崇辉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基本定位、方法遵循与根本依托^[13]；陆卫明等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14]；陈金龙论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蕴含的包容性精神^[15]；何玉芳等分析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增强民族共同体的意识^[16]；肖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下阐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17]。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不过，现有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其一，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整合形态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学界对此依然缺乏具有学理抽象性的凝练，需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其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两者之间

的逻辑关联，目前的研究依然不多。其三，贯通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学理依然未得到深入阐述，需要进一步探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11]。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方向^[18]。本文以“整合与团结”为核心理念，阐明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相比所具有的突出的团结特质，并在此基础上探析中国式团结机制如何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呈现整合形态。

二、人民本位：建设同心同向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在历史演进中，政治主体通过政治行为与政治实践形成的文明成果。政治是政治主体对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政治文明程度反映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水平。政治以国家权力为核心，通过政治体制和机制实现对政治权力与政治利益的配置安排。西方式现代化建立在政治分权、对抗和极端博弈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则与之显著不同，以人民为本位实现政治团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一）西方政治现代化：利益对抗的现代化

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建立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相较于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而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具有显著的革命性。“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占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妙东西。”^[19]资产阶级为了鼓励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扩大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自由竞争，保障劳动分工和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必须突破封建专制主义限制国民的人身自由、限制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限制自由的市场和贸易等，建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民主和法治体系，建立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与政治制度。在用机器大生产取代工场手工业后，“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专制王朝”^[20]。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以资产阶级及其利益集团为核心的博弈政治。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正式代表，“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 29}。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制度框架，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3] 33}。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活跃着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者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19] 110}。资产阶级用金钱操控着民主和法治，这种统治中充斥着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群体的激烈矛盾和斗争。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政治理念：团结有序

追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流，其在国家与政治治理领域蕴含着深刻的维护国家统一的传统，以及

为政以德、以民为本的思想。其一，国家是全体民众的国家，国家分裂会造成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民众的生计和生活陷入危机，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二，政治治理体现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国家的政治治理中，民众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应当将民众的利益与福祉作为政治治理的主旨目标，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与利益。《荀子》有云：“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在传统社会中，即使是君王，亦须认识到其职责主要是为全体民众谋福祉，而非滥用权力压制民众。《三略》有云：“为国之道，恃贤与民。”执政者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使国家治理有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是为实现全体人民福祉的革命。“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 39}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采取政治行动，在与资产阶级的不懈斗争中夺取政权。共产党人代表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其自身并未有与整体无产阶级不同的利益。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人民是当家作主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实践者与发展创造的创造者，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尊严受到人民民主制度的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是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的基石，以民主和法治保护人民实质的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代表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它们自身并无特殊的利益，政治治理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增进人民的利益与福祉。

（三）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治文明：追求同心同向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治文明主张人民本位。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和执政党，自身没有特殊的、不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保障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主体性。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阶级的统治，“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3] 50-51}。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全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1]。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治文明追求同心同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尚未达到极度富裕的水平，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构同心团结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促进政治团结的战略机制^[22]。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利益集团为主体实施政治博弈、维护各自集团的特殊利益有所不同，中国的现代政治文明强调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统一，在同心圆的框架下建构统一战线的政治团结。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存在政治对立阶级在根本利益上的博弈与斗争，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同时，社会中依然存在丰富的多样性，执政党与参政党、多民族、多宗教、多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会有其在具体社会生活利益上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治文明是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心圆里，团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摆脱政治博弈的对抗式思维框架，发展凝聚人心与团结共识的政治文明。

三、为民造福：建设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

物质文明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人类在改造自然世界的生产性活动中获得生存与生活的条件。在生产性活动中，人类累积有关物质世界的知识，探索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通过发明和创新改进生产工具，发展科学和技术，创造人类需要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物质文明反映物质生活的丰裕程度，同时体现物质资源的分配方式。西方式现代化的物质财富分配呈现显著的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则是要建立共同富裕的社会，实现物质财富的均衡与合理分配。

（一）西方经济现代化：贫富悬殊的现代化

西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以社会化机器大生产为物质生产条件，以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关系基础，以资本剥削雇佣工人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具有革命意义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以个体化的分散劳动为基础，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具有了运用机器实施社会化生产的能力，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把货币转化为资本，把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集中起来，通过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以及运用社会分工和自由贸易等机制提升劳动生产效率。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1] 32}。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围绕着资本展开生产，并以资本作为分配物质和经济财富的最重要依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它是资本的所有者”^[23]。拥有资本的一方成为资产阶级，利用其支配权力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被资本雇佣的劳动者则成为无产阶级，失去了出卖自身劳动以外的自由和权利。“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24]由于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的位置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主要的阶级阵营，两个阶级在生产与分配中的利益是直接冲突和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个人主义与资本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在资本的累积效应下出现剧烈的贫富分化。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物质观念：协调均衡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源流中，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领域，拥有深厚的均衡分配物质财富、照拂物质匮乏群体的思想和理念。首先，主张均衡地分配物质财富，避免不合理的分配造成贫富悬殊。《论语》有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晏子春秋》有云：“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此两处的“均”皆非“平均”，而是“均衡”。无论是微观的家庭或是宏观的国家，在分配物质财富时，需要均衡地考量现

实情况，合理地进行财富分配，过于悬殊、不公正的财富分配不仅会纵容个人的奢侈，更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其次，关怀物质匮乏的困境群体，使其能维持基本的生计。《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经济生活中，当有群体不幸陷入物质贫困、生活难以为继的处境时，需要社会予以关怀，使处境艰难的人们得到维持生活的物质帮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现代化发展的革命性意义之后，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社会化生产与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根本性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是根据人们对于资本占有的所有权而分配的，分配产生了马太效应。其后果是：“一面是资本家，一面是雇佣工人；一边是世袭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袭的贫困；供过于求，市场无法吸收日益增加的大量的工业品，不断重复出现周期——繁荣、生产过剩、危机、恐慌、慢性萧条、贸易逐渐复苏，这种复苏并不是持续好转的先兆，而是新的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先兆。”^[25]物质财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不仅造成贫富悬殊，且极端贫富悬殊导致的后果是可预见的：由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难以购买和支付源源不断生产的商品，而出现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分配方式存在严重问题，现代化发展举步维艰。

（三）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物质文明：追求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26]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建设，既受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均衡地分配物质财富思想的浸润，更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本质上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现代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在特定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完成其历史使命，必然向新的历史阶段演化。“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会采取新的形式。”^[27]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会产生新的制度趋势，“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19] 46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生产力落后的艰难处境下开启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逐步建设起初级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我国主要面临的发展任务是尽可能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总量、提升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0] 538}。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得到全面提升，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良好局面。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变迁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共同富裕的目标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28]

四、共同治理：建设共享共有的社会文明

社会是指在个体私人领域与国家政治领域之间的社会生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并非个体的私人领域，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性。如哈贝马斯所言，公共领域“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众开放”^[29]。社会生活领域亦非国家政治领域，它涵括惯习、风尚、公共道德等，具有非正式的特质。西方式现代化的公共领域呈现典型的原子化与个人主义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社会团结与整合，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共同体的社会治理。

（一）西方社会现代化：个人主义的现代化

西方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视和突出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商品的分工生产与自由流通、市场的自由贸易、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皆是必要的条件和机制。社会民众需要从原有的集体身份中脱离，成为“自由”的劳动者，才能为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极端的个人主义会引致社会解组的发生。社会解组是指一个社会趋向原子化的过程，即在剧烈的社会分化作用之下，人们之间逐渐失去社会关系与联结。“社会原子化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解组运动的直接产物，是对社会整合状态的否定。”^[30]当社会解组发生时，社会成员普遍经历着“一种脱离道德基础，不再有任何准则而仅有互不相关的冲动，不再有延续感、民族感和责任感的人的精神状态”，“一种个体的社会团结感（其精神力量的主体）被打破或被致命削弱的精神状态”^[31]。当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又缺乏凝聚机制时，社会系统的维持会面临危机。

西方国家在社会生活领域泛滥的极端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严重挑战社会生活的正当合理秩序，引发个体心理与社会秩序的严峻问题。纵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会产生社会分解效应：“每一种分解作用都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分散作用，人类的劳动分工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个人之间的分歧”，“它们要想共同产生影响，就必须通过同等的和永久的原则来不断提防和阻止不协调的情况发生”^[32]。在快速的现代社会转型中，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若缺乏必要的制约，则可能使社会陷入整体的混乱与失范。“工业不再继续被看作为达到一个超越它的目标的手段，而是变成了个人和社会的最高目标。但是工业所引起的种种欲望却可能摆脱限制他们的任何权威。可以说，这种把幸福神化的做法在使欲望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使欲望高于人类的任何法律，似乎制止欲望就是一种亵渎神圣的行为。”^[33]个体贪婪的欲望与无止境的索取，使社会结构的分化呈现失序与失范的混乱图景。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理念：共享共有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而深厚的社会团结思想和观念。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依附于土地生活，土地是固定的，人口的社会流动性自然较弱，从而形成了一种社会成员彼此“熟悉”的社会空间。与西方国家在封建社会时期盛行的贵族统治制度显著不同，中国乡土社会在儒家文化“推己及人”思想的影响下呈现出一种以礼法作为规制的社会秩序。乡土社会是社会成员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社会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发展出丰富的社会团结理念和规范。《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社会交往中，人们需要讲求诚信、和睦相处，使社会有良好的信任秩序。《左传》有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在社会成员的互动中，亲近仁义、善待邻里是社会倡导的美德。《孟子》有云：“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在社会共同生活中，人们需要互相支持和扶助。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形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冲突得到根本解决。“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0] 185}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极端个人主义与虚伪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人与社会皆被异化了。“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23] 207}在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是真正自由人的联合体。“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34]

（三）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文明：追求共同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文明建设重视共同体的作用。社会共同体是指在社会生活领域由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性或相似性而联结组成的各种层次的群体、团体和组织，主要涵括家庭、家族、社会群体、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社区等形式。在现代社会中，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确会使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社会联结变弱，但是亦推动了职缘和趣缘等新的社会联结方式兴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文明进程，重视传统文化中深厚的社会团结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建设理想社会的社会团结理念，推动以血缘、地缘、职缘和趣缘等社会关系联结而成的共同体建设，在社会成员之间构筑温情脉脉的“有机体”。“这样的关系包含了人们的相互扶持、相互慰藉、相互履行义务，它们在人们彼此之间传递，并且被视作人的意志及其力量的外在表现。通过这种肯定的关系形成的群体一旦被理解成统一地向内或向外发挥作用的生命体或物体，那么它就被称作一个结合。”“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那么它就是共同体的本质。”^[35]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文明建设注重共同治理。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社会要素与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飞速加快，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的持续变革引发社会生活领域不断出现新现象和新问题。过于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在应对现代社会生产与生活中日新月异的社会问题时，会陷入混乱和失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及其治理是各国重视的议题，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个人主义的治理方式不同，中国的社会治理倡导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社会成员通过社会联结形成治理共同体，在共同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利益的目标指引下，通过多样化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合作的方式，共同应对和处置社会问题，增进社会福祉。

五、天人合一：建设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合理调适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关系的文明，以实现人类永续发展与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既依赖自然生存，又通过改造

自然的行动发展与进步。现代化运动使人类掌握了大规模改造自然世界的规律、知识和技术工具。西方式现代化在考量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时以人类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则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

（一）西方生态现代化：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化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采取了将自然与社会割裂和对立的态度。在 19 世纪西方国家启动工业革命之前，自然世界对人类社会而言是强大而神秘的。人类在自然世界中开展生产性活动，并依靠从自然世界中获取资源而生存和生活。人类在适应自然世界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知识、发展技能、制造工具等，学会利用自然资源及改造自然世界。但与此同时，受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等条件限制，人类整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人类崇拜自然的力量，对自然世界怀有敬畏与尊重。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掀开了大自然的神秘面纱，使自然世界不再具有崇高的魅力。祛魅后的自然世界，在人们心中逐渐失去了神圣的情感与价值。“人们曾一度透过面纱——仪式和典礼、女神和吐火龙、日常生活中无数可怕的意外——来理解世界，现在，每天开通的火车就可以把游客带到特兰西瓦尼亚的城堡中。”^[36]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现代化，不惜给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的主要产业由农业向工业转型。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主要利用自然的水能、风能、生物能源等；而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则需要石油、煤、天然气等能源，在农业生产中亦开始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加之大规模砍伐森林为工业生产提供资源，给空气、水、土壤、河流、海洋、生物资源等造成巨大破坏。此种破坏性的发展引致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一系列严重危机，使得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重。“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37]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呼吁世界各国、各地区和人民共同关注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生物多样性锐减等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倡导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态理念：天人合一

中华文化思想不主张将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割裂和对立，认同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宇宙天地与自然世界并非外在于人类的力量，而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源泉，人类需要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并使两者达至合适的平衡。《千字文》开篇云：“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句话形容宇宙天地与自然世界的无限浩渺与神秘。《周易》有云：“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人类作为宇宙和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应当顺应宇宙运行的自然规律，与天地、日月、四时相合，使自身与自然世界和谐统一。《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社会应当遵循自然世界的规律，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庄子》有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宇宙天地与自然世界的万事万物看似千差万别，但归根结底皆有同一渊源，人类与宇宙万物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需要遵循天地自然的规律，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人类欲望为轴心，片面追求物质和经济利益，将自然世界视作供人肆意攫取和掠夺的资源和客体，对自然生态不予以爱护和珍惜。事实上，人本身是自然的

存在物。“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0]¹⁶¹ 伴随人类社会生产力提升，有能力发展工业化时，人依然须善待自然世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7]³¹³⁻³¹⁴

（三）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生态文明：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在经济起飞阶段需要采取粗放型增长的发展模式，面临人口及经济增长与生态资源承载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在现代化启动阶段，后发展国家对于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超出生态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承载能力和水平。在工业经济起飞时期，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往往是发达国家剩余的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产业。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这给资源与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即便不顾及资源与环境的整体制约，经济发展亦会很快走至增长的极限。后发展国家在积累一定物质基础后，要及时调整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发展策略，实现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这要求“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38]。“可持续发展关系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关系各国的生存与发展，关系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各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努力保持和改善环境质量。”^[39]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改革开放 40 余年，我国在经济发展领域获得巨大成就，为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提升至更高的发展战略地位。中国式现代化吸收传统文化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吸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与自然世界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辩证思想，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方向。西方早期现代化以肆意破坏与污染环境生态换得片面的经济增长，其对生态与社会产生的严重损害后果值得后发展国家引以为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中国若采取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方式发展现代化，会给全球生态环境造成难以预计的损害。为此，我国主张“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40]，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

六、合作共赢：建设和平发展的全球文明

现代化运动推动全球化进程，人类的生产与贸易、交往与生活日益突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地理界限，人类前所未有地紧紧关联在一起。人类正在创造亘古未有的全球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全球视野中，西方国家立足于西方中心主义，强调自身的霸权地位，以“文明冲突”的假设看待人类多元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视野致力于团结与整合，尊重不同民族文明的独特性，坚持合作共赢，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实现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一）西方现代化的全球扩张：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

西方国家实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寻求资源、商品与市场的扩张。资本的本质决定着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张的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中的商品愈来愈丰富，资本主义通过生产和销售商品获取利润，促使资本持续地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以拓展广阔的市场。“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41]资本主义通过投资与扩张不断积累新的资本，获取资本利益的本能又推动其再扩大或开辟新的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 31}在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全球扩张的进程中，世界各国逐渐卷入现代化运动的浪潮。“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20]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扩张，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取向。尽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拓展世界资源与商品市场的过程中，诸多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要素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外生力量的推动下开启现代化的转型，但因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一度将后发展国家变成攫取资源与倾销商品的殖民地。“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24] 860-861}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运动中，世界诸多国家和民族遭受了西方殖民统治的残酷暴行。“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42]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球理念：合作共赢

中华民族文化中“天下”的观念颇具特色、源远流长，在初民社会时期，中国已出现了“天下”的思想。远古时候的先民将宇宙视为“天圆地方”的时空体系，人类生活的空间是“地”，“地”在“天”的下方，由于只有一个“天”，因而全部的人们都生活在一个“天”之下，可谓“天下”。“天下”涵括了当时人们所能想象的全部自然地域和地理空间，是“九州”“四海”和“四方”。中华民族的先贤智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在与周围各部落、部族和民族交往时，既能意识到自身和其他民族的不同，又能认识到不同民族可以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那是一种全体人类都应遵循的“大道”。在三皇五帝的尧舜时代，即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追求不同民族和国家应当和睦友爱、和谐共处。《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当大道得以施行时，天下即为全体人类所共同拥有。北宋张载的《西铭》有云：“凡天下疲癯、残疾、惛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句话主张，生活在“天下”的全体人类，应以同胞兄弟的身份对待彼此，那些深陷困境的人们亦应得到其他人的援助而安顿生活。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和市场扩张时采

取的殖民主义残暴侵略与统治的方式。西方国家率先获得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进步, 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但在此过程中, 西方国家以技术和经济上的领先优势作为武器, 用坚船利炮打开其他国家的国门, 并使其成为西方国家原材料生产和商品倾销的基地, 不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使殖民地国家长期陷入严重的落后和衰败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政策不仅给殖民地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而且对西方国家自身而言亦是不利的。“从爱尔兰历史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 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43] “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 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因此, 只要波兰没有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20] 696} 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中, 奴役与被奴役的双方皆不可能获得和平与解放。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视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视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樊笼, 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性与独特性, 尊重世界诸多国家、民族、文明的多样性。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身发展的历史与文化遗产, 在千百年适应生态环境与发展社会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形态, 是全体人类共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财富。《礼记》有云: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宇宙天地之大, 能容纳万物共同生长而不相互危害, 多样的文化和文明能够自洽运行而不相互矛盾, 天地之大道能化育万物而和谐共存。各个国家和民族尤其是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强大的国家和民族, 应当尊重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独立性。“要保障国际和平, 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 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 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这样, 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从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增长, 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 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21] 463-464} 奴役和剥削不可能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视野核心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为世界各国、民族、文明的共同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近十年来, 伴随新兴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全球工业化和信息化转型加速, 将世界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金、资源、人才和市场等紧紧联系在一起, 世界各国呈现紧密联结、相互嵌合的网络结构。在网络状的全球经济与社会结构中, 世界全体人民享有共同的经济与社会利益, 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互联网络和移动设备的兴起和普及, 使世界各国人民的互联和互动、沟通和交流更加便捷可及, 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明有更多交互和分享的机会和平台。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 愈来愈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认同的价值理念, 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和基石。当今时代, 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 全球性的经济与社会交往愈加频繁, 世界范围内的风险在不断累积和扩张, 战争与和平、绝对贫困、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共同的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44]

七、结语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现代化进程持续加速。改革开放 40 余年获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极大提升, 国际社会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既需借鉴西方发达

国家在现代化历程中积累的具有客观规律性的有益经验，更要防范和警惕西方国家现代化遭遇的分化与分裂危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给西方国家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但其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决定其是一种以分化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在国家与社会各个领域呈现剧烈分化的特征：经济贫富悬殊，政治利益对抗，社会原子化趋势，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割裂，极端的西方中心主义等，引致国家与社会、国际关系领域等出现深刻的分化与分裂。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分化与分裂的迷思，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团结为核心价值理念、增进团结的现代化，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合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合实践主要表现在：政治文明上坚持人民本位的整体团结，物质文明上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社会文明上构建共享共有的共同治理体系，生态文明上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全球文明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依然面临诸多分化的风险：信息时代中个体主义的滥觞，共同体建构的边界与冲突，全球化背景下外部矛盾和危险的涌入等，都可能给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整合造成严峻挑战。面对分化与分裂的风险，中国必须紧紧把握团结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团结为指引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为世界各地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中国方案与新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 [1] Hawley A.H. Cumulative Change in Theory and in History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8 (6) : 787-796.
- [2] 彼得·什托姆普卡. 社会变迁的社会学 [M]. 林聚任,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 [3]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30.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471.
- [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6] 任剑涛.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基于现代化的独异性视角分析 [J]. 探索, 2023 (5) : 1-13.
- [7] 程赞, 吴俊.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 : 10-19.
- [8] 蒋永穆, 祝林林. 中国共产党百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经验 [J]. 求是学刊, 2022 (2) : 1-14.
- [9] 臧峰宇.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 (7) : 39-55+204-205.
- [10] 袁红英.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 [J]. 东岳论丛, 2022 (12) : 5-16
- [1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6 月 2 日) [J]. 求是, 2023 (17) : 4-11.
- [12] 胡佳, 田探.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选择——基于对“三大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发展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 112-125.
- [13] 魏崇辉.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基本定位、方法遵循、根本依托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 23-34.
- [14] 陆卫明, 王子宜.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J]. 探索, 2023 (5) : 14-25.
- [15] 陈金龙.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特质与价值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8) : 16-21+204.
- [16] 何玉芳, 张晓.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坐标、场域与进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 81-92.

戴洁. 团结的现代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合形态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38-51.

- [17] 肖灵.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重内涵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10): 21-27+181.
- [18] 韩云波.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国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J]. 科技与出版, 2023 (12): 11-25.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48.
-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80.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570.
- [22] 林华山, 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26-144.
- [23]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19.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5.
-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36.
- [26]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016年1月18日) [N]. 人民日报, 2016-05-10 (2).
-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40.
- [28] 习近平. 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J]. 求是, 2022 (16): 4-9.
- [29] 汪晖, 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 [G].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25.
- [30] 田毅鹏, 吕方. 社会原子化: 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 [M]. 天津社会科学, 2010 (5): 68-73.
- [31] Maclver R. M. The Ramparts We Guard [M].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55: 84-85.
- [32] 迪尔凯姆. 社会分工论 [M]. 张鹏,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17: 234.
- [33] 迪尔凯姆. 自杀论 [M]. 冯韵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77.
- [34]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198.
- [35]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M]. 张巍卓,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67-68.
- [36] 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尔·马可夫斯基. 发现社会 [M]. 李霞,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19.
- [37]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313.
- [38]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我们共同的未来 [M]. 王之佳, 柯金良, 等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52.
- [39] 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 (摘要) [N]. 人民日报, 2008-10-26 (3).
- [40] 习近平. 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 (2013年9月7日, 阿斯塔纳) [N]. 人民日报, 2013-09-08 (3).
-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69.
-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90.
-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359.
- [44] 赵成. 习近平会见“2018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 [N]. 人民日报, 2018-12-13 (1).

责任编辑: 龚静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与话语构建

樊士博 白金艳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标识性概念，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立足本来之传统，把握外来之经验，面向未来之发展，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契合。话语源自实践、彰显特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具有物质形态、精神形态、制度形态三重形态。话语反映思想、揭示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蕴含着人心不可乱、民族不可分、文明不可断、潮流不可逆的内在目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对接现实中找准定位；应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在融会贯通中明体达用；要在“两个结合”中开辟文化发展新境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对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大有裨益，对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创造；文化强国；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1-0052-13

DOI：10.13946/j.cnki.jcqiis.2024.01.004

作者简介：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白金艳，华东师范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的话语创新研究”（2022EDS003）；华东师范大学“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项课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叙事研究”（2023ECNU-XWHSX04）

引用格式：樊士博，白金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与话语构建[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1）：52-64.

2023年6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 2023年10月7日至8日,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概念,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源自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 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赓续民族根脉的文化气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清晰的话语目标和独特的话语形态, 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原创性概念, 突显了中国共产党以文化人、以文润心的实践求索。立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框架探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有利于阐明党的创新理论的现实关怀。从理论上,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重大意义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从实践上看,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命题, 系统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自觉。当前世界历史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旨在实现“再现代化”, 此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2]。由此而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使命揭示, 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实践的有力抓手。

截至目前, 学界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研究已产生了丰富成果。总体观之,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研究。刘同舫认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历史语境、历史方向和历史方法上延伸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运用, 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责任担当^[3]。吴晓明认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必然要求在“文化结合”的锻炼中产生出历史性的文明成果^[4]。二是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定位研究。齐卫平认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核心概念, 彰显了新时代的文化使命^[5]。沈壮海指出, 要从使命发展和文化增量角度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6]。魏崇辉认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7]。三是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角度开展的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有学者指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时代要求^[8]。孔新峰认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具有重大原创性的新型复合概念^[9]。黄蓉生认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独特标识和闪亮特色^[10]。

不难发现, 既有研究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讨还停留在党的创新理论本身, 主要以宏大叙事为主, 从话语角度展开的中观研究、学理探察仍较为鲜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11] 没有新话语, 党的创新理论就很难“飞入寻常百姓家”。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的外显。社会结构影响话语结构, 决定话语制度, 但话语在社会意义上也具有建构性^[12]。“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 富含话语价值。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缘起、表现形态以及话语旨归, 对于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传承与现代表达, 是新时代

文明发展成就的理论跃升，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概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立足本来、把握外来、面向未来，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广阔的意义表达空间。

（一）立足本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根源

话语离不开文化，厘清话语的产生根源对廓清话语概念的意义指向具有原初价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创造建立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基础之上，诠释着中国共产党继承文化、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恢宏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13]这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创新反映中华民族的历史因循，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座富矿，守好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建设的根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大成，聚党的创新理论之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产生的根源，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脉”。梁启超曾断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14]梁启超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正在于中华文化的稳定性、稳固性。李大钊同样认为：“古代自有古代相当之价值，但古虽好，也包含于今之内。”^[15]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早已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早已将正确对待、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中华文化历经千年而质不朽，历经沧桑而色不变，其基本精神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历史、着眼现实，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五大特性内在统一，揭示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精神品格，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旺盛生命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时代表现，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概念，是中华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历史总结与未来构建。

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新概念，是对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建设成就的回望与总结。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始终把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强调：“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16]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挖掘传统文化，毛泽东提出：“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7]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文化建设，极大改变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面对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新任务，邓小平强调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的发展思路，在经济建设中突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作用，并将其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一同推动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18]在百余年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展现出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形成了党的光荣传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突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担当。

（二）把握外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比较

举凡话语，必定在比较中彰显功用，在对比中明确优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展现了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深刻理论关怀与未来使命担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融通中外, 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但这绝不是照搬照抄、东施效颦, 而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 绝不能拒绝比较, 更不能害怕被比较, 而是要在比较中明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优势。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是近代以来困扰中华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近代以来, 随着坚船利炮打开清廷大门, 西方文明也大量涌入中国, 中华文化主体性遭到挑战。在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下, 无数仁人志士在中西文化对比中陷入迷思。有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 企图以西方为师, 推动中华文化的“自我调和”。不过, 文化思想上的救国之路仍缺少先进理论的科学指导。因此, 古今之争、体用之争、中西之争连篇累牍、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外学来的科学真理。”^[19] 此后, 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旷日持久的文明交融与碰撞、文化比较与交流中, 中华民族以我为主, 把握外来经验, 扬弃西方话语概念, 实现了中华文明话语的历史嬗变。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史证明: 发展中华文化必须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既不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也不能全盘接受、贪大求洋。只有充分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并经过中国化的改造, 外来文化才能在中国大地释放活力。

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 打破了一部分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盲目迷信, 有利于描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道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创造是文明传承的确证, 是话语比较的重新发现。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 没有自身强大内核与稳定传承的文明容易迷失自我, 最终被完全同化, 消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创造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 是历史与现实交联相通的变奏曲。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只有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才能找准自身的文化定位、发扬自身的文化优势。可以说, 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 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汲取世界现代文明精髓、在比较中实现共进的恢宏气度。

(三) 面向未来: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实践

廓清话语概念, 需要回到话语实践的源头, 进而寻找话语产生的行动根基。话语的本质属性是实践性, 实践是话语的根源。实践形成的新话语, 也必须回到实践、反哺实践、促进实践^[20]。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是在面向未来的实践中提炼而来的, 反映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文化强国的理念与使命。

从国内看,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实践必然, 指明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路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中华文化精彩纷呈、独领风骚、引领世界。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 就是因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变革。实践发展不断改造着中华文化的存在状态, 也促进着中华文化的时代更新。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成为催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 据此而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的文化产物。归根结底, 文化进步、文明重塑都是社会实践催动的结果。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包含着文化再造、文明更新的目标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到 2035 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先进的思想文化

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18] 164}这就深刻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面向未来提出文化使命的重要性。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需要硬实力，更需要文化软实力。

从国际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文化百花园，为世界其他国家文化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化世界从来不是独一的，而是多元的，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世界的多样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21]新变革提出新要求，处在十字路口的世界面临新选择，“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1] 595}。在这个文明交流、交锋与交融日益加深的世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既有助于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形象，也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和平发展的文化选择。

二、复合的话语类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体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集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吸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总结，彰显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话语表达需要借助一定的呈现形式，比如符号、文本、语言等。话语形态不仅包含着关于对象与议题的话语陈述，还涉及二者的具体呈现状态，具有强烈的人文属性和意识形态取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形态可分为物质形态、精神形态、制度形态，分别指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不同层面。

（一）物质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表现

话语具有实践属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本质上也是实践的，集中体现在物质形态上。只有以实践发展为基础的话语，才能厚植坚实的物质基础。物质的极大丰富是精神文化兴旺发达的前提和条件。尽管文化有时具有超前性，但仍是物质实践催生的结果。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常常表现为实践与话语的关系。当然，话语的实质也是实践着的，其原因在于实践需以话语作为媒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创造，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息息相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表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物质形态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物质文明财富与一切物质文明成就。

物质形态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形态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21] 19}现代化是具有复合性的使命追求，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社会革命的内在要义。近代以来，追求文化上的现代化是仁人志士的重要任务。在中西文化互通、古今文化互动的进程中，文化的话语形态也随物质世界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话语来源，也是作为其表现形式而存在的物质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是现代化在中国大地上的本土化与时代化表

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的物质形态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巨力, 对推动思想认识的巨大发展、凝聚不断向前的奋进信念、及时调节现实领域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生要求之一。

(二) 精神形态: 实现精神世界的独立自主

话语的本质是实践, 人类社会的实践又产生了文化。据此而言, 话语在形态上始终是属于精神层面的, 从属于文化领域的。可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形态对人们的思想改造与精神凝聚发挥重要作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的精神形态兴盛于历史发展进程, 既从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精神文化成就与精神文化产品中不断吸收养分, 也不断兼收世界各民族精神文化的合理内核, 在突出强调中华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推动现代性、时代性的有力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紧密相连, 前者受后者发展状况的制约, 但也对后者起到能动的反作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的精神形态主要通过增强文化自信、历史自信, 进而实现精神世界的独立自主表现出来。历史上的中国经历过辉煌, 但在近代由于封闭与自大走向落后。先进的中国人在反复试验中, 逐渐把目光由“器物”转向“制度”, 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 必须进行中国化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化与发展破除了社会对全盘西化的迷思,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与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两方面增强了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 提振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独立自主性。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铸就了一座又一座精神丰碑, 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言说了中华文明的红色内涵。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世界与中华文化相契合的确证。精神世界的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精神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 表达了其改变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重要话语目标。

(三) 制度形态: 中华文化具有大一统的传统

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的共同发展, 最终定型成为话语的制度形态。话语的制度形态反映着实践主体约定俗成、由内而外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制度形态, 是符合国家发展的话语表达形式。这一话语形态源自中华文化大一统的传统, 是中华民族历史精华的微缩, 是中华文化在现代的文脉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华民族长期的大一统传统, 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1] 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一贯追求, 这种统一性是中华民族长期存在、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原因。

大一统的传统构成了文明的发展机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制度形态主要源于中华文化大一统的传统, 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展现出来, 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式诠释出来, 通过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式表达出来。话语的制度形态是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表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承载着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历史言说。集体记忆无法被随意移植, 将长久延续在民族文化之中^[22]。中国历史的主流是统一, 即便是在封建王朝时期, 统一既是统治者的追求, 也是统治者的目标。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可以说, 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国家统一和追求统一的发展史。虽然在历史过程中经历过短暂的分裂与混乱, 但国家的统一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统一也具有多重表现形式, 国土的整全性、经济的流通性、行为的一致性都可视为统一的部分。归根结底讲, 文化上的统一是根本的统一, 国土面积可能伴随国家实力变化而放缩, 经济流通

性也可能因地域习惯而受到阻滞，但文化统一的力量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加稳固。每当面临外来的文化冲突时，中华文化总能凭借自身强大的包容性将外来文化融入己身，进而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完成新一轮文化跃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承了中华文化强调大一统的制度形态。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利用理论与制度话语表现其兼收并蓄、胸怀天下的品格。统一战线工作、民族政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举措，展现了新时代党的工作中胸怀天下、“万物一体”的博大胸襟，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制度话语形态的世界眼光与文明站位。

三、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旨趣

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23] 话语隐含目标指向，具有明确的话语目标。话语目标是话语内涵的意义延展，话语内涵是话语目标的现实根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落脚点^[24]。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时指出“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1]的共同信念，揭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基本旨趣。从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主要目标。

（一）人心不可乱：在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是关于“人”的理性讨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以“人”为中心展开的精神集成。在“仁政”与“人心”的互联、互通与互动中，中华文化逐渐形成具有固定内涵的文化形态。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文化关于“人”的精神内核与文明基因，自觉承担起重振文明的历史使命。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目标，首要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上，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精神期待为话语追求。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在文化建设中突出人的价值。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25]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化创作。文化一经生成就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为了凝聚共识，增强奋进力量。

文脉绵延传薪火，以文化人绽芳华。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精神期待共同指向了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的话语愿景。在各类思想文化多元发展、和谐共生的社会文化生态下，人民的文化需求更为高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需要从文化上凝心聚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1]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精神面貌的直接反映，昭示着一段时间内社会发展的直接状况。近代中国之所以式微，原因之一就是中华民族在文化心理上陷入自卑，在文化竞争中迷失了方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认识文化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命题。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能够激发民族的内生力量，凝聚“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的文化自觉，整合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可资借鉴的文化精髓，为民族复兴、意志凝聚、精神传承提供不竭动力。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的重要现实目标。

（二）民族不可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在民族层面的价值旨归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文

化认同。文化是通过共同体中的差异,通过互动的模式,通过超越社会内部的政治性机制而实现的^[26]。这就是说,克服民族内部的区隔本身就是文化的环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华文明发展、演进过程中不断实现衍化、进益的。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曾经历多次民族大融合,在不断演变中实现了各民族文化差异的整合,形成各具特色又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27]。中华民族具有相对稳定的空间分布格局,对内和睦共处,对外目标一致。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这个现实基础上产生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向民族团结、精神凝聚的共同愿景,是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依托,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意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话语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29]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重要指向,也自然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思想与价值认同,凝聚民族共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述说着中华文化的当代实践,对接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增强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应当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 文明不可断: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建设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推动文化进步、社会变革的基本诉求^[30]。中华文化主体性根源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是文化、文明发展的根本性特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亟待探寻的归宿。就这一点而言,廓清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从文化本体论上作出界定。“主体性”反映的是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对客观物质世界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种规定性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是国家、民族想要继续前进最深层的文化根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在文化遗产、文明进步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文化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党的坚强统一领导上,体现在我们对悠久历史的继承与发扬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比较与碰撞里,体现在“两个结合”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21]¹⁹诚如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强调“第二个结合”,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等一系列论述中均包含“中华”概念,旨在强调坚持民族性、主体性、本土性、中国性,这为坚定文化自信指明了方向^[31]。可以说,突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铸就文化新辉煌的重要路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形态,原因是中华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1]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32]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找到并确立了文化主体性，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了极大的精神文化财富。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先进理论激活中华文化的文明基因，促进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理顺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生产出具有突出中国风格的中国话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特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深层的话语目标。

（四）潮流不可逆：追求文明交流互鉴

话语的产出不仅要有思想内核，同时应当吸收世界各方话语的突出特征与现实成果，并通过话语交流将自身思想内核传播出去，不断提升理论影响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在文化交流层面的目标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交流交往是历史大势，封闭僵化是文明之殇。世界文化发展史告诉我们：文明在交流中提升，文化在互鉴中突破，“堵住耳朵”“闭上嘴巴”都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胸怀天下的精神气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最好证明。从“天下为公”的个人修养境界到“协和万邦”的国家交往法则，中华民族从不局限于狭隘的眼界，而是放眼家国、纵观天下。由于闭目塞听，近代中国在“天朝上国”的思想幻梦中逐渐偏离现代化主轴，最终导致被排除在世界主流之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往知来，向史而新。当今中国不断在中华文化话语发展的内核中展现出开放包容的特性，不断在话语的交流互鉴中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体系的发展与变革，不断展现中华民族胸怀天下的担当精神与世界眼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到区域合作与交流的不断加深，系统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共产党不断尝试在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激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新的火花。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胸怀天下的话语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胸怀天下”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每一个国家都是世界历史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把本国历史有机地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去，不断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是文明发展、话语传播的重要使命与内生目标。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不仅要在国内传播，还要在国际展开。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优化话语的内涵，提升话语的传播效能，向世界传递我们的理想信念。

四、抓住思想的关键：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路径

提升话语权、促进人民群众对话语理解的内化，既需要创新理论，也需要创新性的话语构建路径。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要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明体达用的维度展开。

（一）古为今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中国文化沃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表达也理应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的话语体系，在历史中汲取话语构建的养分，凝聚共同话语，构建价值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与精神，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构建的重要来源与动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

魂脉, 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 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地坚守这个魂和根。”^[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 理应纳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构建体系中来。

一方面, 深入挖掘中华文明中的潜隐性资源, 凝聚具有更大认同的民族话语。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脉赓续中, 产生了独具特色的话语表达, 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话语烙印^[34]。挖掘更多日用而不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话语表达, 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 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1] 15}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不断挖掘在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觉”的智慧结晶, 用以推进文明的更新、文化的重塑。

另一方面,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添新的时代性话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语言体系是现代化的、大众化的、时代化的语言体系, 要求更广的传播范围、更高的接受程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弃, 要遵循“尊古不复古”的重要原则。“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1] 因此, 完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 不仅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更深层的内容, 也要对其进行符合现代语言实践的改造。具体来说, 要加入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新思想、新内容, 契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说方式, 不断构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阐述体系, 在实践中充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内涵和外延。

(二) 洋为中用: 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 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 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35]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从根本上说, 是差异性文化^[36]。正因东西文化存在差异, 文明交流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才更加重要。尽管文化差异天然存在, 但文化的价值指向也存在天然相似性。话语的交流互鉴不仅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目标, 也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重要路径之一。话语在交流中构建完整链条, 也在传播中得到升华。

一方面, 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征, 它不总是赤裸裸的, 政治话语总是披上多样的价值外衣进行塑造与传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身处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 在话语互鉴中更需注意方式方法。当前, 借助互联网空间, 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1] 147} 因此,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传播中, 应当对西方文明进行拆解, 剥离其不适于当代中国的价值观, 发现其合理的话语内核与话语本质, 从而促进交流与借鉴。

另一方面, 不断挖掘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元素, 进而对接世界其他文明。坚持洋为中用, 需要合理利用其话语内核, 在比较中促进自身话语与价值体系的横向铺开。“讲好中国故事”是当

前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表达的重要方向。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需要我们在自己的文化沃土上发声，也要求我们在世界舞台上言说，这就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表达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还应善用新兴技术赋能文化传播。当今世界技术变化日新月异，为文化传播开辟了广阔空间，但也带来了复杂挑战。在互联网空间中，文明交融夹杂着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对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泥沙俱下的文化洪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必须正确厘辨暗含其中的不良因素，用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化内容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建设。

（三）明体达用：开辟文化发展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以“两个结合”为重要抓手，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是不断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明体达用”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认识文化发展规律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经验。“明体”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达用”要求自觉在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实践。中华文化生命体之所以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能够被运用，能够在实践中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精神资源。

客观上讲，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动党的理论创新，进而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有力体现和当代表现。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文化建设的方向，也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与方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本身就是当代中华文化发展的时代内容。面向未来，随着实践发展，要不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向前进步，开辟文化发展的新境界^[37]。

主观而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巩固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政党政治的核心概念，涉及政党引领文化建设、组建文化工作机构多重意蕴。从文化领导权的存在形态来看，它既有静态的一面，也有动态的一面。静态层面的文化领导权主要体现在文化工作的领导机构上，影响着文化事业发展的组织状况。动态层面的文化领导权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激烈博弈中。无产阶级政党历来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尤其注重意识形态的安全。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守正创新、守正出奇。鉴于此，中国共产党更应该不断夯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根基，驳斥外来话语的冲击与挑战，进而巩固文化领导权。

五、结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概念，有其独特的话语形态与突出的话语价值。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中，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必须以理解话语背后的实践为抓手。理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内涵、话语目标、话语形态，有利于助推中华文明发展和世界文明交往。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从话语角度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明确新概念、新话语构建的内在本质，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面向未来，只要我们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背后的实践逻辑，就能不断夯实文化发展的文明根基。在习近

樊士博, 白金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与话语构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52-64.

平文化思想指导下,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对进一步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年6月2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2] 张梧. 新的文化生命体: 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 [J]. 哲学研究, 2023 (11): 5-12.
- [3] 刘同舫.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唯物史观阐释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3 (12): 1-7.
- [4] 吴晓明.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使命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 (11): 24-28.
- [5] 齐卫平.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实现新文化使命提供指南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11): 1-4.
- [6] 沈壮海. 深入系统地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 (11): 32-35.
- [7] 魏崇辉.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基本定位、方法遵循、根本依托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23-34.
- [8] 齐卫平, 郑天骄.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内在理路和鲜明特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12.
- [9] 孔新峰. “现代化”与“现代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创新 [J]. 求索, 2023 (6): 45-52.
- [10] 黄蓉生, 耿靖. 习近平文化思想: 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与根本行动遵循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1): 1-13.
- [1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N]. 人民日报, 2023-07-02 (1).
- [12] 诺曼·菲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 [M]. 殷晓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59-60.
- [13]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103.
- [14]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31-32.
- [15] 李大钊全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5.
- [16]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63.
- [17] 毛泽东文集: 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345.
- [18]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64.
- [19]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2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93.
- [20] 樊士博, 齐卫平. 制度话语与话语制度: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创新 [J]. 治理研究, 2022 (6): 72-80.
- [21]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9.
- [22]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M]. 金寿福,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2.
- [23] MICHEL. FOUCAULT. 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on language [M]. New York: Pantheon, 1972: 216-224.
- [24] 宋友文.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理论创新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 (12): 1-7.

- [25]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3.
- [26] 阿兰·斯威伍德. 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M] . 黄世权，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21.
- [27] 许忠明.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机理：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研究 [J] .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6）：22-32.
- [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 [M]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45.
- [2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 人民日报，2023-10-29（1）.
- [30] 金德楠，宇文利. 民族文化禀赋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J] .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6）：13-22.
- [31] 韩云波.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国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J] . 科技与出版，2023（12）：11-25.
- [32]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 [33]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J] . 求是，2023（20）：4-9.
- [34] 黄伟. 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指向 [J/OL] .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31030.1032.002>.
- [35]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65.
- [36] 汪德迈. 中国文化思想研究 [M]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13.
- [37] 田凯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理论要义与战略功能 [J] .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4）：80-89.

责任编辑：林华山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术阐发与政治建构

魏崇辉¹ 王悦²

(1.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

2.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 学术阐发是对政治建构的呈现, 政治建构为学术阐发提供空间。当前很有必要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阐发的基本进路做系统梳理, 以进一步讲清楚习近平文化思想政治建构的逻辑。从连续性角度看, 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讨论在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中就已经开始做铺垫, 形成了以基本内涵界说、发展逻辑界说、理论特质界说、价值意义界说为代表的“四界说”学理范式, 实现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前期学术阐发。习近平在地方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文化新概念、新命题、新话语、新理念, 不仅为部署新时代的文化建设道路奠定了基础, 也为学术阐发党执政兴国的文化之维提供了基本视角。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面向历史、现实和未来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文化思想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独创性、集成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可从文化意义论、文化方向论、文化布局论和文化任务论等层面进行学术凝练。党的创新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 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不断得到理论总结, 必将推动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阐发的不断深入。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学术阐发; 政治建构; 地方实践; 国域完善; 开放性; 主要内容; 核心要义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1-0065-14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1.005

作者简介: 魏崇辉,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王悦,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类)重点项目(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课题基金项目)“‘中国精神’的历史渊源及其新时代新形态研究”(23JDTC058)

引用格式: 魏崇辉, 王悦.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术阐发与政治建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1): 65-78.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8 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思考，又有深邃的长远意义和世界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1]，是中国共产党践行新的文化使命的思想旗帜，是对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经验和成就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结晶。

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做好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必然要求，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呼唤。习近平文化思想引起了学界密切的关注。事实上，在党中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之前，学界就围绕核心要义、生成逻辑、实现路径、价值意义等方面，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习近平文化思想间接地展开了多角度、深层次的学术阐释，取得了丰硕成果。自明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概念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党的创新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不断得到理论总结，是政治建构的基本样态。学术阐发是对政治建构的呈现，政治建构为学术阐发提供空间。为此，当前很有必要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阐发的基本进路做系统梳理，以更好地做到“用学术讲政治”，进一步讲清楚习近平文化思想政治建构的逻辑。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阐发的基本进路：现状与展望

从连续性角度看，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讨论在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中就已经开始做铺垫。尤其是明确“文化自信”的地位后，这一研究快速兴起并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软实力建设、宣传思想文化、红色文化、革命文化、新时代英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领导权、廉政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文化统战等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研究。这一大批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前期学术阐发。

（一）基本内涵界说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多范畴发展的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主要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建设、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怎样进行文化建设系列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1]，学者们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基本内涵的讨论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体用结合”观点。这类观点从中国哲学特有的“体”与“用”范畴做阐释，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涵盖认识论又涵盖方法论，既包括宏观整体指导又包括具体实践路径^[2]，总结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两个结合”“三个事关”“七个着力”的重要内容^[3]，倡导在“马魂、中体、西用”中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4]。从“扎根人民群众之‘主体’，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总体’，立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整体’，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之‘大体’”论证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体系”^[5]的基本意涵，为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新角度。

第二种是“要素集合”观点。这种研究路向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关涉多种要素, 不仅包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6]等实践要素, 还包括文化的引导力、生产力、凝聚力、包容力、防御力、影响力、领导力^[7]与文化的认同、自信、自觉^[8]等理论要素, 形成“文化价值观、文化使命观、文化任务观、文化认识观、文化功能观、文化发展观、文化实践观、文化世界观”^[9], 更包括“六个必须坚持”“第二个结合”等方法要素^[10], 标注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有学者指出,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 可从学习领会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文化遗产、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 11 个方面的重要论述作简要梳理和解读^[11]。

(二) 发展逻辑界说

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学者们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逻辑做了如下梳理。

首先,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角度论述了文化建设何以可能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 以社会历史演进为中轴线, 以经济发展为实践基础, 展示文化对于历史进步的能动作用”^[12]。马克思主义对物质生产生活、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文化建设的结构和时空布局、文化建设“弹钢琴”和“牵牛鼻子”、以“人民性”为导向推动文化发展的相关论断^[13], 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奠定了哲学根基。立足这种哲学根基,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两个结合”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 毛泽东致力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改革开放后, 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 与时俱进, 形成了独特的关于文化建设的创新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观具有同构性, 实现了对毛泽东文化观的传承, 对于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 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意义深远^[14]。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世界观上的接续、方法论上的延承和精神旨趣的复归^[15]。

其次,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华文明为积淀。习近平认为, 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传统是我国的独特优势^[1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百家争鸣、经学兴盛、玄学流行、儒释道并立和理学发展, 形成了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中华文明^[17]。有学者指出, 中华文明中“天人合一”“以民为本”“立德修身”的优秀文化传统, 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人民性”的理据^[18]。还有学者依次归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是“为有源头活水来”^[19]。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深刻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与价值、科学阐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与方法、精辟概括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为树立文化自信确立了价值坐标, 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 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指明了方向^[20]。

最后,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习近平“将文化建设提高到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高度”^[21], 强调指出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一环。学界对此有如下观点。其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种战略思想, 是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和科学行动指南”^[1]。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能够“有效应对人类社会的各种挑战”^[22]。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旨在于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23]。其四，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创造新的历史、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24]的中国方案。

（三）理论特质界说

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要以其作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1]思想体系为基础，在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中加以把握。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多样性、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民族立场与国际视野的有机统一”^[25]。

一方面，坚持中国本位，以问题导向和战略思维^[26]把握中国历史与当下的文化建设，使习近平文化思想聚合了“高远的文化理想”“深远的文化情怀”“平远的文化视野”^[27]，展现出鲜明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28]，指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集中体现在“理论性和实践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继承性和发展性、民族性和世界性”^[29]。基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了守正创新的发展特征、人民至上的人本特征、系统科学的辩证特征、自信自立的引领特征以及胸怀天下的开放特征”^[30]。

另一方面，坚持从世界文明和全球视野审视中国文化发展大局，“坚持正确指导思想与首要政治任务的紧密结合”“实现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工作布局的有机统一”^[31]，使习近平文化思想具备了整体性、发展性、开放性和人本性特征^[32]。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推动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来’”^[33]的思想武器，指向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价值意义界说

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有机统一。总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新时代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34]。具体来讲，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贡献和实践导向方面。

从理论贡献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从“文化基因、文化自信和中国精神范畴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35]、“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新境界”^[36]，更“彰显了当今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意识”^[37]，具有深厚的方法论意义。

从实践价值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指明新的文化使命”^[38]，明确了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理念宗旨、发展道路和创新范式，为“做好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和步骤”^[39]。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奋斗方向”^[40]，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方案^[23]。

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者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关注度较高，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但仍有进一步拓展深化的空间。

第一，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理路的研究应充分关注习近平的地方实践，实现地方探索研究与国域完善研究之间的衔接。习近平围绕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题、新话语、新理念，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目标指向、道路遵循、价值要求、世界意义等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1]，具有开放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学界可继续开展对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

关于文化建设论述的研究, 并将其与习近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和实践相关联, 通过实践逻辑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深入。

第二, 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主要内容与核心要义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首先, 加强整体性梳理。作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还将持续深入和拓展。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 应以习近平在诸多场合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党和国家重要会议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阐释为分析对象, 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呼应的基础上展开系统深入的讨论。其次, 加强重点性梳理。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 并将其界定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17]。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7], 要加强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意义、方向、布局与任务等核心关切。学界应深入探讨这些主要内容背后的核心要义及基本逻辑。当前, 特别是要重点关注什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中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定位。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萌发与孕育：学术阐发的初步尝试

自 1982 年以来, 习近平在数十年领导实践中始终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视为重要工作, 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了一系列文化建设实践, 形成了对县域、市域、省域、国域不同层面^①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不仅为部署新时代的文化建设道路奠定了基础, 也为学术阐发党执政兴国的文化之维提供了基本视角。

(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县域、市域实践中的萌发

从 1982 年 3 月到 1996 年 4 月, 习近平在主持县域、市域工作时, 因地制宜提出了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传承、思想文化宣传、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等一系列创新性观点, 坚定了文化自信信念、积累了文化建设经验。

1. 习近平在正定县时期 (1982 年 3 月—1985 年 5 月)

习近平曾动情地表示: “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41]。在正定县工作期间, 习近平积累了以文化建设促进经济建设、支撑社会建设的县域经验, 完成了文化建设理念的初步酝酿。甫一来到正定这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冀中农业县, 习近平就被其丰富的古建筑群所吸引。在正定县志记载中的“九楼四塔八大寺”已经大多失落的背景下, 习近平以发展半城郊经济为动力, 坚持以修缮正定文物和编写正定县志相结合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在修缮正定文物方面, 习近平部署文物大普查, 为古建、遗址家底打造明细账, 大力推动名城保护, 实现了正定古城由“破坏”到“保护”的根本转变。在编写正定县志方面, 他推动新形势下以新的体例编写《正定古今》, 使正定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局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① 本文使用的“县域、市域、省域、国域”话语表达和时段划分, 主要参考张文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3 期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一文。

2. 习近平在厦门市时期（1985 年 6 月—1988 年 6 月）

正值厦门经济特区的初创阶段，习近平作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部署，有序寻找厦门经济强劲的新增长点，主持编制了《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厦门发展作出了全局性贡献。习近平用“不要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的箴言勉励自己，以厦门精神的凝练展现出较强的文化建设思维和领导水平。一方面，针对性地凸显厦门“一环数片、众星拱月”城市规划特点，习近平提炼出以“艰苦奋斗、拼搏创新、包容并蓄、大气和谐”^[42]为主要内容的厦门精神，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海堤精神、英雄三岛精神、马塘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等。另一方面，他前瞻性地指出了精神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的辩证关系，指出“我们弘扬‘嘉庚精神’，就能进一步激发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42] 128}。

3. 习近平在宁德市时期（1988 年 6 月—1990 年 4 月）

习近平在宁德市期间，以“摆脱贫困”为工作中心，全面剖析了扶贫先扶志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精神文明建设、畲族文化宣传、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方面作出了成功探索，形成了关于思想宣传的创新理念。首先，建设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习近平一方面聚焦凝练“不耻落后，意气奋发，放胆开拓，争先创优”^[43]的闽东精神，另一方面澄清脱贫致富和建设精神文明的关系，创造性提出了“滴水穿石”“笨鸟先飞”思想和“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理念，全面完善闽东的精神文明建设。其次，做好“闽东之光”的文化宣传。习近平认为闽东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44]的精神就是闽东的一种光彩，称其为“闽东之光”，组织汇编记录闽东发展典型的《滴水集》。习近平强调，“思想性是宣传工作的灵魂，也是宣传工作的出发点”^{[44] 23}，提出“为群众喜闻乐见”“要有群众性”“要少花钱、多办事”“要合乎大家的口味”^{[44] 24}等思想宣传要求。再次，狠抓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习近平高度重视将中央精神同宁德实际结合起来，提出“治理整顿是新的机遇”^{[43] 217}，在搞好“经济大合唱”的基础上，狠刹干部违纪建私房的行为，清退了多占的公房，收获了宁德人民群众的好评。

4. 习近平在福州市时期（1990 年 4 月—1996 年 4 月）

在谋划发展“海上福州”的思路、采取“东扩南进”措施背景下，习近平文化建设实践不断深化、文化建设视野愈发开阔、文化理念更加成熟。首先，前瞻性提出了城市建设中发展与保护并非矛盾关系的观点。1991 年 3 月 10 日，习近平在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上提出评价制度优劣的重要一点在于“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45]。这一论断把文化建设上升为城市建设的关键方略，表明了“城市的灵魂在于其独特的个性和文化品格”^{[45] 181}这一城市发展理念。其次，创造性提出城市建设“八大关系”命题。在“八大关系”中，“古与今”的关系强调“文物要做到原地保护”^{[45] 160}，要在城市建设中挖掘文化内涵。在这一观点的指引下，福州完成了西禅寺、闽王祠、琉球馆、林则徐遗迹等古代建筑的修复和冰心故居、林觉民故居、邓拓故居等近代文物的修缮。再次，推动地方文化深入人心。在习近平的关心下，福州文化部门和专家学者编写了《福州古厝》《福州老街》《福州世家》《福州谚语》等一套 8 本记录福州历史文化的丛书。习近平在干部队伍中强调“马真精神”，面向全市要求继承和发扬林则徐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正气等。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省域实践中的孕育

从 1996 年 4 月到 2012 年 10 月，习近平积极适应时代新变化，在文化建设领域革故鼎新，推动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和英雄文化, 表明其文化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逻辑不断明晰。

1. 习近平在福建省时期 (1996年4月—2002年10月)

习近平延续了在福州市时的文化建设思路, 立足省域发展视野深入思考和论证后, 从国家全局和历史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强调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 提出了省域文化建设的新命题。一方面, 在思想层面廓清文化遗产的意义。习近平着眼国家全局强调: “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46]; 面向历史大局强调指出, “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46]。基于这一判断, 习近平坚持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并重, 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提出“晋江经验”, 将“三为主一共同”思路拓展至福建全省。另一方面, 在实践层面推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习近平进一步明确“保护文物就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46], 推动出台《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此外, 他在《福州古厝》的序言中指出, 保护好文物与古建筑, 就是“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46], 要求全省各地认真践行。

2. 习近平在浙江省时期 (2002年10月—2007年3月)

主政浙江初期, 习近平直面浙江“成长的烦恼”, 前瞻性、创造性提出了浙江发展的“八八战略”, “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 加快建设文化大省”^[47], 丰富了文化建设理念, 升华了文化发展思想。第一, 明确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命题。习近平在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上, 指出了浙江文化发展“三个不相适应”和“一个不够协调”^{[47] 343}的问题。围绕破解浙江文化建设的梗阻, 积极构建加快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3+8+4”整体框架, 即着眼于增强文化的“三个力”, 实施文化建设的“八项工程”, 致力于实现“四个强省”的目标, 他推动出台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 加大政府财政支出对文保的支持, 开启了浙江省文化建设的新征程。第二, 着力打造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的社会氛围。习近平提出不能造成文脉断裂的要求, 推动永昆 (永嘉昆曲) 的保护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计划之中、促成“中国越剧艺术节”成功举办、推动建成龙泉青瓷博物馆、倡导弘扬大禹精神, 动员全社会共同传承和保护中华文化。第三, 以文化生产力科学把握经济与文化的必然关系。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一个烦恼和多个烦恼”^{[47] 368}的著名论断, 即“一个”温饱问题解决之后, “多个”精神文化需求问题就会出现。他指出, “解快这些问题, 主要还是要靠文化”^{[47] 368}, 因而要通过改革“改出文化生产力”^{[47] 346}, 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文化保障。第四, “把新闻报道摆上重要位置”^[48], 坚持写系列评论式的文章, 形成《之江新语》。在习近平亲自执笔之下, 《之江新语》文本中生动呈现了事关经济发展的“两鸟论”、强调全局观念的“地瓜理论”和具有战略意义的“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山海协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论断, 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既深刻又接地气的思想文化宣传风格。

3. 习近平在上海市时期 (2007年3月—10月)

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 其文化思想在这个超大规模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和拓展。一方面, 习近平完善了“上海精神”。他对“上海精神”的凝练不是另起炉灶, 而是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基础上加上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8字, 以此诠释“上海的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 上海的发展也绝不可以独‘惠’其身”^[49]的大局观念, 表明上海是全

国的上海。另一方面，习近平展现了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超前思维和战略眼光。立足上海多元文化汇聚的特点，习近平持续推动全社会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共识，巩固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掌握新媒体的发展规律，保持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关注，提出“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来主导多元化的社会舆论”^[49]³⁴⁶新命题，大力宣传上海推进“四个率先”，围绕建设“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出了全面部署。

（三）习近平文化建设理念的国域深化（2007 年 10 月—2012 年 11 月）

2007 年，习近平到中央工作。习近平创造性地发展了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建设理念。第一，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习近平认为，全面推进包含文化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责任，要求我们要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推动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50]。一方面，习近平强调对内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按照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要求，“防止外来的错误和腐朽没落思想文化的渗透”^[51]；另一方面，注重对外以“汉语年”“中国文化年”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在“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51]的同时，让世界领略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第二，在弘扬革命文化方面，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围绕革命事业形成的一系列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50]，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习近平身体力行弘扬革命文化，亲自出席纪念王震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 120 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60 周年等活动，号召全社会学习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与崇高风范。第三，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指出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是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习近平强调，我国流传下来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52]，我们不仅要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还要学习和借鉴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高尚的精神追求。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域日臻完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的学术凝练

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面向历史、现实和未来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独创性、集成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可从文化意义论、文化方向论、文化布局论和文化任务论等层面进行学术凝练。从延续性角度看，这是地方实践基础之上的国域日臻完善。

（一）文化意义论

习近平用三个理论命题精辟论述了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释明了文化建设的实践前提。

首先，明确坚定文化自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2014 年 2 月，习近平提出“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53]的命题。2016 年 5 月，“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6]进一步被明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将“坚定文化自信”确定为一项治国理政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提出坚定“四个自信”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在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上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特点。

其次, 明确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需要。习近平多次指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5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更为精炼地指出: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5]。文化繁荣兴盛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在于, 它将决定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继续发展的方向, 将彻底完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革命性转型。开展文化建设体现出我们党的初心意识和使命担当。

最后, 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保障。“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靈魂”^[56],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如果丢掉了思想文化, 就“是立不起来的”^[57]。在推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 文化建设具有固根本、树信仰、利长远的重要作用;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中, 建设文化强国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 在应对多元文化碰撞、克服主流意识形态弱化、解决核心价值观分化的过程中, 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文化方向论

文化建设的方向主要是指文化建设的政治方向问题。习近平用“三个坚持”回答了由谁领导、为了谁和依靠谁、走什么路的问题。

首先, 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指出,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要放到能不能在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做好新时代的宣传思想工作, 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就是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58]。“党的领导”和“文化建设”是历史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连接。习近平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59],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一方面, 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及时掌握意识形态形势和动态”^[60]。另一方面, 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 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 尽职尽责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服务。

其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3年8月, 习近平针对宣传思想工作指出: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59]。以人民为中心主要体现为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文化来源于人民。文化建设的真谛在于对文化中人民主体性地位的确证, 这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指出,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60]¹⁶⁰, 文化离开了人民就失去力量。二是文化服务于人民。习近平指出, 要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满足人民精神需求”^[59]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59]。三是文化的优劣要由人民来评价。人民需要文化, 文化更需要人民。习近平引用马克思“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61]的论断, 指出人民是文化的评价者。

最后,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习近平强调, 作为“稳定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关系国家长治久安”^[6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进行文化建设必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5]。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我国文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归结为, “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6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要求, 进一步以中国特色文化道路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和形式的新拓展^[64]。

（三）文化布局论

在科学阐明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文化建设的政治方向之后，习近平从文化建设的工作布局方面深刻论述了如何推进文化建设的实践问题。

首先，坚持在高校、党校这一场域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2016年12月7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鲜明提出“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命题，并将其作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抓手，推动中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习近平关于高校、党校担当思想宣传文化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顶层设计，既是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大创新，也是对文化思想的重大发展。

其次，坚持在网络空间这一场域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65]，是习近平提出的原创性命题。习近平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际出发，明确提出把握互联网这一主阵地，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同心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科学把握习近平的这个论断，必须深入理解“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65] 335}的内涵。所谓同心圆就是聚焦中国梦，“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65] 335}共同奋斗。党的领导是关键，要坚持党管互联网；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是重点，要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做好“用网”的基本功。

最后，坚持在传统媒介这一场域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挥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等传统传媒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作用，对推进文化建设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时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五个事关”构成了中国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的核心要素。

（四）文化任务论

为更好地推进文化建设工作，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落地见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8]三项重点任务。

首先，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习近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66]。习近平赋予“新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提出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创新性概念。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特征认知的深化。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17]，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其次，弘扬革命文化。习近平对革命文化进行了深刻而清晰的论述，回答了弘扬革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内在关联性，为促进弘扬革命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了“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58]的命题。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集中体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传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弘扬革命文化，就是要把红色江山世代传下去，要将革命文化传承好、建设好，使其“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62] 27}。

最后,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提出了诸多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来诠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原则、方法和目标。例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地位,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我们党进行文化建设的大视野下, “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第二个结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四个命题是相互依存的。

其一, “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命题是起点。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要认识到“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16], 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古鉴今, 理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时代发展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其二, “第二个结合”命题是关键。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第二个结合”“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7], 直接指明了“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使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充分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其三,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命题是重点。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框架中阐发的, 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要求。一方面, 要坚持中华民族文化“本位”, 从内心深处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 另一方面, 广泛吸纳人类文明的成果,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具有当代价值。

其四,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命题是落脚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必须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新的起点上, 要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要秉持开放包容, 在人类文明范围内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形成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要坚持守正创新, 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衔接。

四、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对县域、市域、省域、国域文化建设规律把握基础上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是由文化意义论、文化方向论、文化布局论和文化任务论等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核心要义的学术探讨, 将随着党的创新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得到理论总结而不断深入。习近平着眼人类文明发展大局, 在系统部署国内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同时, 审时度势提出了系列关于国际传播的文化命题, 统筹国内文化建设和涉外国际传播, 使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等重要论述, 尤其是习近平对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同样是“用学术讲政治”所需要面对的。这必将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阐发的深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出席全国

-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10-09 (1).
- [2] 唐爱军. 如何理解“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N]. 学习时报, 2023-10-23 (4).
- [3] 本刊评论员. 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J]. 求是, 2023 (20): 28-30.
- [4] 方克立. “马魂、中体、西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 (5): 52-56.
- [5] 王学斌.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体系 [J]. 人民论坛, 2023 (23): 13-17.
- [6] 贾立政, 陈阳波, 魏爱云, 等. 习近平文化战略思想 [J]. 人民论坛, 2014 (24): 14-15.
- [7] 代金平, 秦锐. 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七个维度 [J]. 探索, 2017 (4): 14-21.
- [8] 丹珠昂奔. 认同、自信与自觉——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思考 [J]. 青海民族研究, 2017 (3): 1-9.
- [9]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及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3-25.
- [10] 田鹏颖. 习近平文化思想标注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 [EB/OL]. (2023-10-24) [2023-11-24].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10/t20231009_5689290.shtml.
- [11] 曲青山.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 [N]. 学习时报, 2023-10-23 (1).
- [12] 刘成, 李建军.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31016.0954.002>.
- [13] 张永奇. 文化“活的灵魂”的时代反映与实践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底蕴及其现实意义 [J]. 学习论坛, 2015 (10): 63-67.
- [14] 郑东艳. 毛泽东文化观与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的同构性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3): 18-25.
- [15] 刘红.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J]. 理论与改革, 2016 (6): 32-36.
- [16]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 年 5 月 17 日) [N]. 人民日报, 2016-05-19 (2).
- [17]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6 月 2 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18] 刘旺旺, 俞良早.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化思想的形成根据论析 [J]. 探索, 2017 (4): 22-27.
- [19] 范曾.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J]. 人民论坛, 2017 (28): 128-129.
- [20] 林国标.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与弘扬 [J].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1): 9-17.
- [21] 杨晶. 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对广播电视发展的指导意义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8 (2): 39-42.
- [22] 闫锋.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逻辑与理论创新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7 (3): 61-63.
- [23] 黎友. 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文化思想研究 [J]. 学术论坛, 2016 (6): 157-160+180.
- [24] 单培勇.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四个维度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6 (4): 15-20.
- [25] 陈金龙, 蔡毅.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 [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101.002>.
- [26] 程仕波, 谢守成.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四个特点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7 (3): 18-25.
- [27] 范玉刚.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意涵 [J]. 人民论坛, 2014 (24): 18-21.
- [28] 曲青山.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N]. 人民日报, 2023-10-24 (13).

魏崇辉, 王悦.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术阐发与政治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65-78.

- [29] 马忠, 赵歌.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意蕴、鲜明特征和实践要求 [J/OL].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61.1329.C.20231218.1429.002>.
- [30] 齐卫平, 郑天骄.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内在理路和鲜明特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12.
- [31] 刘福政, 任庆银.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10-18 (1).
- [32] 李欢, 周建超. 论习近平的文化建设思想——基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视阈 [J]. 广西社会科学, 2015 (7): 184-188.
- [33] 徐国亮. 从“走出去”到“走进来”: 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思考 [EB/OL]. (2023-10-23) [2023-12-24]. https://www.cssn.cn/mkszy/mkszy_zdtj/202310/t20231023_5692164.shtml.
- [34] 陆卫明, 黄佳慧, 王子宜.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蕴涵及时代价值 [J/OL].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61.1329.C.20231218.1836.004>.
- [35] 汤玲. 浅谈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思想 [J]. 党建, 2017 (5): 34-35.
- [36] 郝立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10-17 (1).
- [37] 李中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底蕴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9 (1): 14-17.
- [38] 方世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新的文化使命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10-20 (1).
- [39] 刘建军, 胡鹏. 把准凝心铸魂的着力点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10-16 (1).
- [40] 董慧, 胡澜予.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10-23 (1).
- [41] 习近平. 知之深 爱之切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215.
- [42]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厦门 [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0: 18.
- [43]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宁德 [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0: 72.
- [44] 习近平. 摆脱贫困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6: 21-22.
- [45]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福州 [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0: 180.
- [46] “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习近平在福建保护文化遗产纪事 [N]. 福建日报, 2015-01-06 (1).
- [47]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浙江 (上) [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1: 3.
- [48]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浙江 (下) [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1: 346.
- [49]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上海 [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2: 214.
- [50] 习近平. 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8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1 年 11 月 4 日) [N]. 人民日报, 2011-11-05 (3).
- [51] 习近平. 改革开放 30 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 [N]. 学习时报, 2008-09-08 (1).
- [52] 习近平.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N]. 学习时报, 2011-09-05 (1).
- [5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N]. 人民日报, 2014-02-26 (1).
- [54] 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 [N]. 人民日报, 2013-11-29 (1).
- [5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N]．人民日报，2017-10-28（1）．
- [56]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 年 10 月 21 日）[N]．人民日报，2016-10-22（2）．
- [57]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 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 年 9 月 24 日）[N]．人民日报，2014-09-25（2）．
- [5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N]．人民日报，2022-10-26（1）．
- [59]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 [N]．人民日报，2013-08-21（1）．
- [60]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53．
- [61]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 年 11 月 30 日）[N]．人民日报，2016-12-01（2）．
- [62]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54．
- [6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21-11-17（1）．
- [64] 王永贵．中国特色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化和拓展 [J]．思想理论教育，2012（1）：39-44．
- [6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5．
- [66]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责任编辑：林华山



中国国家统一进程中 反“独”促统话语叙事的构建

张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上海 200233)

摘要: 中国国家统一的叙事面临台湾民进党当局“谋独拒统”和美国反华势力“挺独阻统”的话语骗术。台湾民进党当局以渲染“和平保台”、否定“九二共识”、污化“一国两制”、推行“文化台独”、强化“倚美抗中”等话术加强“谋独拒统”。美国政府谋划“以台制华”，以虚化“一个中国”政策、强化“战略清晰”、炒作“武统台湾”、鼓吹“民主示范”等话语加强“挺独阻统”。面对“台独”分裂话术和外部势力干涉话术的欺骗性、伪装性、煽动性，中国大陆应加强国家统一进程中反“独”促统话语叙事的构建。具体而言，中国要加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叙事；加强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叙事；坚持和平统一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重的叙事；加强反“独”促统国际舆论叙事；加强反“独”促统、“一国两制”知识体系叙事。中国要掌握国家统一进程中反“独”促统话语叙事构建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塑造“以我为主”的国际传播态势。

关键词: 反“独”促统；国家统一；一国两制；民进党；拜登政府；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1-0079-11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1.006

作者简介: 张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政党与政治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复旦大学统战基础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研究”（23ZDA120）

引用格式: 张建. 中国国家统一进程中反“独”促统话语叙事的构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79-89.

2021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民族复兴长周期进程中，要积极增强中国的话语叙事，打破美西方设置的包括“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债务陷阱”在内的各种叙事陷阱。

2024 年 1 月 13 日，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结果揭晓。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公开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统一大业。但美、日、英、加等国家作出错误表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这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挺独阻统”叙事话术中的一环。近年来，中美战略博弈以及以俄乌冲突为标志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美国加大对华遏制、打压，强化“以台制华”力度，“台独”势力强化分裂行动，使中央解决台湾问题面临新的战略环境。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战略环境下，国家统一话语叙事特别是反“独”促统叙事成为推动国家统一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在两岸关系的陆美台大三角博弈中，各方都通过话语叙事来强化自身政策的合理性和在斗争中的话语权。整体来看，台湾当局以“反中”叙事话术“谋独拒统”，美国以大国博弈叙事话术“挺独阻统”，中国大陆构建的是反“独”促统的国家统一叙事。美国反华势力和台湾当局以政治话术对自身政策叙事进行道德化包装，对大陆反“独”促统政策进行污名化叙事。这是具有强烈欺骗性的话语陷阱，在国际上给中国的国家统一造成障碍和干扰，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疑虑和误解，造成台湾民众对大陆政策的抵触和排斥。“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是我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主要风险挑战^[1]。“台独”分裂势力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外部势力干涉是推进中国统一进程的突出障碍^[2]。“台独”分裂话语叙事和外部势力干涉话语叙事的欺骗性、伪装性，是中国国家统一话语叙事构建面对的主要挑战。

一、台湾民进党当局“谋独拒统”的叙事话术

台湾的“拒统谋独”势力以台湾民进党“台独”势力为主，是国家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2016 年以来，民进党当局大搞“台独”行径：不接受“一个中国”，宣扬所谓“新两国论”；否定“九二共识”，破坏“和平发展”；攻击“一国两制”，介入“修例风波”；推行“去中国化”，操作“文化台独”；煽动“反中仇中”，谋求“选举利益”；助美“以台制华”，意图“倚美谋独”。

其一，抛出“和平保台”。2022 年 12 月 24 日，赖清德在参选民进党主席政见发表会中提出所谓“和平保台”主张。赖清德鼓吹，台湾是个热爱和平的所谓“国家”，若没有任何一个所谓“威权国家”来“侵略”，很希望大家能和平相处。这就是所谓“和平保台”说。12 月 28 日民进党代理主席陈其迈在台北的记者会上再次提到“和平保台”。由此可见，民进党意图以“和平保台”取代蔡英文的“抗中保台”，并把“和平保台”作为 2023 年的主要路线和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与台湾地区民意代表“二合一”选举的主轴。赖清德宣称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其“台独”本质昭然若揭。在“和平保台”论述中，“保台”是目的，“和平”是手段和路径。从实质上看，

“和平保台”无非是打着“和平”旗号继续抗拒统一、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拖延策略。“和平保台”是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拒统谋独”的新话术^[3]。2023年7月4日,赖清德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所谓“在台湾海峡维护和平的计划”一文,再次宣扬其提出的所谓“和平保台”论调^[4]。

另外,民进党当局不断推进“渐进式台独”,大搞“去中国化”,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2021年10月,蔡英文抛出所谓“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将其“台独”立场和政策明晰化、公开化。蔡英文一再妄称“台湾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蔡英文一再声称1949年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本质上是切割“中华民国”,把“中华民国”置换成所谓“台湾共和国”。她还声称“‘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由台湾2300万民众决定”。由此可见,蔡英文的所谓“互不隶属”就是赤裸裸地贩卖“两国论”,蔡英文的“新两国论”比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更具进攻性,是鼓吹“台独”、煽动对立,割裂历史、扭曲事实的行径。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表示将会延续蔡英文路线,妄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妄称台湾事实上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外宣布独立”。

其二,否定“九二共识”。长期以来,以民进党为首的绿营对于“九二共识”的基本态度就是不承认、不接受,并不断歪曲、否定和抹黑“九二共识”。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不断歪曲否定“九二共识”,妄图在岛内营造“九二共识”是“大陆单方面设定的政治架构”的假象。尤其是蔡英文当局大搞“去中国化”和“渐进式台独”路线,企图“倚美谋独”,造成两岸关系的高度紧张。民进党歪曲和抹黑“九二共识”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只谈“九二会谈”史实而不谈达成“九二共识”。二是为否定“九二共识”真正意涵而不断造词,混淆视听。民进党企图用“九二会谈精神”“九二香港会谈”等说辞取代“九二共识”。三是拒绝承认、煽动民众反对“九二共识”,将关于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本质的“九二共识”与实现国家统一后制度安排的“一国两制”故意混为一谈,刻意误导台湾民众,企图通过污化“一国两制”达到否定“九二共识”的真正目的。四是将“九二共识”说成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协议”^[5]。2023年3月底4月初,马英九来大陆访问返台后表示“九二共识”又活过来了。台陆委会称“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一致,民进党更妄言“九二共识”不存在,谈何复活。

其三,污化“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提出以来,被台湾一些政治势力曲解误导,被民进党及其当局不遗余力地造谣抹黑。这造成部分国际社会舆论的偏颇认知、负面评价甚至恶毒攻击。台湾社会更是充斥着对“一国两制”的歪曲报道和恶意诋毁^[6-7]。“修例风波”发生后,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利用香港局势,发表一系列对“一国两制”进行恶意攻击的言论,借此污名化“一国两制”。蔡英文指责“一国两制”是“单方面破坏现状”,是“强迫台湾接受被统一”。蔡英文声称“坚决反对一国两制”,“拒绝任何被统一的过渡性安排”。此后,民进党为了选举利益,宣称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接受“一国两制”,甚至以“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作为污化“一国两制”的口号。民进党当局通过对香港事务的持续介入,歪曲、丑化、诋毁“一国两制”,通过抹黑“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强化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恐惧、拒绝心理,挑动台湾社会反对、对抗“一国两制”的情绪,进而攻击大陆和中国共产党。民进党当局通过污名化“一国两制”煽动两岸对立,以所谓“矮化论”“吞并论”“港澳论”等论调歪曲、丑化“一国两制”^[8]。

其四，推行“文化台独”。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岛内推行“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去蒋介石化”等一系列“台独”行径。蔡英文上台以来，以所谓“台湾主体意识”为幌子，通过宣扬“台湾文化”的所谓“主体性”，妄图裹挟台湾民众从热爱台湾地区过渡到认同台湾地区的所谓“主体文化”乃至所谓“国家主权”^[9]。比如 2016 年以来，民进党当局利用台湾“原住民”族群文化政策塑造所谓“台湾主体性”，本质上是民进党利用“原住民”议题切割两岸历史，借“原住民史观”进行“中华民国台湾化”和“文化台独”“渐进式台独”的手段，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和欺骗性^[10]。另外，蔡英文鼓吹的所谓“中华民国台湾”论调，也是民进党的“台独”包装论述。

其五，强化“倚美抗中”。民进党当局为消除台湾民众对所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担忧，在舆论上强调台湾地区与乌克兰在地缘战略、地理环境以及国际供应链上存在三大本质不同。民进党当局宣称，台湾的地缘战略重要性高于乌克兰，位于东亚第一岛链要冲，对美国遏制中国以及维护“印太”区域军事、商业、航行安全等“极具重要性”，并非乌克兰可比拟。其妄称只要大陆“轻举妄动”，美国一定会采取不同于俄乌冲突的做法。

二、美国当局“挺独阻统”的叙事话术

美国的“以台制华”势力是外部势力介入台湾的主要力量，是我国国家统一的突出障碍。拜登政府从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和科技竞争的角度看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重大利益^[11]。2022 年 10 月 12 日，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美国面对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将中国称为唯一一个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未来十年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决定性十年，同时声称美国“击败中国”最关键的两大优势是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关键技术优势，而台湾正是美国利用这两大优势遏制大陆的重要工具^[12]。为确保对华战略竞争效果，拜登政府从叙事的情境、角色、情节等方面进行对华话语设计，建构了所谓“美国领导世界抵抗中国‘威权威胁’”的主导性叙事，其主要目的是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塑造负面的对华认知，为其对华竞争战略提供合法性，削弱中国影响力^[13]。支持台湾当局、推行“以台制华”是美国历届政府的既定政策，该政策在不同历史背景下表现出形式和力度上的差异。随着美中竞争加剧，美国越来越将台湾视为不能丢失的战略资产。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当局在“以台制华”方面采取的主要政策取向是“挺独阻统”，并强化这一政策取向的话语叙事。

其一，虚化“一个中国”。美国通过模糊化“一个中国”政策实现“挺独阻统”。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基石。1979 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跟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等进行任意排序，甚至将“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前，以达到在政策基础层面弱化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效力的目的，在政策执行层面实质支持所谓“一中一台”^[14]。比如美国国务院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表述为“基于‘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15]。2022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巴厘岛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2023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峰会。拜登在这两次两国元首的重要会晤中都表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

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美国声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但实际上美方以“蚕食”方式不断歪曲、篡改、虚化、掏空“一个中国”政策，不时炮制损害中国主权的涉台议案，加强与台湾当局的往来，不断策动对台军售，加深美台军事勾连，助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拉拢其他国家插手台湾问题^[2]²⁰。美国官方宣称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实际上这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正在更深入、更直接地介入台湾事务。美国政府现在更加重视对台湾的承诺，在提升美台实质关系的同时没有向中国大陆提供可靠可信的“再保证”。

美国官方对台湾民进党当局改变现状的做法视而不见。美国不再推动两岸对话与和平，而是试图将中国大陆与台湾“永久分裂”^[16]。美国宣扬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给中国扣上“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试图用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等帽子。这实质上就是在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妄图“和平分裂”中国，在国际上制造所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舆论，妄图篡改二战历史、颠覆战后秩序、践踏中国主权。美国对其“一中政策”的解读日趋“去一中化”。1971年联大2758号决议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文件。近年来美国国内一些势力恶意曲解联大2758号决议，散布“2758号决议未解决台湾地位”的谬论，再度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炒作“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系统”^[17]。这是对“台独”势力的支持、纵容，企图否定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以迎合美国“以台制华”的政策需要^[18]。

其二，强化“战略清晰”。长期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保持战略模糊，以实现海峡两岸的“双重威慑”（dual deterrence）。例如，美国以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为支撑，对台湾的定位问题不做清晰表述。又如，对于在台海地区出现冲突时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美国也是保持模糊，既不承诺“会协防”，也不明确表示“不会协防”。特朗普政府以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和美国“以台制华”意图的上升，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呈现清晰化趋势^[19]。在美国的对华政策辩论上充斥着要放弃“战略模糊”的论调。为了加强对中国大陆的“威慑”与遏制，拜登政府不断推动台海政策“去模糊化”，以“战略模糊”之名行“战略清晰”之实^[20]。2021年8月、10月和2022年5月、9月，拜登本人先后在接受ABC、CNN采访，出席美日澳印四国首脑峰会记者会和接受CBS《60分钟》节目专访时，连续4次公开声称美国将“协防台湾”和“派兵干预”。乌克兰问题与台湾问题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但拜登公开将台湾安全与乌克兰危机作比较，诬称“中国在海实施迫在眉睫的危险挑衅”，宣称“如果中国‘进攻’台湾，美国将做出军事回应”。美国力图让中国确信“美国会在台海冲突中取胜”，中国会付出所谓“失去民族复兴机会的代价”^[21]。

“去模糊化”和“战略清晰”已经成为美国台海政策的趋势和态势。拜登政府负责印太事务的协调员坎贝尔表示，对台“战略清晰”会有某些明显的缺陷^[22]。在拜登“口误式”四次公开表态美军会“协防台湾”后，美国行政当局都会澄清、表态美国对台政策不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甚至表示，拜登总统（表态美军会“协防台湾”）只是回应假设性问题，并非反映美国政府的任何政策改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于2022年8—9月对64位涉华、涉台及两岸事务专家进行的访谈结果显示，几乎没有受访专家相信改变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可以“吓阻”中国大陆不使用武力，因为“北京已经预设华盛顿会介入”。也有观点认为，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回归了“战略模糊”，其目的是以模糊之名行清晰之实^[23]。

其三，炒作“武统台湾”。美国在国际上散布大陆“试图用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等荒谬言论，炮制所谓“武统台湾威胁论”。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在国际上刻意散布“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论调，并加快售台武器、武装台湾的步伐。将俄乌冲突与台海局势挂钩，将性质完全不同的台湾问题与俄乌冲突进行类比，渲染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紧迫性”，在国际上制造、炒作、煽动中国大陆所谓“武统台湾威胁论”。美国大肆渲染中国大陆“2027 年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主要目的在于编织所谓“中国威胁”，拉拢盟友应对所谓“中国威胁”，在话语上塑造中国的负面形象，以此作为“武装”“防卫”台湾的铺垫；满足美国国内政治（军工复合体）的需求。

在美国国内日益激进的“以台制华”舆论和情绪下，美国一些军方将领和国会议员不断炒作台海即将爆发战争^[24]。2021 年 3 月，时任美国印太战区司令戴维森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声称，中国是美国当下最大“战略威胁”，解放军将在未来 10 年甚至是 6 年内“攻台”。2021 年 6 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众议院作证时声称，中国要求军队加快推进现代化，以发展“收复台湾”并把时间从 2035 年提前到 2027 年的能力。2022 年 10 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戴声称，美国必须在 2024 年之前做好应对“北京动武”的准备。2023 年 1 月，美国空军机动后勤司令、上将米尼汉声称，美国最快将在 2025 年因台湾问题与大陆爆发冲突。2023 年 2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宣称，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解放军准备在 2027 年前“攻台”。近期的趋势是，美国军方不认为台海冲突迫在眉睫，但他们依然强调加强威慑，正加紧备战^[25]。

另外，美国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也在不断进行所谓“兵棋推演”，渲染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舆论、制造恐慌。可以说，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从总统到国务卿等行政官员以及军方要员、国会议员等，纷纷以讲话、声明、撰文、接受访谈等形式炒作大陆将在 2027 年前后所谓“入侵”台湾、美台该如何应对等话题，煽动国际舆论对“2027 中国可能武统台湾”论调的高度关注^[26]。美国将进一步强化、提升“协防台湾”的能力，包括大规模对台军售、提高美台“军事合作”能级、加强美国在台海地区军事活动等。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加快对台军售，助台打造应对大陆的所谓“非对称战力”。基于“与台湾关系法”持续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与相关服务，是美国长期以来对台军售政策的核心。特朗普执政时期实现了对台军售常态化，并开始出售一些弥补劣势、强化优势的武器装备，从而将台湾“武装”成所谓“豪猪”，试图在台海战力不对称的状态下阻止中国国家统一进程。

其四，鼓吹“民主示范”。拜登上台后，大搞“价值观外交”，打着所谓“民主”旗号，以“民主峰会”作为平台，将世界划分为“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试图构建“价值观同盟”。美国在国际上极力鼓吹台湾问题、两岸关系是“民主对抗专制”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论调，将台湾的所谓民主体制和价值观作为东西方价值观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西方制造了荒谬的叙事话术，例如所谓“威权的大陆欺负民主的台湾，可能入侵台湾”。这种叙事方式对于很多人特别是那些不了解历史问题复杂性的人来说具有欺骗性。它无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的历史背景，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化成单一的政治选项。这种说法逐渐成为美国官方的一种叙事方式^[16]。美国在国际上对台湾的所谓“民主成就”“政治发展优等生”的“认可”和“加持”，是其在全球塑造所谓“民主对抗专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真正目的是在台海两岸制造对立、贬损大陆政治发展和阻挠台湾

民众对大陆的认同。

2021年12月9日,美国主办所谓“民主峰会”,台湾民进党当局是被邀请的唯一非主权实体。所谓“民主峰会”,实质是美国以“民主”划分阵营、分裂世界的手段。2022年10月在台湾举行的所谓“世界民主运动大会”,则是把“假民主”主场从美国拓展到台湾地区。这个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操盘的活动自1999年以来已经运作多年。这一活动正是NED在世界各地打着“民主”的旗号行反民主之实、煽动分裂对抗、干涉别国内政,将“民主”工具化、武器化的一个重要平台。在台湾承办这次会议的是“台独”顽固分子的关联机构“台湾民主基金会”。“民主”不是“台独”的挡箭牌,更成不了“台独”分子的护身符。民进党当局与国际反华反共组织勾连,借民主之名大搞谋“独”的政治操弄和恶劣行径,只会让国际社会更看清其“台独”本质。

三、中国反“独”促统话语叙事的构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同时,报告强调将加强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提升推进国家统一能力。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完善国家统一观、“一国两制”政治学和“一个中国”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27]。一个时期以来,台湾民进党当局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一些外部势力极力搞“以台制华”,企图阻挡中国实现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21]。面对“台独”论述与干涉论述复合形成的“内源性话语结构”论述造成的现实困境,应加强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源性话语建构”^[28]。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我国在反“独”促统、国家统一问题上也要加强叙事体系建设。

其一,加强国家统一、反“独”促统叙事。2023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对扎实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统一大业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要坚持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积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29]。一是把反“独”促统统一战线话语权的构建放到“两个大局”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来审视和布局。要不断丰富、完善反“独”促统统一战线的话语体系、叙事体系和传播体系,加强话语内容建设、叙事能力建设和传播生态建设,提升国家统一进程中反“独”促统统一战线话语权的传播和效能,进而提升反“独”促统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积极构建话语体系,加强话语国际传播。二是防范陷入台湾当局和西方的话语体系与政治陷阱中,

积极建构自身的叙事体系和叙事逻辑。特别是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反“独”促统、一个中国、和平统一等方面的政策话语叙事要更加多元。三是始终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反“独”促统的支柱叙事。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台湾问题的核心支柱，对内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对外是发展国家间官方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加强反“独”促统的叙事话语建设，要提升反干预、反分裂的话语主导权和主动权，提升、优化、统筹国家统一叙事，将战略优势转化为国家统一的效能、解决台湾问题的“统一力”。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通过党章修正案，增加“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的内容，明确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四是加强反“独”促统的国际统一战线建设。要在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发展壮大两岸四地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力量的同时，争取国际社会同情、支持中国统一的力量，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

其二，加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叙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国际上有观点声称，随着中国政府在香港制定实施国家安全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政策已经“不复存在”，香港已经完全“内地化”。这是对“一国两制”政策的错误认识和歪曲。“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中国长期坚持的政策。“一国两制”在香港经历了从“探索型实践”转向“高质量实践”^[30]，香港的发展是自身高质量发展与融入式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一国两制”港澳实践进入新时期，中国政府更加注重“一国两制”的定位，提高“一国两制”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一国两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一国两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之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坚持“一国两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作为新时代的十三个方面成就之一。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党的二十大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把“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八个字置于“贯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之前，更表明了坚持“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意志。

其三，加强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叙事。中国共产党把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作为夯实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31]，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视作通向和平统一的重要途径。我们要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密切两岸交流合作，拉紧两岸情感纽带和利益联结，增强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铸牢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厚植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2] 20}。两岸融合发展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促进历史文化连接以及支持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创业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32]。目前，中国政府关于对台“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政策的能见度和识别度有待提高，特别是国际社会对该政策的了解和认知相对不足，需要在反“独”促统话语构建中加强对“融合发展”政策的阐释。

其四，坚持和平统一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重的叙事。和平统一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彼此排斥的，而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的。不能把和平统一政策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政策对立起来机械地理解^[33]。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台

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1] 59}

其五, 加强反“独”促统国际舆论叙事。壮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反“独”促统统一战线, 广泛调动一切有利于反“独”促统的积极因素, 共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是当前反“独”促统的重要任务。一是在国家统一进程中要加强反“独”促统内外统一战线的叙事构建, 塑造“中国统一、台湾得利、世界有益”的话语结构, 对冲美国和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污名化话语叙事^[34]。中国政府要结合分裂势力“谋独拒统”和外部势力“挺独阻统”的话语结构和叙事方式, 加强反分裂、反干涉话语叙事体系建设, 提高推进国家统一、反分裂、反干涉的国际传播能力和成效。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加速推进, 要把加强国际传播工作放在更突出的位置, 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台湾问题上, 要加强中国国家统一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特别是反“独”促统的叙事建设, 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反“独”促统政策、主张、方案的认知和理解, 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统一观”的认同、支持。二是加强反“台独”分裂、反美国干预的舆论宣传, 争取国际社会理解并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统一的理解。三是向国际社会发布美国售台武器清单、美国涉台法案(条款)清单、美国干预台湾问题清单, 向国际社会揭露美国干预台湾问题、阻挠中国国家统一的恶劣行径, 从舆论斗争方面争取主动权。四是发布中英文版台湾局势报告、台海战略态势感知、台海动态数据等权威信息和研究报告, 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国际传播, 提升涉台话语和叙事影响力。五是加强与国际社会关心、关注台湾和大陆对台政策的各方的交流。一方面邀请各方来中国, 另一方面走出去主动沟通、主动释疑, 把中国的“双反”政策说清楚, 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统一的认知、理解、同情、不反对乃至支持。

其六, 加强“一国两制”知识体系叙事。“一国两制”知识体系建设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从起源到发展, 从理论到实践, 是中国完全自主的、原创的制度, 需要构建系统的“一国两制”知识体系。当前, 涉“一国两制”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的“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 构建一套系统完善的“一国两制”知识体系, 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提出并打造易于为两岸四地、国际社会所了解、理解和接受的“一国两制”相关概念和相关表述。这有助于引导两岸、国际社会更客观、更具体、更真实地认识“一国两制”、认识当代中国, 更好地将“一国两制”融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著优势。构建反“独”促统、“一国两制”知识体系, 加强我国学术界与世界的交流和对话, 为反分裂、反干预、国家治理、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提供国际传播的学理支撑, 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担负的重要任务。中国知识界应用原创性、逻辑性、标识性的学术概念阐释反“独”促统、“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 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重大独创性的“一国两制”

制度提供学理支持。

四、结语

在新时代中国统一进程中加强反“独”促统话语构建，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把解决台湾问题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掌握国家统一进程中反“独”促统话语叙事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塑造“以我为主”的国际传播态势。一是争取国际社会对我国反“独”促统的理解和同情。二是依法反干预、反分裂、促统一。三是把反“独”促统放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之中进行审视和反思，完善并丰富反“独”促统的叙事体系、传播体系、话语内容、叙事能力以及传播生态。四是分析美国“以台制华”势力和“台独”势力的叙事方式和手段，更有针对性地反“台独”、反干预。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5-46.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8-22.
- [3] 王英津. 新时代推进两岸协商谈判的路径思考 [J]. 台湾研究集刊，2023（2）：1-18.
- [4]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y Plan to Preserve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EB/OL]. （2023-07-04） [2023-07-05]. <https://www.wsj.com/articles/my-plan-to-preserve-peace-between-china-and-taiwan-candidate-election-race-war-7046ee00>.
- [5] 张建，方郅中. “九二共识”何以重要：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 [J]. 台湾研究集刊，2023（2）：33-48.
- [6] 庄吟茜. “一国两制”在台湾的污名化：剖析与澄清 [J]. 台湾研究，2016（1）：31-38.
- [7] 吕远航. “一国两制”在台湾的污名化及其因应之道 [J]. 闽台关系研究，2021（4）：66-78.
- [8] 陈先才，郭亚丽. 台湾当局对“一国两制”污名化：论调、诱因及应对 [J]. 台海研究，2023（1）：89-104.
- [9] 韩冰. 蔡英文当局“文化台独”话语体系的建构、危害及前景 [J]. 统一论坛，2018（1）：47-49.
- [10] 张嘉馨，郑振清. 族群文化政策与地缘政治倾向：台湾当局利用“原住民”构建“台湾主体性”的文化政策分析 [J]. 台湾研究，2022（6）：100-110.
- [11] 吴心伯. 探索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 [J]. 国际问题研究，2023（2）：42-57+123-124.
- [1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B/OL]. （2022-10-12） [2023-07-0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 [13] 贾付强，张涛. 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 [J]. 现代国际关系，2023（1）：133-150+153.
- [14] 邵育群. 特朗普时期以来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变化及其危害性 [J]. 台湾研究集刊，2022（6）：34-47.
- [1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Relations With Taiwan [EB/OL]. （2022-05-28） [2023-07-05]. <https://www.state.gov/us-relations-with-taiwan/>.
- [16] 余东晖. 美学者析美对台政策五大变化 美中可能摊牌 [EB/OL]. （2023-02-28） [2023-04-10]. <http://www.crntt.com/doc/1066/0/7/8/106607830.html?coluid=93&kindid=7950&docid=106607830&mdate=02280>

张建. 中国国家统一进程中反“独”促统话语叙事的构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79-89.

11747.

- [17] Jessica Drun, Bonnie S. Glaser. The Distortion of UN Resolution 2758 and Limits on Taiwan's Acc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EB/OL]. [2023-04-10]. <https://www.gmfus.org/news/distortion-un-resolution-2758-and-limits-taiwans-access-united-nations>.
- [18] 饶戈平. 联合国大会 2758 号决议与一个中国原则——兼评葛来仪报告 [J]. 台湾研究, 2023 (2): 1-11.
- [19] 季焯, 李雨荃. 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清晰化及其极限: 以“与台湾交往法”的出台为例 [J]. 台湾研究, 2022 (3): 22-30.
- [20] 薛振威, 孙云. 拜登政府台海政策“去模糊化”的表现及困境 [J]. 台海研究, 2023 (1): 138-147.
- [21] Oriana Skylar Mastro. The Taiwan Temptation: Why Beijing Might Resort to Force [J]. Foreign Affairs, 2021 (7): 58-67.
- [22] David Brunnstrom, Michael Martina. Strategic Clarity on Taiwan Policy Carries ‘Significant Downsides’ - U. S. [EB/OL]. (2021-05-04) [2023-04-10].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significant-downsides-strategic-clarity-over-taiwan-us-2021-05-04/>.
- [23] 夏昂, 谢郁. 拜登政府台海政策的“再模糊化”辨析 [J]. 台湾研究, 2022 (3): 12-21.
- [24] 余东晖. 中评关注: 美建制派专家齐吁莫炒作台海危机 [EB/OL]. (2023-05-31) [2023-06-10]. <http://www.crntt.com/doc/1066/8/3/3/106683358.html?coluid=93&kindid=7950&docid=106683358&mdate=0531015420>.
- [25] 余东晖. 华府观察: 美军方淡化台战时间表但加紧备战 [EB/OL]. (2023-04-20) [2023-06-10]. <http://www.crntt.com/doc/1066/5/3/0/106653050.html?coluid=93&kindid=7950&docid=106653050&mdate=042001613>.
- [26] 林斯娴. 拜登时期美国对华舆论态势评析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3 (1): 116-132.
- [27]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蔡奇主持 [N]. 人民日报, 2023-06-03 (1).
- [28] 段磊, 熊鸿亮.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话语体系初论——以一个中国原则的话语构建为主轴 [J]. 闽台关系研究, 2023 (1): 2-18.
- [29] 习近平. 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23 年 3 月 13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
- [30] 张建. “一国两制”在香港: 从探索型实践转向高质量实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4): 93-101.
- [31]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32-240.
- [32] 胡云华, 岑峨. 两岸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与效应评估 [J]. 台湾研究, 2022 (1): 14-24.
- [33] 郑剑, 杨洋. 论新时代“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政策的辩证意蕴 [J]. 台湾研究集刊, 2022 (6): 1-16.
- [34] 龚静阳.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 梳理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29-146.

责任编辑: 龚静阳



“以商言政”：解放战争时期 中共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

——以《经济导报》为中心

王明亮 付潇仪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解放战争初期，以工商界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政治光谱上离中国共产党最远的群体。为了加强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工作，1947年中共在香港创办了《经济导报》。《经济导报》的报道侧重揭露国民党治下的经济危机与货币政策弊端，同时阐释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综合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对香港本土经济的影响。《经济导报》在内容和态度上的贴近性和时效性，为打动香港工商界、拉近中共与其心理距离和现实距离产生了实际效果。彼时的《经济导报》还起到组织和动员作用：搭建经济联盟，影响进步华商；团结财经人才，形成“香港经验”。这些举措有效消除了彼时香港工商界存在的“疑共”“恐共”和“避谈政治”心理，引导香港工商界在“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中认清政治和现实。以报社为中心节点，《经济导报》鼓励香港工商业人士从“言论场域”走向“实践场域”，在现实中做出道路选择，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战争。这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是注重对群众心理的研究，做到方法科学、循循善诱；二是坚持大宣传观和大统战观，不把统战宣传工作简化为文字工作和宣传干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4.01.007

作者简介：王明亮，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付潇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海外统战宣传模式与经验研究（1921—1949）”（21BDJ081）；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3ZDA070）

引用格式：王明亮，付潇仪.“以商言政”：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以《经济导报》为中心[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1）：90-104.

部的工作; 三是注重宣传效果的落地, 明确认识宣传是手段, 组织和动员才是目的。

关键词: 经济统战; 统战宣传; 《经济导报》; 香港工商界; 解放战争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1-0090-15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香港, 较早地在香港开展统战和宣传工作^[1]。1946年, 国共全面内战爆发, 中共在国统区公开的新闻事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查禁或被迫关停。相对于国民党不断排斥镇压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中国内地, 抗日战争后的中国香港为中共提供了相对安全的政治环境。英国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在港悬而未决的统治矛盾早已使香港民众心生不满。香港工人阶级的壮大和中共在港开展的抗日活动, 为中共开展统战宣传奠定了良好群众基础^[2]。抗战胜利后从内地南下的各界人士在这样复杂但又意外平衡的政治氛围下微妙共处。因此, 中共得以在香港开展对国民党的隐蔽斗争和对中间人士的统战宣传。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决定派章汉夫、胡绳、乔冠华、龚澎、廖沫沙、林默涵、范剑涯、邵荃麟等到香港, 会同广东区党委派出的饶彰风、杨奇等在香港重新建立面向我国港澳地区以及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3]。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弄清谁是革命的朋友, 谁是革命的敌人至关重要, 甚至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 中国共产党比较容易判断其在革命中的地位, 而对另外一些阶级或政治势力的判断则要困难得多, 以工商界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中共对其定位和认识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 革命对象 (建党初期) — 联合对象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 斗争对象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 — 革命动力之一 (抗战开始到解放战争时期)^①。此外, 由于国民党实施特务统治, “不少人怕同共产党接触, 引起国民党特务的勒索”。在香港负责工商界统战工作的同志在工作的最初阶段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阻力^[5]。许多工商业者对中共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政局剧烈变动的重大历史转折点, 许多香港工商界人士对中共的经济政策持怀疑态度, 对中共能否管理好城市经济、能否与党外人士合作好有疑虑。这时候, 争取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 成为中共在港统战宣传活动的重要工作内容。

过去, 学界多关注中共对民主党派人士、社会贤达、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群体的统战宣传, 而较少将目光对准在政治光谱上离中共最远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有关中共统战工作的研究, 对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关注度不够。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实践历史悠久。李松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的史线梳理^[6]。孙扬、杨汉卿主要聚焦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香港市委^[7]、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8]等具体组织开展的统战工作。对抗战后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工作研究, 学界则主要关注具体的工作策略^[9]和关键的领导机构, 如中共中央南京局^[10]。具体到统战宣传工作, 学界也主要围绕《华商报》《群众周刊》等报刊展开^②。如果将中共开展统战工作的地域问题和领域问题结合起来看, 会发现中共对香港工商界人士的统战宣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① 关于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策略, 详见杨奎松. 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策略 [J]. 近代史研究, 1993 (3): 129-161.

② 代表性研究包括: 范佛山. 中间势力的争夺: 香港《群众》周刊的发行 [J].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19 (5): 93-101; 何薇. 1947—1949年国共在香港的宣传争夺战——以《群众》周刊为考察中心 [J]. 党的文献, 2018 (1): 86-91; 桂湘书. 孤岛喉舌: 抗战时期《华商报》统战言论研究 [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4.

对于中共如何在抗战胜利后的香港建立舆论阵地，并系统性开展经济宣传和经济统战工作，学界较少提及和做详细深入的分析。1939 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后，中共着手安排经济统战工作。该项工作随时局变化经历了由西南到东南的地域跨度，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到中共中央南京局再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组织变迁。以方方、许涤新等人为主要领导，以《经济导报》为宣传中心，并以党内党外联动的形式，中共在商业实践、政策学习、人才培养等方面由上至下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经济统战宣传网络。这项实践展现了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香港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经济统战工作。因此，本文拟以 1947 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香港创办的《经济导报》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中国共产党如何借助该报，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和经济政策失败导致的民族工商业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介绍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展现解放区币值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从而逐步获得工商界人士的信赖和支持。《经济导报》原始文献保存相对完整，且专门以我国香港和国内外金融、经济状况为报道对象，创办之初就明确把香港的工商界人士作为主要目标读者。因此在经济领域，《经济导报》比《华商报》《群众周刊》等更具针对性和代表性。本文将关注与《经济导报》相关，以香港财政经济委员会和许涤新等人作为代表开展的具体的经济统战宣传工作，以期全面展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港经济统战宣传工作的基本面貌。

一、香港《经济导报》的创办

1946 年 10 月国共和谈破裂后，中共根据形势需要，着手安排各项准备工作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1946 年 12 月 16 日，周恩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情况，其中说到：香港地位日渐重要，不但对两广、南洋方面，对欧美联络方面，亦日见重要。华南工作甚繁，领导机构需要适当解决，以便统一领导与秘密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议决设立香港分局^[11]。香港分局在组织上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设三个平行组织，分别为：港工委（香港工作委员会），专管香港及华南、南洋公开的统战、报刊、文化、外交、经济、华侨、群众（工、青、妇）各项工作；城委（城市工作委员会），专管华南各城市工作；各地区党委，专管各小城市及农村工作^[12]。鉴于香港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香港工作委员会专门设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下称财经委），负责对香港工商界的各项工作。财经委书记由许涤新担任，许长期在重庆和上海负责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工作经验丰富。财经委主要工作有两项：一为统战宣传，二为筹措商业经费。该委员会中也有在香港私人企业中任职且负责党外联系的地下党员^{[5] 345-346}。

当时，香港工商界对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不够了解，容易被不实新闻报道蒙蔽。他们不仅对中共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不够了解，存在不必要的害怕心理，对于世界市场也缺乏全面深入分析。因此，财经委认为需要办一个刊物，以工商界人士为读者对象，系统介绍解放区的经济情况和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沟通各地经济信息、分析国内外的经济形势^[13]。经港工委同意，财经委于 1947 年元旦正式出版《经济导报》。这是一份以经济、金融为主要内容的周刊。财经委希望以该报为宣传中心和联络工具，向香港工商界提供经济政策方面的信息，以此靠近并团结在港的工商界人士。筹办之初，因为资金无着，经费主要依靠同人筹措。以每百港元为一股，先是同人认股，然后通过各人作为新闻记者活动时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在工商界的朋友中集股。筹股工作得到了

王明亮,付满仪.“以商言政”: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以《经济导报》为中心[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1):90-104.

多位香港工商界人士支持,包括华比银行的华人经理邓文田、南洋烟草公司董事长简玉阶、泉昌公司董事长黄长水、新华银行经理徐湛星等人都认了股^{[3] 287}。香港“糖业大王”李启辉不仅出资支持,还不顾各方面压力慨然出面担任《经济导报》的发行人,为该报出版负法律责任,并对外以报社总经理的身份活动^[14]。报馆地址最初设在德甫道中旧东亚银行605室,后因业务发展,先后搬迁到皇后大道中78号2楼、乍畏街102号4楼和乍畏街113号3楼。《经济导报》创建初期,总编辑先后为赵元浩、陈文川,经理为林铃,发行为陈展谟,记者和编务人员有孙孺、麦杨(麦克明)、杨文炎、袁式邦、英冰若等人。1947年底到1948年下半年,工作人员陆续从10多人增加到80余人。蔡北华、古念良等人也主持过编辑部工作。1949年5月以后,赵元浩、陈文川、孙孺、林铃等相继离开香港,回内地参加工作,编辑部由杨文炎负责,陈展谟任经理,直至50年代初期^[15]。

《经济导报》定位为面向香港、面向南洋的刊物,发刊词中明确表示该报的出版是为香港工商界提供一块“沟通各地经济消息,研究各重要国家的经济变动,尤其是研究香港及其附近各地的各种经济措施、经济动态”的园地^[16]。许涤新在创刊当天即向全体工作人员强调,该报的编辑方针应该“要坚持爱国的进步立场,要反映香港经济的现实,使它成为香港以至东南亚一带工商企业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5] 352}。因此,该报在报道内容上兼顾国际和国内,经常刊登国内外经济短评和专论、经济特写和经济内幕,也常刊登香港一周金融贸易,交通、通讯及香港金融物价等统计资料,介绍金融常识、民族资本家和国内的工厂商行。此外,报纸还经常出版专号或特辑,对当时国内外的重大经济事件和经济新闻进行专题报道。为了及时获取国内外金融、工商行情通讯,该报在英美、南洋、上海、广州等地聘有记者,还经常约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经济专论,预测金融市场行情变化。《经济导报》创刊后,大量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对外大举借债、对内滥发纸币、掠夺人民的经济政策,报道各地物价飞涨、生产萎缩、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情况。该报同时详细介绍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日后经济工作规划,以直观明了的数据和信息揭示现实政治对工商界的直接影响,实现从“在商言商”向“以商言政”的转变。因消息准确灵通,立论公正翔实,该报很快就打开了局面,销路遍及国内外。

二、香港《经济导报》的内容安排

财经委分析香港工商界的现状时认为,香港一般的工商界人士在思想意识和政治认识上较上海和重庆都落后。他们绝大部分人都在国统区有财产,因此在政治上不敢得罪国民党^[17]。当时的香港工商界普遍存在两个心理:一是惧怕国民党官僚资本“与民争利”,侵蚀民间资本的市场;二是长期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担心中共“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清算斗争”。因此,中共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非常注重心理研究。周恩来特别指示许涤新在统战宣传工作中要注意方式方法:“对人家讲话,必须了解对方的活思想,说出话来才不会文不对题。我在中学时代就很重视心理学这门功课。你们办报纸刊物也好,搞统战工作也好,如果抓不住对方的活思想,那就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董必武也再三叮嘱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工商界有工商界的特点,它不同于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如果你们忽视工商界的特点,搞得很‘左’,那就没法吸收更多的人来参加。”^{[5] 244-246}在具体报道上,中共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供参考。1946年6月16日,新华社总社要求各地分社在报道

经济和生产建设时“应多介绍在政府扶助、劳资合作下，民营工业发展情形，对其所遇困难与克服经过，亦可有所说明，以与国民党区在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统制下民族工业之破除毁灭，形成对照，为争取民族资本家的同情”^[18]。同年 7 月，新华总社又对“国民党区民族工业破产，我方工业发展对照”的宣传经验进行总结，认为这种黑白对比的报道手法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要求各分社系统、有计划地进行此种宣传，对有宣传价值的事例，应专门组织采访，写成综合报道和详细报道^{[18] 66}。后来《经济导报》在香港的经济统战宣传工作，也基本遵循上述原则展开。

（一）揭露国民党治下的经济危机与货币政策弊端

近代中国曾出现过多次金融风潮，这往往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和政府财政等关系密切^[19]。1935 年国民政府推行金融管制政策和发行法币，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政府支出暴增，法币发行量急速膨胀，导致物价飞涨。抗战胜利后，为应付内战支出，法币发行量再度急剧增加，引发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47 年 2 月，国民党实施金融开放政策后又引起黄金风潮，社会经济危机加剧。1948 年 8 月，在黄金风潮的影响下，国民党发行金圆券，但该币发行后贬值迅速，导致更大的经济混乱^[20]。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但没有稳固国民党当局的政权，反而加速其崩溃和民心的最终转向。

1946 年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军费激增，走上滥发货币的不归路。到 1947 年，法币相比 1937 年发行量增长 47 万倍，贬值 400 万倍。1947 年 1 月 22 日出版的《经济导报》第 4 期刊登《论法币》一文，认为法币贬值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政府的收入因为官僚集团的侵吞揩油而减少；另一方面政府的支出又由于他们的巧取豪夺而增加，加之他们垄断进口贸易、大量输入美货导致入超加多。几方面原因推动并进一步恶化法币的贬值^[21]。同年 7 月，《经济导报》第 28 期推出题为《法币问题面面观》的专栏讨论文章，以“法币发行了多少？”“美金涨至百万元？”“游资如何兴波作浪？”“有办法稳定法币的币值吗？”四个简洁又强有力的问句作题，以自问自答的形式，用详细的数据证明由于滥发无度，法币继续贬值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同时，该文提前一年成功预言发行新币将是国民政府解决财政和金融困局的“最后一张王牌”，并提前宣判新币的死刑——“最后终难避免崩溃的厄运”^[22]。1948 年 4 月，《经济导报》第 67 期再次将目光投向法币，以 1947 年前三个半月和 1946 年同期的法币和内汇变动数据作比较，驳斥了蒋介石在“国民大会”报告中谎称法币储备金充足，其贬值完全是由于民众的心理作用的说辞，再次强调法币必然还会继续贬值^[23]。

《经济导报》第 82 期《法币，会走马克的命运吗？》一文，将法币与一战后的德国马克作比较，认为二者情形既有相似又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国民党军费开支巨大且不断上涨，而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正规武装和政权，法币的根基被动摇，并坚定指出“法币的处境比当年马克尤为恶劣”^[24]。

《经济导报》创办时，正是两次金融风潮影响国内政局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加之其身处作为金融自由市场的香港，对国民党经济危机的揭露和批判成为该报关注的重点。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内的官僚军阀借机大发横财，手握的大量货币成为游资，引发了社会面的抢购狂潮和物价高涨^[25]。以宋子文为阁揆的国民党行政院开放外汇市场并抛售大量黄金，社会秩序愈加纷乱。万平的一篇文章分别总结了孔祥熙时期的黄金弥补财政政策 and 宋子文的黄金平抑物价政策，并指出黄金潮的“前奏”实是国民党内部的孔宋之争。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及财政经济政策失败，引来 CC 系和孙科

派的批判, 其中尤以陈立夫的批判最为激烈。但作者随后指出, 两次黄金政策对金价的推动, 实际上是在培养既得利益集团, 政策成为官僚资本家敛财的工具。黄金潮动摇的不仅是宋子文的经济政策, 更是其背后整个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26]。1946年在上海爆发的外汇与黄金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地, 香港亦受影响。《经济导报》高度关注黄金问题, 陆续发表《黄金的出路》《再论黄金的出路》《论国内黄金外币市场的复活》《国内黄金市场的复活》等多篇文章, 并在第10期出版“黄金问题专号”, 邀请香港多位工商界人士讨论香港黄金的出路以及国际黄金市场现状。这些探讨实际上是要揭开国民经济崩溃内幕。国民党当局自抗战后实施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以来, 内地黄金买卖受到严重影响。由于香港的黄金销路与国内外市场紧密接轨, 香港工商界利益亦受损害。黄金问题的失控, 自然指向其背后政府的经济失控。

1948年8月, 如《经济导报》先前预判, 国民政府宣布发行新的金圆券以取代法币, 并用以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经济导报》利用“经济内幕”栏目深入分析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的内幕, 指出金圆券的发行不止是经济层面的问题, 还涉及军事和政治层面, 直言“币制改革是更大的通货膨胀, 金圆券不久一定要跌”^[27]。在币改之初, 香港工商界多半还对金圆券心存幻想, 认为币改可能成功, 把《经济导报》等中共报纸对币改必定失败的预言当作危言耸听, 但预言不到一个月即被证实^{[17] 372}。金圆券发行不久就出现发行额和市场双重失控的情况, 快速贬值^[28]。《经济导报》对金圆券的贬值实况给予密切关注。相关报道多以“金圆券崩溃了!”“金圆券的梦碎了!”“金圆券倒了!”“金圆券的河堤决溃了!”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和断言性质的语句为标题。同时, 《经济导报》密集报道金圆券发行对香港市场的冲击, 如“米价先跌后挺”“纱布无法经营”“油类成本增加”“猪鬃羽毛出口锐减”和“工业品市价飞涨”等。以真实的数据和事实展示了国民政府的所谓币制改革如何恶化香港工商业的境况。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 中共的货币政策受到香港工商界的关注。《经济导报》邀请了包括千家驹、章乃器、方治平在内的多位工商业人士和金融专家发表看法, 对可能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善后问题作了预期, 一致认为国民政府时代的旧币善后问题虽然十分困难, 但将来新中国的货币前途充满光明^[29]。

《经济导报》持续关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引发的两次金融风潮和货币政策, 原因有二: 一是该报本身定位为经济周刊, 读者多为香港工商业人士; 二是作为中共在港的经济统战宣传阵地, “揭露蒋区经济崩溃, 四大家族之侵害民间企业”^{[17] 181-185}是其任务之一。该报的报道手法亦灵活应变, 借用翔实的事实和数据, 以及专家学者和工商业人士之口, 综合向读者展示国民党治下岌岌可危的经济政策。正如财经委工作报告所说: “每一次经济风暴使香港的商人更进一步认识国民党是不行了, 因而逐渐来认识中共, 懂懂(注: 原文如此)中国将来的前途。”^{[17] 86}《经济导报》在香港的经济统战宣传工作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 他们想方设法对报馆工作横加干预和破坏。一些与蒋介石政权、官僚资本有关系的香港机构和商行不但拒绝订报和刊登广告, 甚至对该报肆意造谣污蔑和破坏。《经济导报》的多位记者也遭到国民党方面的谈话、警告, 甚至收到通缉令或被开除^{[3] 291}。由此可看出, 中共经济统战宣传工作卓有成效, 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惕和打压。

(二) 解释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中共高度重视对工商业人士的释疑, 只有将这些疑虑破除, 工商业人士才会真正靠拢中共, 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才能进一步壮大。香港工商界作为拥有经济实力且看重经济利益的阶层, 在抗战

时期解放区进出口贸易和抗战后经济恢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共要壮大统一战线的力量，尽早完成革命和抗战后的重建目标，必然要努力争取这一群体的支持和配合。1948 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中胜利的天平逐渐向中共一侧倾斜，香港工商界中关心解放区经济和工商政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迫切想知道解放区工商业情况，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工商政策将如何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回答和细致解释，将难以破除他们的疑惧心理。港工委在一份工作报告中提出：“这半年的经验，使我们认清单报告军事发展，只能使侨商增加其对于蒋的失望，必须致力于新民主主义与工商政策之宣传教育，才使他们接近我们，削弱他们对我们的疑惧。”^[17]³⁷²作为中共在香港经济战线上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宣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消除工商界尤其是香港工商界人士的疑虑，亦成为《经济导报》的重点工作。事实上，《经济导报》已经多次铺开舆论，介绍解放区的经济贸易情况，探讨如果新中国建立，中国的经济建设应该走向何方。《经济导报》的报道内容覆盖货币、银行制度、合作经济、私人经济、对外贸易、农业等多个领域。

该报在 1949 年 1 月 1 日的经济年报中首次详细了解解放区的经济政策。该文作者在介绍解放区工商业时说：“有些人对目前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这样的怀疑，以为……，将不允许私人资本之存在，其实不然，……它是在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使中国民族资本可能得到自由的发展。”^[30]何维今在讨论新中国工商政策时则说：“工商业者想起中共的负责人曾经说过：国家经济将要处在领导的地位，又想起国民党时代官僚资本的垄断与专权，真是不免还有余悸。……（但）新政权要求整个国民经济向上发展，……国家资本主要将放在那些有独占性的及私人资力举办不来的企业上，而留给私人资本的天地是非常广大的，因此，在这一个意义上说，领导不是垄断，而只是一种分工。”^[31]私人工商业在新政权下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如何经营，是工商界最为关心的问题。部分工商业人士由于疑虑和不了解新中国的经济政策，“甚至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毒宣传，怀疑私营企业将被淘汰，全部改由国营”。《大军渡江与工商业》一文从解放军渡江一事入手，回答了生命财产是否受到保障、私营企业是否受到保护、工商业者是否有生意做等问题^[32]。《新中国私人工商业经营问题》一文则回答了私人工商业是否还有可为、是否要改行、怎样经营等问题，文章精心设计了甲乙两商人的对话情境，以一问一答的讨论形式介绍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

以香港恢复与华北解放区贸易为例，《山东解放区进出口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和《征收进出口税暂行条例》公布后，《经济导报》除了多次在“经济新闻”栏目刊登条例内容和山东解放区进出口货物税目税率表外，还刊登了一期《香港与华北解放区贸易答问》，为香港工商界答疑解惑。《新中国与香港商业》一文对全国解放后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问题作出解答，认为新中国的贸易将会是“合理的管理”，是“以发展国内民族工业及以农业的生产，繁荣国民经济为目的。在合理的管理条例之下，不论公营的私营的商人都一律平等待遇，毫无特权”。这篇文章还指出，没有理由认为新中国对香港的商业有坏的影响，它将使香港与内地的贸易从官僚资本的独占之下解放出来，这对香港经济的繁荣显然有好的影响^[33]。

（三）综合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对香港本土经济的影响

《经济导报》注意将国际经济形势和香港本土经济形势相结合，为工商界提供专业的经济内容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经济矛盾日益明显，两国在经济方面的角力间接影响中国、日本、南洋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经济导报》对此特设专题，探讨英美经济斗争的矛盾与策略

及其对香港工商界的影响。《经济导报》还尝试使用外国人视角, 为读者提供客观参考。“经济内幕”一栏则从英美在香港的经济斗争角度切入, 分析二战后美国入侵中国市场、贸易额在香港的占比显著高于英国等现状。在香港受英国殖民期间, 英国为了攫取更多利益, 实施了管制外汇和物价、统制商品进出口、实行特惠税制度等七种政策。美国对香港的影响, 则是使香港成为黑市中的美汇供应者, 或是采取与中国人合营的方式到香港发展贸易。“英守美攻”的状态使“香港已成为英美经济战的远东火线了”^[34]。除此之外,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扶持, 以及日本货物向世界各地市场尤其是香港市场的铺开也引起《经济导报》的重视。美国这一举动既是为了剥削日本廉价的劳动力发展贸易, 也是为了提高日本市场的购买力以促进美货的销售, 由此缓解美国可能到来的经济恐慌。日货在美国的支持下得以降低成本倾销至国际市场, 直接影响中国尤其是香港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反对美帝扶日复兴经济特辑强调“为了生存, 为了和平, 为了国家民族的经济命脉, 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日本这样的复兴……要有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建, 必须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扶日经济复兴政策, 这是美帝借刀杀人的手段”^[35]。《日货重登远东市场的危机》《德莱柏复兴与日本经济的分析》《日本货在香港》《日本货满天飞》《日货的浪潮及其他》等文章, 分析了日本货物倾销世界市场可能带来的危机。报纸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复苏以及美国力量在背后的支持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呈现。

该报还关注南洋地区的经济发展, 马来亚、暹罗、越南等地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疯狂掠夺、宗主国的统治和榨取以及英美经济斗争的影响, “经济上的贫血症相当严重”^[36]。第 13 期南洋经济问题专号认为, 南洋的经济问题事关香港地区与南洋的贸易, 关联程度极高^[37]。与香港工商界关联紧密的华侨华人的经济利益亦受到关注。华侨的海内外利益在抗战后如何得到保证, 侨汇问题如何解决, 华侨对祖国的投资能否持续, 既是经济问题, 也是政治问题。《经济导报》一直关注华侨贸易和侨汇问题, 刊登了《华侨的殷殷期望》《华侨投资的估计及其事业的轮廓》《关于华侨投资祖国问题》《论侨汇问题》《论现阶段侨汇及侨汇新政策》《现阶段侨汇之病态及补救办法》等多篇文章。

自鸦片战争后, 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对中国民族资本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彼时香港作为中国的经济港口、西方国家经济斗争的重要场所, 在香港的工商业人士势必需要有专业、客观的经济报道为其提供决策参考。《经济导报》关注一般报道但又不限于此, 编辑和记者们习惯于首先详细分析当下的经济形势, 探讨各国在经济场上的角力和利损; 其次用专业的经济金融知识、数据等分析其对中国尤其是香港工商业的影响, 并适当给予参考建议。从报纸本身的报道来说, 《经济导报》首先尽职地践行了自己作为一份经济新闻报纸的担当, 这样的做法自然能够吸引香港工商业人士, 并为中共开展经济统战宣传工作奠定基础。

香港工商业自二战后有所萎靡, 各行各业的产量和销量都不同程度地收缩。第 14 期香港经济问题专号分析原因, 一是资金和生产原料缺乏, 销路受二战影响而不通畅; 二是国际市场购买力下降, 各国限制进出口、商品交换范围收缩, 香港的港口转口量下降。香港的经济危机既受到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形态以及英美两国经济斗争的影响, 也受到新民主势力与新法西斯势力矛盾的影响^[38]。同时, 香港经济元气未复, 港英当局颁布的新税制度又不合时宜, 包括华商总会、中华厂商联合会、

九龙华商会在内的多家商会一致反对此征税举动。《经济导报》以列举数据和建议措施的方式建言三思新税制度问题，充当“喉舌”为工商界说话^[39]。该报还在 1948 年连发两期专号和特辑，分别从香港的财政政策和金融市场入手来讨论香港经济问题。第 66 期对香港财政政策和现存经济矛盾的剖析，揭露了香港工商业存在的经营危机。该期附上的《研究香港财政经济情势参考资料》，强调在种种经济矛盾的综合性冲击中，尤以南京国民政府、香港与英美之间的矛盾为主要^[40]。第 76 期则着重分析香港金融业的情况，呼吁业界“应该把希望放在祖国的解放上，并争取全面解放的新局面迅速到来”^[41]。

综合而言，《经济导报》更重视对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国际经济形势直接影响中国国内的经济市场尤其是香港的经济市场。该报能够有效地将国际经济动向与香港本土的经济发展相联系，借用短评、“经济内幕”“一周金融”“特写”等栏目呈现多面的分析视角；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更多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挂钩。《经济导报》在内容和态度上的贴近性和时新性，也为打动香港工商界、拉近中共与其心理距离和现实距离产生了实际效果。

三、把报社打造成为中共在港经济统战工作的中心阵地

自从列宁“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论断传入我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报纸功能的理解就多了——报纸不仅具有宣传的功能，而且具备组织的功能。报纸和宣传工作不仅要反映现实，还要指导现实、组织运动、推动工作。要实现在香港的经济统战工作目标，仅靠报纸在版面上表明立场和观点，宣传共产党的新经济政策远远不够，它必须从宣讲者进一步变为组织者，把广泛分散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进步工商业人士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经济导报》创办之初，许涤新就指示报社同志不可孤立地办报，应该利用这个宣传阵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把宣传和统战工作结合起来做^{[5] 353}。以报社为依托，财经委在香港工商界首先建立起几个重要的“据点”，包括工商聚餐会、反扶日会、工商俱乐部、经济记者联谊会、和平论坛社等。用“在商言商”的方式拉近与经济记者、香港工商界、经济学家的心理距离。《经济导报》搭建起各种平台，通过线下联谊谈话和讨论等各种方式，充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宣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使香港工商界认识到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如果不打倒代表官僚资本的国民党政府，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就无从谈起。

（一）搭建经济联盟，影响进步华商

以《经济导报》为中心建立的香港经济记者联谊会，是香港经济新闻界的统一战线组织。该报创刊时，吸收了香港各大报纸经济版记者 10 余人^{[13] 532}，其后人数不断扩充。香港各大报纸需扩大经济版面时，又多数由在该报工作的同事兼任，“许多同事都肩负了双重工作任务，白天要采访新闻和为《经济导报》工作，晚上回去各自报馆撰稿或编辑，生活很为紧张”。林铃在回顾《经济导报》的创办历史中提到，为了办好这样一份经济刊物，“需要团结香港各报纸经济记者一齐来干，（我们）就利用我们是经济记者的便利，发起组织一个‘香港经济记者联谊会’”。联谊会不仅组织参观工厂企业、进行集体采访^{[3] 288}，还会交流国内外经济状况，讨论主要问题并将意见发表在各家报纸上。记者们利用茶叙时间，每天中午在香港大酒店或告罗士打酒店的茶厅交流信息，然后分别采

王明亮, 付潇仪. “以商言政”: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以《经济导报》为中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90-104.

访。晚饭后又集中到《经济导报》交换新闻, 再分散写发稿件。各报政治立场虽然不完全一致, 但在经济宣传上基本相同。财经委汇报工作时亦提到: “经过这些关系, 我们已开始在工商界活动中发生影响了。在‘经济记者’中, 在‘工商聚餐会’中, 我们多少都能起了作用了。现在香港‘经济记者’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大致差不多, 聚餐会的布置大体上是在我们手中。”^[17]⁸⁶⁻⁸⁷ 可以看到, 联谊会将香港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新闻工作者都聚集在一起, 《经济导报》则成为他们的活动中心。这一团体不仅支撑了《经济导报》的创办, 也为香港经济新闻的后续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 经济新闻记者在香港各大报中的流动性和整体性亦得以体现。

香港经济记者联谊会的记者与香港工商业人士的联络, 积极响应了中共经济统战宣传工作的要求。以高卓雄竞选香港华商总会会长一事为例, 当时的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九龙总商会是香港工商界最重要的三大社团, 也是中共在此开展统战工作、与国民党斗争的重要场所。1948年香港华商总会改选, 财经委尤其是经济记者联谊会利用各种办法助力“以商言商”的新兴商人高卓雄。高最终竞得会长一职, 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广州参观时, 对以赵元浩为代表的《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感谢^[42]。这一举动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与香港华商总会继续保持良好关系打下了基础^[43]。可见, 经济记者联谊会在获取经济情报、助力中共开展经济统战工作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是中共开展统战工作的另一个重要阵地, 该俱乐部的主要争取对象是香港中上层工商业人士。抗战后国民党对进步势力的压迫和摧残, 使大批民主人士南逃来港。港英当局在明面上不支持内地任何一方政治势力, 但也不允许他们在香港有公开的政治性活动。民主人士要在香港开展进步活动, 亟需一个能够在此合法存在和开展活动的社团。当时在港的中共地下党人和进步的工商业人士也面临同样的困境。1947年初, 财经委负责人许涤新到港后, 组织建立了“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从菲律宾归国的福建籍侨商黄长水^①出面在港英当局将其注册为公开合法的团体。该俱乐部是香港进步爱国的工商业人士唯一的合法团体。自1948年春天开始, 俱乐部每周四晚聚餐一次, 每次聚餐时会邀请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工商业人士。马寅初、胡愈之、章乃器、千家驹、章汉夫、侯德榜等人都先后在会上发表过讲话。港英当局虽不允许有公开性的政治活动, 但不禁止建立带有政治色彩的社团^[44], 因此俱乐部的活动形式多样。除此之外, 统战小组还多次召开小型座谈会(学习会), 同聚餐聚会形式相结合^[5]³⁵⁹⁻³⁶¹。俱乐部中既有香港的工商业资本家、银行家和知识分子, 也有在港英当局就职的工程师和香港大学教授, 还有海外侨商和极个别的外国商人。餐会也有《经济导报》《华商报》以及经济记者联谊会中的记者参与, 俱乐部每次的专题讲话和座谈情况, 次日会在香港各报刊登出^②。

俱乐部为香港工商业人士联络感情、交换经济讯息、讨论国内时局提供了活动空间和意见交换场所。《经济导报》中的中共党员则在其中发挥组织和领导作用, 并经常对参加聚会的成员开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宣传, 使大量原来处在中间地带的工商业人士逐渐向中共靠拢。由俱乐部主导的

① 黄长水是上海暨南大学毕业生, 长期在菲律宾经营工商业。建立俱乐部时, 黄长水首先捐出1 000元港币, 会务工作也由其负责。

② 以刊登情况为例, 有《军事惨败后的金圆狂泄风潮》, 《经济导报》1948年10月26日; 《中国工商界的出路》, 《经济导报》1948年11月9日; 《论日前经济形势》, 《经济导报》1948年11月23日;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经济展望》, 《经济导报》1949年1月1日; 《华北贸易管理与港华贸易》, 《经济导报》1949年3月29日。

座谈会主题往往与《经济导报》的报道方针相同，包括世界经济、香港地区经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等专题，以此帮助工商界了解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香港工商业的发展，并发动工商业人士与解放区恢复贸易往来^{[3] 292}。俱乐部的聚餐会对宣传中共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揭露国民党经济危机等话题在香港的传播起到一定作用^{[17] 371-372}。俱乐部中坚分子还将会员们聚集在一起，积极推动新的组织建立，如陈君冷牵头建立民建香港分会，黄长水等人组织香港爱国人士代表团和回国观光团。

这些组织及活动不仅使民主进步人士与中共的联络更加密切，还为他们提供了了解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窗口^{[5] 360}。香港工商业人士陈祖沛的转变是其中典型代表。陈祖沛是香港大企业之一——大成行的总经理，常年在港经营杂粮土产批发，在香港工商界享有很高声誉。中共接触陈祖沛后，认为其“有正义感，不随浊流，思想倾向进步”，遂有意识地向其介绍共产主义理论的相关书籍，使陈祖沛逐渐关注国内外形势，并对国民党的经济腐败和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思想有所了解。陈逐渐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几年中对进步事业给予多次经济支援，累计捐资 10 多万港元。后来，他参加俱乐部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与共产党人长期的接触使其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有了更为直观深刻的理解和认同^[45]。1948 年冬，许涤新在俱乐部聚餐会上号召香港工商界通过经济活动支援解放区和人民解放事业。陈祖沛积极响应，率先出资 80 万港元，以大成行为主力与黄长水、郭宜兴等人联合集资共 120 万港元并组建新中公司，向内地解放区运送大批物资。陈祖沛本人亲自押船北上，一批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如欧阳予倩、萨空了、金中华等也随船北上^[46]。广州解放后，陈祖沛参与发动香港各界爱国人士组织代表团到广州慰问南下解放军。1950 年，国家推出第一批折实公债，陈祖沛急国家所急，认购公债 15 万份，时值港币 105 万元。1951 年，陈祖沛把自己经营的大成行的 1 700 万港元的资产全部转回广州。陈祖沛由此成为这一时期香港工商界积极靠拢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中国的楷模^[47]。

（二）团结财经人才，形成“香港经验”

宣传本质上是运用各种有意义的符号传播一定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而引导人们行动的一种社会行为。所以，一切宣传行为和宣传活动的最终落脚点都要回归实践并作用于实践。《经济导报》广泛动员党内外人士共同参与经济统战工作，并助力中共恢复经济建设。以许涤新为代表的中层领导率先垂范，尝试用“以商言商”的形式融入香港工商界，主动开展经济活动。财经委为了增加运转经费和拓宽商业联系，筹办公司并广泛结交人脉。改建的新侨公司和新联公司、东江纵队北撤前办理的“启源行”和著名的安达公司，其人员在政治上都直接受财经委甚至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领导。在 1948 年的一份报告中，港工委要求开展政策学习必须“读文件与具体实际结合”，并着重提及要学习财经委组织工商座谈会、经济记者会的经验，利用外围报纸来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17] 246}。作为上级的港工委要向财经委学习经验，可见后者在统战和宣传工作上已获得相当成果。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还曾发布《补充工商政策七条》，内容主要指向内地游击区的物资、金银、侨汇等问题，要求宣传并内部学习。这一文件出自财经委之手，以“香港经验”作为内地恢复经济建设的参考。长期活跃在经济统战工作一线的许涤新还负责经济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尽管专业性较强，但同样也是“为了搞好宣传工作”。财经委在香港跑马地奕荫街 33 号 2 楼设置了资料室，对外称之为“建华经济通讯社”，实际主要订阅或是通过香港的地下党员和党外人士获得广州、上海的报纸，并从中剪收、摘抄和整理有价值的经济资料。许涤新正是由这里的材料出发，为《群众》

王明亮, 付潇仪. “以商言政”: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以《经济导报》为中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90-104.

撰写经济类文章, 资料室的材料也会在整理后转交给来港的共产党员^[5]³⁶³。在党内开展经济统战政策和经验的学习, 以及收集专业的经济资料, 从表面上看都主要服务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 但主要负责此事的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方方、财经委主要负责人许涤新, 都称是为了党的宣传工作。可以看到, 中共在港的党组织首先做到党内的主动作为, 扩大已有的经济宣传工作成效, 并积极开拓和活用自己在香港经济、工商界搭建的人脉, 以此扩展共产党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 中共也意识到仅依靠骨干党员和《经济导报》记者开展经济宣传和统战工作远远不够, 亟需大量财经方面的人才。因此, 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指示下, 财经委筹办起建中工商专科学校(简称“建中”), 主要培养华南地区的财经干部, 准备日后接管国民政府在华南的经济和金融机构。校内设初级、高级两种班型, 课程包括工商管理、会计、统计、银行、财政和政治经济学等。先期办起的达德学院同属中共在香港的统战组织, 被港英当局取消注册资格后, 该校经济系的学生很多都转入建中, 继续学习工商知识^[5]³⁶⁷⁻³⁶⁹。该校着重考量教师队伍, 从中可看出中共在联络和团结党内外人士上所作的努力。建中的教师以《经济导报》的编辑为主, 包括赵元浩、孙孺、古念良等人。该报编辑基本一兼多职, 以孙孺为例, 白天要负责收集经济信息、开展调查研究、给《经济导报》撰写文章, 晚上需给《华商报》写经济新闻; 同时参与经济记者联谊会和俱乐部的活动, 兼任学校的课程讲授^[15]⁴³。教师中也有靠近中共的无党派人士。以近代著名的印刷、印制技术专家柳溥庆为例, 其早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是国共合作时期两党驻法组织的重要人员。后来虽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 但他长期参加中共的进步工作, 多次为组织秘密印刷重要的军用地图、商业流通券和钞币。1948年到港后, 柳溥庆接受许涤新等人的指示, 在香港筹备建立南方人民银行印钞厂, 印制“南方人民银行钞票”“广州解放纪念邮票”, 同时在建中担任工业管理讲师^[48]。除此之外, 还有港澳地区的华侨在学校任教。从教师队伍的搭建来看, 中共在香港时期以培养党员和联动外围的无党派进步人士双线并行, 有效利用其业已搭建的工商界关系网, 为开展经济统战工作提供组织和人员上的便利, 获得卓有成效的宣传和统战实践成果。

《经济导报》创办的前3年正是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该报通过系列实践, 扮演好“喉舌”角色, 对香港工商界提供负责任的信息; 也为中共加速全国统一、获得物质支持和舆论支持作出了贡献。与报纸有密切社会关系的几个重要据点, 亦为中共联络、团结香港工商业人士, 宣传经济政策, 推动香港经济运动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该报是其中关键的联络和组织枢纽。在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的领导下, 《经济导报》及围绕它的一批进步人士和进步文化机构, 形成了由上至下的经济统战网络, 并在香港乃至全国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宣传作用。经过不懈努力, 到1949年初, 香港工商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和可喜的变化。财经委在给中央和统战部的报告中写到: “一、过去不谈政治的, 现在谈起政治; 二、过去光反对蒋之左右的, 现在也认为蒋不行了; 三、过去争与国民党勾结的, 现在避免; 四、过去惧怕我们的, 现在敢与我们接触; 五、过去暗中与我们接触的, 现在敢于在大庭广众中大谈解放区的工商政策; 六、承认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 七、设法与解放区通商成为今天香港的一股巨流。”^[17]³⁷¹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要员谷正纲曾经对以工商业人士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向中共靠拢表示疑惑: “周恩来飞来飞去, 人心惶惶, 奇怪的是连产业界也和他们拉。”^[49]中共在香港针对工商界开展的经济统战宣传工作, 形成的经济统战宣传经验和“香港经验”, 为解开这一疑惑提供了鲜

活生动的素材。

四、结语

“我们要宣传到使勇敢的人起来帮着我们宣传，我们要宣传到使怯弱的人都了解而赞助我们的主张，我们要宣传到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都联合起来，大多数向来为统治阶级作爪牙效奔走的人们都对于统治阶级倒戈相向，于是统治阶级便土崩瓦解地倒下来了！”早在大革命时期，党的著名宣传家恽代英就撰文深刻阐释党的宣传工作，认为其主要目标是把最广泛的各阶层群众“组织而吸引到革命的旗帜下来”^[50]。这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统战宣传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面对政治背景不同、心理各异、利益诉求多元的各阶层民众，如何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旗帜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宣传实践中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重要难题。如何让与中共心理距离最远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破除对中共的疑惧心理，加入到中共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阵营中来，无疑是统战宣传工作中极为棘手的一环。

中国共产党能否达成这一目标，亦为许多中外观察家所怀疑。1946 年冬，年轻的美国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对中共领导的解放区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深入走访。他后来将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和思考，写成《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在书中，他一针见血又略带悲观地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的原动力是农民起义。不过，虽然农民支持与否是内战的决定因素，它还不足以使共产党战胜蒋介石。共产党要打赢战争，取得天下，还必须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商人和军队摒弃国民党政权。否则，整个革命就可能蜕变成单纯的农民起义，等到进攻城市的时候就会垮台^[51]。后来的历史表明，中共不但成功找到了联系城市知识分子和工商业人士的桥梁，而且成功让他们汇入革命的洪流。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宣传工作中有诸多宝贵经验。第一，注重对群众心理的研究，做到方法科学、循循善诱。针对工商业人士普遍避谈政治的特点，《经济导报》在宣传策略上“在商言商”，先以准确翔实的经济报道吸引香港工商界的注意；再逐渐在报道上加强对国民党经济政策的揭露和对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的解释，巧妙实现“以商言政”目的，引导他们在“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中认清政治和现实。第二，坚持大宣传观和大统战观，不把统战宣传工作简化为文字工作和宣传干部的工作。在香港的中共干部，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和时机、借助香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在《经济导报》搭建的各个平台上充分发挥有利条件，积极做各方面的争取和引导工作，切实做到了全员做宣传、全员做统战。第三，注重宣传效果的落地，明确认识宣传是手段，组织和动员才是目的。以报社为中心节点，《香港导报》鼓励香港工商业人士从“言论场域”走向“实践场域”，在斗争实践中做出道路选择，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战争，最终达到统战宣传的目标——在实践中实现组织和动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2 月 20 日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52]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香港的统战工作经验，实际上为当今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镜鉴。在世情和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以“历史之

王明亮,付潇仪.“以商言政”: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以《经济导报》为中心[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1):90-104.

剑”刻“现实之舟”。要最大限度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他们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独特优势发挥出来,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创新统战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使其由宣传手段意义上的“统战话语”发展为工作形态意义上的“话语统战”^[53]。

参考文献:

- [1] 莫世祥. 中共革命在香港(1920—1949) [M]. 香港: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22: 10-22.
- [2] 袁小伦. 战后初期中共与香港进步文化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2.
- [3] 钟紫. 香港报业春秋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154.
- [4]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
- [5] 许涤新. 风狂霜峭录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238-239.
- [6] 李松. 迈向全方位统战: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统战工作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镜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 45-53.
- [7] 孙扬. 全面抗战时期香港国共两党组织工作析论(1937—1941) [J]. 抗日战争研究, 2020(2): 98-114+160.
- [8] 杨汉卿.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统战工作 [J]. 广东党史, 2005(6): 53-58.
- [9] 袁小伦. 战后初期中共利用香港的策略运作 [J]. 近代史研究, 2002(6): 121-148.
- [10] 朱益飞. 中共中央南京局海外统战工作考察 [J]. 党的文献, 2020(3): 88-94+113.
- [11] 周恩来年谱: 1898—1949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743-744.
- [12] 华南党组织档案选编: 1945年—1949年 [G]. 广州: 广东省档案馆, 1982: 347-348.
- [13] 夏春平. 2007世界华文传媒年鉴 [M]. 北京: 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 2007: 532.
- [14] 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5卷 [G].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228-233.
- [15] 曾牧野, 李子彪, 梁桂全, 等. 孙孺纪念文集 [G].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442.
- [16] 发刊词 [N]. 经济导报, 1947-01-01(1).
- [17]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 1947.5—1949.3 [G]. 1989: 86.
- [18] 新华社新闻研究部. 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 1931—1949(第1辑) [G]. 北京: 新华社新闻研究部, 1981: 66.
- [19] 吴景平. 近代中国的金融风潮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9.
- [20] 李金铮. 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9(1): 72-79.
- [21] 新潮. 论法币 [N]. 经济导报, 1947-01-21(2-3).
- [22] 本报集体讨论. 法币讨论面面观 [N]. 经济导报, 1947-07-10(2-4).
- [23] 广志. 论法币 [N]. 经济导报, 1948-04-20(4-5+17).
- [24] 古楠. 法币, 会走马克的命运吗? [N]. 经济导报, 1948-08-03(1-4).
- [2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M].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136.
- [26] 万平. 轰动全国的黄金潮内幕解密: 黄金政策与官僚资本 [N]. 经济导报, 1948-01-15(2-13).
- [27] 周日行. 金圆券发行内幕 [N]. 经济导报, 1948-09-07(4).

- [28] 吴景平. 近代中国的金融风潮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9: 290-295.
- [29] 如何收拾金圆和建设新币 [N]. 经济导报, 1948-12-07 (2-7+19-20).
- [30] 石堂. 一年来的解放区经济 [N]. 经济导报, 1949-01-01 (144-150).
- [31] 何维今. 工商业家怀疑什么? ——新中国工商政策的理论与实际 [N]. 经济导报, 1949-03-08 (5-7).
- [32] 秉德. 大军渡江与工商业 [N]. 经济导报, 1948-04-19 (4-5).
- [33] 孙霭明. 新中国与香港商业 [N]. 经济导报, 1949-02-22 (2-4).
- [34] 英美在香港的经济斗法 [N]. 经济导报, 1947-03-12 (9-11).
- [35] 勿让猛虎起来再噬自己! ——反对美帝的扶日复兴政策 [N]. 经济导报, 1948-05-04 (1).
- [36] 陈文川. 战后南洋经济的新危机 [N]. 经济导报, 1947-03-27 (2-4).
- [37] 大海. 香港对南洋贸易的新趋势 [N]. 经济导报, 1947-03-27 (5-7).
- [38] 广志. 论香港经济危机 [N]. 经济导报, 1947-04-03 (2-3).
- [39] 唐伟坚. 香港财政与新税 [N]. 经济导报, 1947-04-03 (4-6).
- [40] 本报集体讨论. 论香港当前财政经济大势 [N]. 经济导报, 1948-04-13 (1-3).
- [41] 均强. 论香港金银市场 [N]. 经济导报, 1948-06-22 (1).
- [42] 南方日报, 广东《华商报》史学会. 华商报史话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56-58.
- [4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资料: 第 54 辑 [G].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95-96.
- [4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广东文史资料: 第 47 辑 [G].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116-120.
- [45] 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广州文史第 56 辑 [G].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70-81.
- [46] 袁小伦. 战后初期中共与香港进步文化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302.
- [47] 甘兆胜, 林亚杰. 广东民主人士名人传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362-370.
- [48] 《柳溥庆纪念文集》编委会. 柳溥庆纪念文集 [G].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 1-15.
- [49] 刘焱, 米镇波. 周恩来研究文选 [G].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449.
- [50] 刘用亚. 新闻界人物: 恽代英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7: 70.
- [51] 杰克·贝尔登. 中国震撼世界 [M]. 邱应觉, 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0: 492.
- [52]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2 月 20 日) [J]. 党建, 2021 (4): 4-11.
- [53] 林华山, 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26-144.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高旻^{1, 2}

- (1. 中南民族大学 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湖北 武汉 430074;
2.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是党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应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从历史、理论、生活多个维度组织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生产传播。历史观叙事注重对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解释说明，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为话语素材；理论性叙事聚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的系统阐释，以不同时期党的民族工作实践为话语素材；生活化叙事侧重对各民族社会生活经历的生动讲述，以各族群众的日常交往和共同发展为话语素材。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在“三交”史料编撰、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完善、全媒体传播矩阵搭建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存在不同叙事维度相对脱节、话语传播目标靶向不清晰和传播感染力不足等问题。推进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体系建设，须尊重各族群众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交往需要，科学研判国内外社会舆论形势和问题挑战，从“历史—现实”“概念—事实”“文化—文明”多个叙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1.008

作者简介：高旻，中南民族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招标项目“中东部城市民族问题治理创新研究”（JDY23008）；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新时代深入推进民族社区互嵌式治理的实践逻辑研究”（CSQ23030）

引用格式：高旻.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1): 105-121.

事维度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党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要进一步讲明中国观点、讲清中国道理、讲好中国经验，凝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共识。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统一战线；民族工作；交往交流交融；话语传播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4) 01-0105-17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生活经历的系统凝练，是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实践的生动表征，对于理解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有着宝贵的叙事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1]。依据这一精神，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党不断健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

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在党团结各族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不懈奋斗中发挥着凝心聚力作用，并成为党和国家面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着力点。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2]。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3]。同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大力宣传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强化各族群众国家认同、推动对外文化交流互鉴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这意味着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不仅要形成历史脉络清晰、理论知识完备的内容体系，还需结合国内外社会环境变化持续强化其传播叙事能力。

梳理既有文献发现，学界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明属性及内涵表征。该类研究主要从认识论角度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文明的自然选择^[5]，内嵌着儒家思想“大一统”的政治伦理认同^[6]，呈现为中华各族儿女辛勤劳作的物质生产史与砥砺前行的不懈奋斗史^[7]。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是对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积极传播^[8]，发挥着引导各民族在思想、情感和行为上逐渐趋于一致的重要作用^[9]。二是提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叙事传播经验。该类成果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发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潜藏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亲缘意象^[10]，以增进中

中华民族共同性为叙事原则^[11]，有助于全国各族人民在对历史文化共同性深度领会与认同基础上，形成现实利益共同体和未来命运共同体^[12]。但也有研究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存在文化符号供给不足问题^[13]；有必要厘清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运行机理与律动规则^[14]；通过编织大型平台算法模型的交互过滤网络，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公共信息的供给质量^[15]。综观之，学界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主题已基本形成理论思辨和经验解释相结合的分析体系，建构出较为清晰的知识图示及方法路径。但现有成果多聚焦于叙事内容生发的溯源式研究，亟须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结构和能力问题展开系统性阐述。

基于上述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就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行动指向，构建中华民族自主话语与叙事体系，重在“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从叙事层面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实践结果，表现为建立在高度政治自觉和文化认同基础之上的“国族共同体”。鉴于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建叙事传播体系，势必要重视各族群众作为积极行动者的社会交往需要，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深度嵌合。这也是新时代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逻辑基点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论域内，人类的对象性交往活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以现实对象为出发点，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普遍的交互联系，这种现实对象不仅包括实体性的物质对象，也包括其他个人以及各种共同体^[16]。从结构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纽带结成的社会实体，其内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和语料素材。据此，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可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对人的交往活动论析视作基点。

（一）人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话语交往需要

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7] 人的生存发展方式为历史书写提供生动文本，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文化生产亦是以相应时代背景下人的社会活动为事实依据。语言符号的出现和发展，为人的活动存在身份提供了媒介载体^[18]。在共同体中，人们将个人观念及其对所属群体、社会的态度转化为话语信息。这不仅指涉个体要“如何做”，还意味着个体要成为“谁”，“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17] 147}。可见，人的对象性交往活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并为相关共同体精神形塑提供话语来源。在哈贝马斯看来，话语实践蕴含着普遍化原则，“经过话语形成的意志，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话语与讨论状况的形式特点足以保证，共识只会通过被适当解释的普遍利益而产生”^[19]。熟练掌握语言是个体完成社会化的重要特征，人只有能够借助话语媒介清晰表达己愿并理解他人意图，才能扮演正常的社会行动角色。人们在普遍化和内在化的层面上遵循社会规范的总体发展，并将伦理规范的有效性归结为有关各方的话语一致性^[20]。因此，以他者和外部世界为对象的话语交往活动，贯穿于个体生命历程始终，并在人与人、人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嵌套中形成完整的人类历史叙事。同理，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经历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重要话语素材，其中蕴含着个体理解他人、社会乃至反思自我的生存哲学。回顾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各民族始终保持着互嵌共生的空间格局，并以互补式经济关系为基础达成彼此承认生活习惯、文化偏好、价值选择的认知共识。也正是在这种生产生活多重互嵌的空间结构中，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理解和认同逐渐由实在层面拓展至精神层面，不断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义符号体系。

（二）个体社会交往活动的关系性叙事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建构的核心，是具体且真实的生命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相应的，社会和国家虽存在多种共同体形态，但究其本质依然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1] 523-524}。在马克思笔下，社会生活是个体通过交往活动不断建构形成的现实世界，蕴藏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关系。其中，“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1] 533}。语言源自于人们彼此交往的迫切需要，言说叙事是个体为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求而展开的关系互动，即“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物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1] 524}。有研究认为，共同的语言是不同主体取得共识、彼此认同的前置条件，也为主体间实现交互性和平等性交往创造了积极环境^[22]。不同社会话语表征的精神内涵虽各有差异，其意义解释却有赖于人们走入集体生活后结成的共同“意义之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23]这进一步证明，只有将人的交往活动放入关系分析维度，才能赋予相关叙事更具一般性意义的文化解释力。依此逻辑，新时代语境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性叙事，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群众日常生活经历紧密结合，以各族群众社会关系网络共通为现实基础，充分激发各族群众在共同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围绕各族群众生活交往过程的关系性表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主要内容。

（三）以共同体精神为指引的叙事体系构建

对“共同体”形态和价值的追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命题。马克思充分肯定真正的共同体对维持人的类属性的积极意义，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7] 199}。现实中，真正共同体指向一种普遍合作和真诚交流的社会实践，是人们建立在合理社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健康交往关系。在那里，人与人既是交往的对象，也是各自寻求社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 199}。因此，以共同体精神为指引的叙事体系构建，理应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科学思考“讲什么”（话语内容）和“如何讲”（传播方式）的问题，具体涉及如下维度。

一是基于“大一统”历史观的中华文明叙事。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时，曾提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24]。中华文明作为中国各民族共有精神财富，是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符号标识，经历史积淀形成的稳定社会文化样态。从历史维度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需要讲明在“大一统”的文化认同下，中华民族即使在危机时刻也从未崩离析，反而于逆境中不断深化互动融合，凝聚形成追求统一的思想合力。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民族事务治理经验叙事。民族事务治理作为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

关键环节，是党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着力点。党领导统一战线推进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着力构建和谐有序的政社关系，形成以党的方针政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枢纽性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25]。从理论维度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应当坚持以“两个结合”思维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讲清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面向各族群众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三是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的时代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彼此帮助、互相扶持过程中形成的交往关系集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由实践经验升华而成的共同精神指引。各族群众兼具中华民族文化创造者、传播者和践行者身份，个人的文化活跃度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紧密相关，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与更新的内生动力。从生活维度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理应充分尊重人们创造自我文化意识的文化主体性，讲好各族群众为实现共同富裕不懈努力的奋斗故事，传播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综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观对人的话语交往需要的积极主张，确证了各族群众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言说主体的理论基础，并为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提供了思路。对照现实，社会交往是各族人民发展的必要社会过程，这体现了人的社会性本质特征，反映在各民族族际关系整合的动态过程中^[26]。可见，人的话语交往需要贯穿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个体、民族到国家的完整叙事过程，引导各族群众以生活历史为依据讲好各自生存发展经历、在社会交往中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于中外文明互鉴中展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合力。

三、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理论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3]，并强调“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2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性质复杂，结构多元^[27]。坚持主体性视角有助于厘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结构，并就其中涵盖的不同传播维度和目标指向做整体性分析。

（一）以中华民族整体发展为主体的历史观叙事

中华民族共同体指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繁衍生息中形成的统一体，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存在形式的高度概括。“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应以中华民族整体发展为叙事主体，准确把握中华文明包容并蓄的鲜明特性，讲清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纬，具体包含如下议题。

其一，对中华文明特性的解释性阐述。从文明传承与延续角度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内在机理，在于中华文明崇尚和平、开放包容、止于至善的文化基因。中国的山川地理是孕育中华文明的自然土壤，中国各民族在此形成“农耕为主，兼业游牧”和“村落定居，迁移杂居”的生产生活结构。在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中，血缘纽带、宗族家族、民族群体内在地成为社会生活的伦

理基础，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人与群体之间需要密切而稳定的和谐关系和“通天人、合内外”的文明秩序^[29]。中华文明在中国各民族历史生活中内化为稳定的民族历史心性，并外显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实践。也正是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及其积淀而成的强烈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成为中华民族饱经挫折磨难但依然刚毅坚卓、发愤图强的精神力量^[30]。可见，若想讲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的历史演进过程，势必要将中华文明及其蕴含的文化基因作为整体叙事框架。

其二，对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多角度传播。以某一特定历史时空为锚点，中华文明多依托诸种文化符号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广泛传播。以图腾、器物、衣饰等为载体，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价值意蕴得以具象化表达，并借助人们的认知和交往实践融入日常活动。文化符号作为叙事中介，在以既有知识经验体系为存在基础的同时，关联着个体对外部世界的主观想象，由此达成个人与他者及所属集体、社会的精神联系。在以解释世界为目的的行动过程中，人们以交往为媒介创造出诸多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意义符号，这些符号为个体想象提供了可供解读的直观对象，进而建构成具有较强互通性的“意义共同体”。其中，符号域所具有的记忆功能铸成了文化的自主性，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情感认同的根源^[31]。将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话语体系之内，引导各族群众作为文化主体去主动探寻叙事符号所蕴藏的“意义一动机”，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体系的文化解释力。

其三，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的生动讲述。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征，强调的是作为文明体创造者的中华民族始终是这片土地的主人^[32]。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题的历史叙事，其全部话语必然来自中国各民族多元统一的历史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33]“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夯实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生成、演进、传续的社会共同体基础，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集体共识。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中国各民族始终坚持和谐相处的发展之道，逐渐形成血脉相融、文化相通、家国同构的多元一体格局。讲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是为了教育引导各族人民端正历史文化认知，正确理解各民族文化交融性和中华文化共同性^[34]。基于共同历史记忆将中国各民族的发展经历转化为话语蓝本，能够有效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二）以党的民族工作实践为主体的理论性叙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深刻践行“两个结合”的现实成果，是对党的民族工作经验的理论提炼和再阐释。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3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以党的民族工作实践为叙事主体，在扎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同时回应时代发展新命题，主要涉及两个基本面向。

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各项民族工作，根据中国实际，在不同阶段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

题的理论和实践方法^[3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基于对中国民主革命形势的科学研判阐释了“中华民族”概念。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于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出于“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的考虑，把“团结各民族于一体”作为“一个亟待解决并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37]。就如何建立现代化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问题，党以中国国情为依据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3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方位嵌入”理念，强调要顺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民族大流动、大融居的社会新形势，“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35]。在党的百余年历史中，“两个结合”不断激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把各民族紧紧凝聚成牢固的民族共同体^[39]。理论指导现实，现实回应理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不同阶段社会发展现实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党在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40]，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注入丰富的理论内涵。

二是聚焦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叙事。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积累的民族工作经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实践逻辑。在由革命斗争到社会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各族群众社会生活，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取得新进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牢固的现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41]。改革开放后，党以各族人民的社会发展需要为出发点，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等战略工程，提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理论观点，并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以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坚持“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工作方针，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继续书写各族群众团结发展新篇章。可见，党的民族工作成就与经验显著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的共同发展为现实例证，形成历史与现实相连接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

（三）以各族群众交往活动为主体的生活化叙事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稳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是对中华民族现代生活和时代形象的生动表达。党的二十大报告清晰指明：“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将各族群众交往活动确定为话语表达主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体系内呈现中国各民族齐心协力共建美好生活的行动图景，于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形塑新时代中华民族整体形象，主要涵盖以下内容。

一方面，突出人民本位思想，讲述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经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正是马克思主义与群众生活深入结合的过程^[42]。这赋予个体理论践行者与创造者的双重身份，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实践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不可少的经验来源。不同于历史叙事和理论叙事，生活叙事多以个体真实经历及其主观感受为素材，在话语表达中能够刻画出较为饱满的人物形象，有效提高

传受双方的意义理解和价值观念传递的通达度。生活叙事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生活化叙事达到表征、传递价值理念，并使这种理念逻辑根植于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围绕各民族在不同时代的核心主题，将个人生活、群体互动和社会建设衔接一体，能够构建出层层嵌套的表意空间。生活化叙事通常以记忆的形式存在和传播，记忆与心理相关联，成为将社群成员们连接起来的理想、期望和情感的复合整体^[43]。经验性事实意义的呈现，往往是一个多重意义的选择性表达^[4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化叙事多发生于“口口相传”的人际交往过程中，这种传播形式能够使个体“直面”经验事实，并以自身生活境遇为参照去解释、回应或转述相关信息，进而通过持续互动寻求彼此理解乃至共情。生活化叙事的根本前提是各族群众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真实在场，人们在亲身经历中感受着来自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将对他人的情感内化入自我心灵世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化叙事，能够辅助个体确定各自的社会角色和位置，调节与他人及其所属集体的交往关系，使各族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结成“共生共荣共享”的互嵌式格局。

另一方面，把握民族事务的国际话语主动权，展现中华民族形象。纵观世界舞台中的大国博弈，话语权始终是一国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近年来，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虽有所提高，但并未根本改变处于弱势的局面^[45]。回顾过往，欧美国家长期主导国际舆论并任意塑造他国形象，“西方中心论”已然是形容国际话语秩序最为贴切的表述。以此为背景，立足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命题，把握民族事务的国际话语主动权，展现中华民族形象，是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能力的必然要求。其中，中国各族群众当下生活状态是最具说服力的语料素材。这既能具体呈现每个独立人、家庭和民族的幸福生活，更能充分展示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显著发展成效，转变中国形象在国际舆论领域长期被他塑而非自塑的境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化叙事以中国各族群众真实生活经历为话语内容，能够有力回击欧美国家在民族领域挑起的国际舆论攻击。已有经验表明，国际舆论话语权因国力与地位势差而有强弱之分。近代以来，欧美国家凭借国力快速增长而主导国际舆论，将其权力政治逻辑强加于他国，甚至对政治立场不同的国家进行污名化叙事。对此，中国需要将民族外宣工作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的重要部分，秉持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团结的精神特质，基于中国各族群众生活与世界人民生活的共通性，传递新时代中国发展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滕尼斯曾言：“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46]在国际舆论领域中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现实意义，在于打破资本主义“国强必霸”的政治话语陷阱，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

四、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实践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对党百余年来民族工作发展历程特别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要“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4]。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为强化叙事传播能力提供了经验参考。

(一) 整理编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书稿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47]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由中国各民族在世代休戚与共的奋力拼搏中共同书写, 现实中国亦是从历史中国中不断发展而来的。“大一统”历史观告诉我们, 中华民族和中国始终处于连续不断地发展整合之中。只有坚持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统一性与时代性, 才能更好地认识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国疆域、共同建设中华大地的历史^[48]。《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以下简称“三交”史)整理编撰工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是党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 是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三交”史编撰工作坚守中华民族共同体立场,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着重运用丰富史料阐释中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基于完整历史发展脉络和清晰史书文献记载, “三交”史生动还原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阶段转为自觉阶段的演进历程, 夯实中华民族“四个共同”的历史根基。与其他文史资料相比, “三交”史具有鲜明的话语特色和时代意义。一是紧扣“中华民族”叙事主题, 从中华民族的生成和发展角度看待历史轴线。二是跳出王朝更迭视角, 从文明演进视角构建中华民族新的历史叙述范式。三是立足中国各族互构史实, 书写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历史过程。“三交”史有力回击了“新清史观”“内亚史观”“族群史观”等试图解构中国历史的舶来史观, 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的重要依据。

(二)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在民族领域坚持“两个结合”的创新成果, 是构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 经历了一个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理论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49]。从信息传播角度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理论新颖性、政治重要性、任务艰巨性特征, 需要高度重视相关主题的宣传教育工作^[50]。推进宣传教育常态化, 是对“润物细无声”和“久久为功”民族工作理念的认真践行。该项工作广泛存在于党和国家政策宣传、学术研究话语传播、民族事务治理实践宣介等环节, 有助于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当前, 依据党中央相关工作部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主要聚焦连续教育体系设计、专业队伍建设和研究成果转化三个领域。一是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在中小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走入德育课堂, 通过“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计划”等活动开展中华民族历史观宣传, 帮助各族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率先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高校开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课程, 以师生同上一堂“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等形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理论化, 并逐渐向民委共建高校及其他院校推广。二是持续开展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建设。根据中央统战部等四部门印发的《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建设意见》文件精神, 截至2023年已遴选支持43项基地项目(含培育项目)。以基地建设为依托, 初步形成国家民委密切联系专家库, 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民族‘三交’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基础问题研究中产生一系列理论话语。三是稳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统编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工作。按照编年形式详细叙述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华夏共同体演进、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和中华民族新纪元等历史内容, 着重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文明新路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关键命题，充分发挥理论教材在青少年学习成长中的培根铸魂、启智增慧正向功能^[51]。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有助于更新人们的知识结构和经验常识，强化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

（三）搭建中华民族共同生活话语全媒体传播矩阵

对人文精神和共同体观念的追求，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52]。这种不懈追求，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各族群众围绕国家、民族、家庭等符号意象组织的交往话语，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富有“故事性”的生活话语能够消解因话语的高度抽象理性带来的理解困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更完善的意义表达机制和更宽广的内容增长空间^[53]。国家民委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建设集合知识观点传播、文明交流互鉴、国家形象塑造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力求以更为生动、多样的话语叙事风格讲好中华民族共同生活故事。一是推出“道中华”内外宣平台。该平台以微信公众号为主，先后在微信、抖音、快手等自媒体端口开设视频账号，与《中国民族报》等报刊形成联动传播体系，并在人民日报、新华网、光明网、Deep China 等海内外主流媒体平台创建专栏或账号。该传播矩阵的叙事内容更多采用生活话语，注重挖掘阐释中华文明的共同性要素，坚持学理化阐释、通俗化表达、大众化传播。截至 2023 年 12 月，“道中华”微信公众号已拥有用户粉丝 530 余万，发布原创内容 600 余篇，并同步进行外译推广工作，在国内外舆论宣传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力。二是探索在地性的生活化传播活动。“有形有感有效”的叙事原则可以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贴近实际，提升各族群众社会生活幸福感^[54]。如民族文化宫长期开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以文物为叙事载体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设置地方文化体验区，组织各省市区轮换宣介地方民族文化特色，拉近不同地域各族群众文化生活的空间距离。

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尚存在优化空间。一是不同叙事维度之间的连贯性有待强化。虽然，当前历史观、理论性和生活化三个叙事维度内容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但仍停留于各自组织本维度话语内容阶段，三者之间的叙事连贯性不足，限制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的整体传播能力。二是话语内容的目标靶向不够清晰。由于尚未形成连贯的叙事体系，各维度在话语组织和语料库构建时存在着目标靶向不明的问题，多数内容采用宣传性话语而缺少针对国内外舆论挑战的回应性和宣示性话语生产。三是全媒体矩阵的传播感染力不足。从传播内容来看，发布文稿多是依据文史资料撰写的陈述性话语，对非专业受众而言存在不可避免的认知挑战。这导致稿件阅读量长期在几千、几万到“10 万+”之间频繁波动。从传受关系来看，当前多以供给式传播为主，缺乏对各族群众日常文化生活需要和信息获取偏好的充分考虑，难以有效激发受众参与传播互动的积极性。从传播范围来看，各主题语料库虽已初步搭建成型，但主要集中于对国内宣传话语的收集储备。应对来自国际的恶意舆论攻击，还需增强信息抓取、识别和回应能力，提升我国在民族领域的国际舆论战斗力。

五、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优化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进入新时代，

在以“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为主要目标之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能力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党的民族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尊重各族群众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交往需要，科学研判国内外社会舆论形势和问题挑战，从“历史—现实”“概念—事实”“文化—文明”多个叙事维度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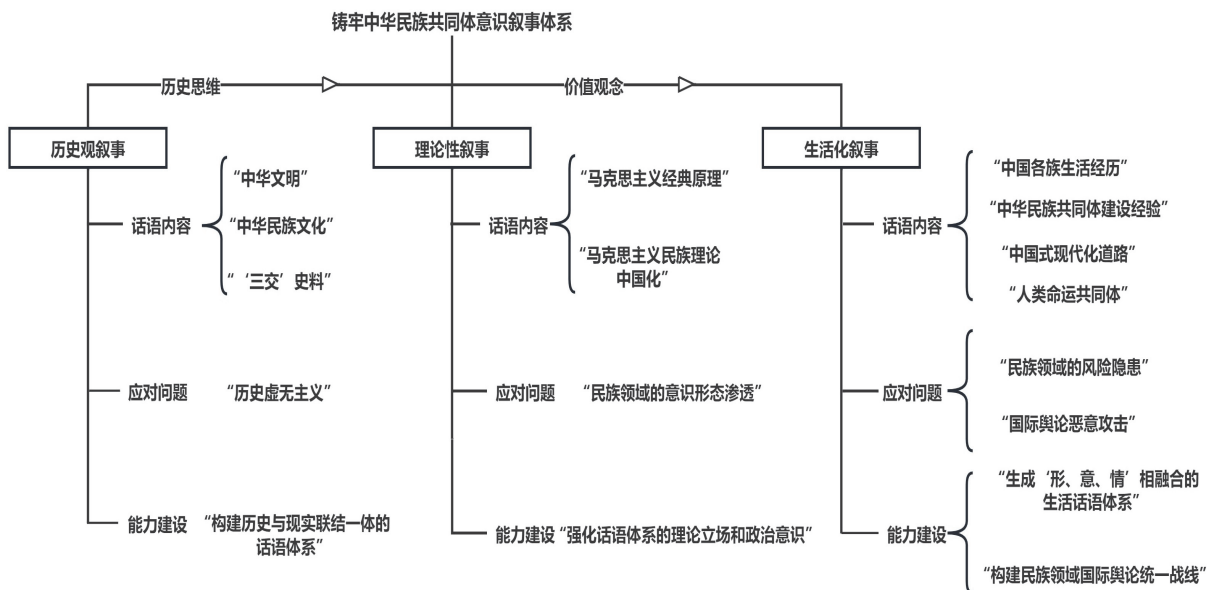


图1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框架

（一）构建历史与现实联结一体的话语体系

作为一种自在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只有客观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历史脉络及其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才能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性、包容性和时代性特征^[5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观叙事，可概括为“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文化”和“‘三交’史料”三个大类。

一是以“中华文明”为主题的话语内容，重在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整体性特征，从文明根性出发确证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作为世界上唯一同根同种同文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从未曾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独特的“大一统”理念^[56]。在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背景中进行话语创造，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一方面，要系统介绍中华文明的内涵与外延。这反映了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是中华民族文化血脉赓续的基点所在。另一方面，要着重阐释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也赋予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二是与“中华民族文化”相关的话语，意在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古今延续，侧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活态性和流变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族共同持有的文化记忆。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同能唤醒各族人民的集体文化认知，对共同文化生命的认可能生成对中华民族朴素的归属

感^[57]。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叙事话语，既要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 content 形式，也要在“两个结合”过程中不断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创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要顺应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充分汲取各民族文化中的营养，引导各民族将中华文化内化为共建、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58]。持续强化各族群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主体的责任意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中实现历史与现实的一体联结，进一步丰富内容传播的语料素材。

三是将“三交”史料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重要话语材料，关键是要聚焦中国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强调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共同性和共通性，理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历史逻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共同构成中国历史的三条主线，讲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59]。“三交”史料中蕴含的丰富历史文献资料，有助于动态呈现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提供文史例证，是当前做好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相关工作可将“三交”史料编撰作为重心，以中华文明赓续和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为叙事线索，有序推进相关史料和古籍的成系列出版发行，增强文史资料在各族群众现代生活中的可读性和可感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观叙事体系建设，主要是为了应对“历史虚无主义”问题，解构社会生活中各类错误的民族史观。这要求以史为鉴、以史为据，立足当下社会发展语境形成贯穿古今的话语内容，塑造各族群众自觉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思维，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

（二）强化话语体系的政治意识和理论立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相结合提出的重要概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政治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叙事应当坚持“两个结合”的要求，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主题推动理论话语的生成和发展。

其一，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体系建设的政治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治国方略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60]。这决定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体系建设，应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彰显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宣传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认识和解释中国社会现实，在民族工作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61]可见，政治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体系建设的话语核心，在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程中发挥着统一思想的作用。

其二，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2]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63]。从理论生成逻辑来看，人类总是在不断发问中革新自身社会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63]由生活经验向理论知识转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发展

的必然趋势，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要求。以问题为导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主要功能，正是以科学的理论回答各族群众日常生活问题，指导个体认识和改造社会世界的各类生产生活实践，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需要各类高等院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稳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一级学科建设，优化民族学科专业培养体系设置，为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研究工作提供人才支撑。研究基地和专家团队应进一步强化文化宣传服务意识，积极将理论成果转化为新闻媒体文章，主动参与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等思想铸魂工程，引导各族群众在价值观念和精神情趣上共同向现代化迈进。

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性叙事体系，主要是为应对民族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问题，推动党的民族工作实践经验向理论知识转化。当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对民族领域意识形态渗透最为有力的回击，能够以科学严谨的知识体系强化各族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三）提升话语体系的国内外舆论宣传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理解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设想，并以此为基础不断丰富、延展叙事体系的话语内容和传播方式。

一方面，准确认知“各族群众生活经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最具感染力的话语来源”，生成“形、意、情”相融合的生活话语体系。于生活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机制，包括各族群众的主观价值选择、情感投入和关系网络变化等多种要素，这意味着个人和群体生活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现实映照。以各族群众日常生活叙事为“书写”蓝本，逐层递进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验，可为深层次结成精神文化共同体积聚话语力量。强化意象叙事表达能力，主要是以真实生动的实物形象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意义，如运用长城、石榴籽、胡杨进行符号化表达。注重提炼各族群众共同生活成长故事，并结合时事热点做即时性传播，突显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验。例如，以“照见我们共同的命运”为主题讲述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事迹。关注各族群众日常生活中广泛流传的民间习俗，以家户文化实践为切入点阐述中华民族共有文化记忆。例如，以关羽等耳熟能详的古代人物形象，传播“雪域高原的关公庙”“为何晋商拜关公，徽商拜朱子”等说明性话语内容。丰富各族群众生活叙事表达形式，需要借助舞台艺术创作、影视创作、美术创作等方式，打造既可彰显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又能体现中华民族多彩生活的文化作品。如排演大型民族歌舞剧目、拍摄制作边疆题材专题纪录片、组织公益文化大讲堂，持续推动各类文艺精品走入各族群众日常生活。整体来看，对应具体叙事实践，应以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与价值持守为核心，借助话语修辞、符号塑造、场景再现等多种形式，依托实体空间、媒介空间和记忆空间展开真诚交流对话。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叙事与各族群众日常生活的个体叙事相融合，在话语交流中努力探寻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应然的价值张力，实现对人的社会性存在方式的积极确证^[57]。

另一方面，着重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的国际传播能力，构建国际舆论领域统

一战线。信息全球化时代，中西舆论斗争形势激烈且多变，西方国家及其媒体不断炒作我国民族议题，试图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64]。面对日渐严峻的民族领域外宣环境，中国亟须对来自外媒的恶意歪曲抹黑做出有力澄清和回击。这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模式逐渐由“宣示性叙事”向“斗争性叙事”拓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五个共同”等重要论断，形成历史脉络清晰、理论知识完备、话语内容丰富的叙事体系。我国已具备开展民族领域舆论宣传斗争的国际传播基础。我们应当更为主动地走进国际舆论领域，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数据抓取的精度和广度，及时明确外媒话语攻击主题并做出有效应对。要组建专业化民族外宣人才队伍，在稳定完成内宣叙事素材译介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对外宣传叙事材料的原创性制作。同时，有必要秉持平等互信的态度与海外媒体、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对话，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共识，争取更多海外受众由信息接受者转变为宣传者。站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新起点，中国需要放大己方在国际舆论领域的声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传播主题，讲述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生活风貌，传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成绩经验，寻求世界各国人民对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精神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化叙事体系拓展，是为了有效应对民族领域风险隐患和国际舆论恶意攻击，力求以生动的话语最大程度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的道义价值。这有利于引导各族群众在真诚普遍的互动交流中形成共情心理，将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内化己身，由此积淀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情感基础，并通过积极主动的国际传播唤起世界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共鸣。

六、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是党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其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历史与现实基础，提炼党在不同时期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工作经验为理论思想导向，关注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社会生活经历。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为研究基点发现，人的交往需要及相关实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并由此衍生出蕴含深刻历史性、理论性和生活性的话语体系。话语叙事是不同历史时期各族对所处共同生活境况的生动表达，是党团结各族群众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经验来源，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和文化意义。新时代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就是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贯通古今、连通中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结构，为各族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实践凝心聚力，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中发挥提神振气作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2022-10-26（1）.

高旸.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05-121.

- [2]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蔡奇主持 [N]. 人民日报, 2023-06-03 (1).
- [3]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出席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10-09 (1).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3-10-29 (1).
- [5] 龙金菊, 高鹏怀.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复线逻辑——基于政治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契合路径 [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 94-100.
- [6] 杨明洪. 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伦理线索 [J]. 社会科学研究, 2022 (6): 1-13.
- [7] 李艳.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全球新文明 [J]. 宁夏社会科学, 2022 (5): 20-26.
- [8] 方盛举, 杨睿哲. 和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J]. 理论与改革, 2023 (4): 39-51.
- [9] 李昊婧. 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特征及其启示 [J]. 重庆社会科学, 2023 (9): 68-79.
- [10] 朱碧波.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体系 [J]. 探索, 2022 (3): 73-83.
- [11] 张利国. 城市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建设的行动逻辑与耦合机制研究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2): 96-103.
- [12] 郝亚明. 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五大基础路径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20 (5): 1-6.
- [13] 范俊.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符号机制 [J]. 广西民族研究, 2021 (2): 10-16.
- [14] 张国启, 蔺叶坤. 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价值与路径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 48-56.
- [15] 方正. 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数字梗阻与风险防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93-107.
- [16] 杜添, 袁祖社. 关系主义视域中人的本质之“对象性—活动”逻辑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J]. 重庆社会科学, 2023 (4): 22-34.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146.
- [18] 李云峰. 人的主体身份存在、批判与建构 [J]. 求索, 2023 (1): 74-81.
- [19] 尤尔根·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 [M]. 刘北成, 曹卫东,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41.
- [20] 晏扩明, 李义天. 话语、交往与政治转向：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思想历程及其反思 [J]. 国外理论动态, 2021 (6): 42-50.
-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501.
- [22] 高永久, 杨龙文.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视域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内涵与逻辑依循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 13-21.
- [2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年6月2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24]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 [N]. 人民日报, 2023-06-04 (1).
- [25] 林华山, 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26-144.
- [26] 马伯忠. 由自在到自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理思考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 20-26.
- [27] 管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框架优化: 基于心理解释水平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3 (4): 30-39.
- [28]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李克强主持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N]. 光明日报, 2019-09-28 (1).
- [29] 张彦杰, 胡海波. 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 (3): 173-179.
- [30] 庞立生, 罗春阳. 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和新文明意蕴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3 (5): 172-182.
- [31] 冯月季. 文明互鉴与文化转码 [J]. 理论学刊, 2023 (4): 151-160.
- [32] 方辉.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连续性及其文化基因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8): 10-15.
- [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99.
- [34] 高永久, 冯辉. 从“一条主线”到“一线两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导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5): 1-12.
- [35]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36] 黄钰, 郎维伟.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就与经验研究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3 (5): 70-79.
- [37]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595.
- [38]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38.
- [39] 金刚, 哈正利. 以深化“两个结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J]. 理论学刊, 2022 (2): 5-14.
- [4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509.
- [4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1-11-17 (1).
- [42] 刘杰, 高旸. 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的新时代发展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 (3): 11-19.
- [43] Goldmann, Lucien. The Hidden God: A Study of Tragic Vision in the Pensées of Pascal and the Tragedies of Racine [M]. London: Routledge, 1964: 32.
- [44] 王晓葵. 事件的真实与记忆的表象 [J]. 探索与争鸣, 2022 (3): 94-96.
- [45] 左凤荣. 以文明交流与对话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J].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2023 (3): 40-48.
- [46]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65.
- [47] 中共中央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3-12-27 (1).

高旸.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05-121.

- [48] 王延中. 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 [J]. 历史研究, 2022 (3): 22-32.
- [49]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22: 44.
- [50] 郝亚明, 秦玉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内在需求、基本特性与实践方向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 58-66.
- [51] 许锋华, 闫领楠. 以统编教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价值意蕴、基本遵循与实践理路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3 (5): 33-39.
- [52] 潘岳.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J]. 中国民族, 2023 (5): 4-7.
- [53] 马晓军, 金炳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 26-33.
- [54] 夏旭彦, 徐志国. 新时代城市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赜 [J].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15-26.
- [55] 孔亨.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及其文化基因 [J].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版), 2022 (2): 85-92.
- [56] 潘岳. 中华文明要为建构人类共同价值提供重要支撑 [J].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1): 4-8.
- [57] 邹广文.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结构 [J]. 哲学研究, 2021 (11): 5-13.
- [58] 潘岳. 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N]. 人民日报, 2023-12-13 (9).
- [59] 孙妍. 统编历史教材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容教学指要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2 (3): 45-52.
- [60] 张京泽. 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几点认识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 5-11.
- [6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N]. 人民日报, 2023-10-16 (1).
-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289-290.
- [63]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年5月17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0.
- [64] 于运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新进路 [J]. 民族研究, 2022 (3): 33-49.

责任编辑: 龚静阳



国家建构视角下乌克兰的语言冲突：影响及镜鉴

何俊芳 朱国义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乌克兰作为一个真正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始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人口普查资料和一些社会调查数据均显示，乌克兰是一个俄语居民占较大比例、大部分居民讲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双语国家，且在语言使用上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在此背景下，独立后的乌克兰因实行乌克兰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政策，导致了激烈的语言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社会上就是否应赋予俄语第二官方语言地位存在严重对立，东南部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府为争取俄语的官方地位进行了持续抗争，在学校教育等领域因限制俄语使用以及围绕新语言法产生了冲突等。在语言冲突的影响方面，语言问题不仅导致了乌克兰民族关系的持续恶化，且长期实行的唯一官方语言政策及其相关规划对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建构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族际关系的恶化、国家认同的脆弱性，最终因2014年对新《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的废除，使争取语言权利的人失去了对乌克兰政府最后的信任，诱发了乌东地区的民族分离运动和国家分裂。乌克兰语言冲突的案例说明，在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中语言政策与规划问题是十分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乌克兰的案例对多民族国家如何把握好语言文化中“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妥善处理学校教育中学习民族语言的权利问题，高度重视语言的其他意涵和政治敏感性等问题提供了镜鉴。

关键词：国家建构；语言规划；语言冲突；民族关系；乌克兰；俄语；乌克兰语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1.009

作者简介：何俊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朱国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精品示范课程培育项目“民族社会学研究专题”课程建设（GRSCP202313）

引用格式：何俊芳，朱国义. 国家建构视角下乌克兰的语言冲突：影响及镜鉴[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1): 122-134.

中图分类号: D75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1-0122-13

一、问题的提出

乌克兰作为一个真正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始于 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历史上, 乌克兰与俄罗斯有着难解难分的同源关系, 并曾受到蒙古金帐汗国、立陶宛、波兰以及沙皇俄国的长期统治, 后东、西乌克兰相继加入苏联, 因此其形成历史极具复杂性且有着非连续性和政治文化上的非整合性、认同上的碎片化等特点。由于国家的多民族组成和分布状况、语言文化上的差异性、语言政策等因素, 数百年来语言问题一直都是乌克兰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独立建国后, 乌克兰政府不顾历史形成的语言使用状况, 在国家建构中坚持实行乌克兰语作为唯一国家官方语言的政策与规划, 让语言问题日趋尖锐化, 并成为导致族际关系恶化、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最重要因素。

目前, 国内关于乌克兰语言冲突的研究文献较少, 主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描述语言冲突状况的, 这些研究主要描述了语言冲突在乌克兰教育、媒体、图书出版等领域中的具体体现^[1-3]。第二类研究主要将乌克兰的语言状况、语言政策与语言冲突等问题相结合进行了探讨^[4-5]。第三类研究则更多地聚焦于乌克兰的语言政策法规^[6-9]、语言政治^[10]、语言地位^[11]等问题, 但在研究中对语言冲突问题少有提及。第四类研究探讨了乌克兰语言政策对民族团结的影响^[12], 但相关研究文献较少。另外, 其他一些文献对乌克兰国家建设或建构^[13-16]、国家认同^[17-18]、国家身份建构^[19]等问题做了研究。总体而言, 目前与乌克兰语言冲突问题相关的中文文献总量较少, 专题研究更为少见, 且在已有的研究中对乌克兰语言冲突的体现主要聚焦于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领域, 缺乏对社会层面及乌东地方政府的关注, 对语言冲突影响的讨论和国际比较分析也很缺乏。因此, 本文拟就乌克兰语言冲突的层面及其对民族团结关系、国家认同及国家统一的影响等进行专题探讨, 以便读者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到在多民族国家建构与治理中语言政策与规划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

二、乌克兰的民族组成与语言状况

谈及乌克兰的语言冲突, 必须探究其民族组成及分布格局、语言使用状况, 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乌克兰必须制定、实施符合该民族人口结构和语言状况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否则将对国内的族际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一) 民族组成与分布

乌克兰是一个由 130 多个族裔群体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其中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占绝大多数。据苏联 1989 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乌克兰总人口为 5 145.2 万人, 其中乌克兰族人占 72.7%, 俄罗斯族人占 22.1% (两族合计占 94.8%), 其余人口为白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等^[20]。乌克兰独立后于 2001 年进行的唯一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乌克兰的总人口为 4 845.7 万, 乌克兰族人的比例上升至 77.8%, 俄罗斯族人的比例为 17.3%^[21]。另据乌克兰统计和指数网站的细化分析所示, 乌克兰族人占 62%, 俄乌混血人口占四分之一, 俄罗斯族人占 10%^[22]。至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前的 2013 年, 乌克兰的总人口为 4 537 万人^[23]。在人口分布上, 乌克兰族人的主要聚居区在西部, 而俄罗斯

族人历来主要分布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克里米亚等地区。

(二) 语言使用状况

语言使用方面，1989 年在乌克兰熟练掌握乌克兰语和俄语的人数基本相同，分别占全体居民总数的 78%和 78.4%，其中以这两种语言为母语的人口分别占 64.7%和 32.8%^[20]¹⁴。2001 年，占全国人口总数 67.5%和 29.6%的居民分别认为自己的母语为乌克兰语和俄语。可见，以俄语为母语的人口占到将近三分之一。另外，如果算上把乌、俄两种语言作为熟练掌握的第二语言的人口比例，乌克兰的乌俄双语格局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据乌克兰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02 年的调查资料显示，有近三分之二的乌克兰居民在日常交际中使用俄语（65.7%的乌克兰居民认为自己熟练地掌握俄语），其中 34.5%的人主要使用俄语，另有 26.8%的人根据情境使用俄语或乌克兰语^[24]。乌克兰四大社会学研究中心 2017 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乌克兰全国共有 50.5%的居民在家中主要使用乌克兰语，24%的人主要使用俄语，24%的人使用乌克兰语和俄语双语。可见，即使如今乌克兰居民在语言使用最核心的领域家庭生活中使用俄语和俄乌双语的人口仍占到将近一半（统计资料不包括克里米亚、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一定程度上拉低了这一比例）。从总体上讲，乌克兰仍是一个国民普遍使用乌克兰语—俄语的双语国家。

当然，这种双语状况也存在着不平衡性和地域差异。根据 Research&Branding Group 公司进行的语言项目调查显示，68%的乌克兰公民熟练掌握俄语。在东部和南部地区，俄语的使用更为广泛（92%的公民使用俄语）。相较于乌克兰语，这些地区的居民更习惯于使用俄语^[25]。这一结论与表 1 中 2001 年人口普查资料的数据基本一致。

表 1 2001 年乌克兰一些区域把乌克兰语和俄语称作母语的人口比例（单位：%）

区域	以乌克兰语为母语的人口比例	以俄语为母语的人口比例	俄罗斯族人所占比例
基辅市	72.1	25.3	13.1
顿涅茨克州	24.1	74.9	38.2
扎波罗热州	50.2	48.2	24.7
卢甘斯克州	30.0	68.8	39.0
敖德萨州	46.3	41.9	20.7
哈尔科夫州	53.8	44.3	25.6
赫尔松州	73.2	24.9	14.1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	10.1	77.0	58.3
塞瓦斯托波尔市	6.8	90.6	71.6

资料来源：Итогипереписи 2001 годанаУкраине. <https://www.demoscope.ru/weekly/2003/0113/analit03.php>.

从表 1 可见，不同区域俄罗斯族人的比例及把俄语认作母语的人口比例是不同的，以上所列区域除基辅市、赫尔松州外，其余区域的俄语母语人口均超过 40%。以克里米亚地区为例，77%的居民（其中 59.5%是乌克兰族人）将俄语视为母语，11.4%的人将克里米亚鞑靼语看作母语，还有 10.1%

的人则认为其母语是乌克兰语。尽管该项人口普查距今已有 20 余年, 但俄语在乌克兰东部及南部地区居民的日常使用中仍占有显著优势。

三、乌克兰语言冲突的表现

从国际上一些语言冲突案例的研究结论看, 最常见的语言冲突发生在不同民族之间, 大多是由语言的地位规划或者对语言功能的重新分配引起的^[26]。乌克兰的语言冲突也主要是围绕着对俄语地位的重新规划及其功能分配产生的。

(一) 围绕俄语地位问题的冲突

众所周知, 在沙俄及苏联时期俄语一直都是当时乌克兰地区的官方语言。1989 年 10 月, 乌克兰颁布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 正式将乌克兰语定为本国的唯一国语, 同时规定“俄语是乌克兰的族际交际语”; 1996 年, 新颁布的《乌克兰宪法》则规定“俄语是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俄语地位上的这种巨大落差, 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乌克兰俄罗斯族人及其他俄语居民的强烈不满, 因为“语言的地位对于一个族体在民族国家现行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 在民族国家的权力体系所制订的价值分配方案中所占的份额, 以及对该族传统文化的普及与弘扬, 都有着显而易见的相关性”^[27]。因此, 自乌克兰独立以来, 各方围绕俄语的地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 大众层面关于是否应赋予俄语第二官方语言地位的争论

就民众层面而言, 各族居民对把乌克兰语确定为国语并无异议, 但那些生活在南部、中东部特别是城市的居民,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讲俄语的习惯以及对俄罗斯语言文化的认同感, 希望能够同时赋予俄语第二国语的地位。另外, 一些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仍希望与俄罗斯继续保持联系的社会政治力量强烈建议推行双官方语言制度, 并认为实施单一的官方语言制度随时有可能给乌克兰的族际和谐带来巨大的破坏。与此同时, 苏联解体后, 在乌克兰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俄罗斯、反俄罗斯族人的民族主义力量, 俄语自然成为民族主义分子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例如, 民族激进分子特别是立沃夫的民族激进主义者公开将“俄语居民”视为俄罗斯帝国对全体非俄罗斯族人文化、民族以及语言独特性殖民统治的“可耻残余”。此外, 在捍卫乌克兰语的旗帜下, 各种媒体、政治、教育、创作、宗教等组织也进行着反对俄语的斗争, 且总把乌克兰语同俄语对立起来, 把俄语的使用看成阻碍国语发展的“最重要威胁”。

在关于是否应赋予俄语官方地位的问题上, 乌克兰在独立后一直存在着长期的激烈争论以及两种完全对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和观点。支持在乌克兰实行乌克兰语、俄语双官方语言政策的人认为^[28-29]: 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也是缔造国家的民族之一, 且在很多州俄语居民占多数并多以俄语为母语, 因此国家应维护这些人的母语权利; 一些国家的经验说明, 民族和解的获得要考虑少数民族的语言利益, 其途径就是使用第二国语; 掌握双语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而俄语和其他的世界性语言一样是获取世界信息的语言, 这比推广乌克兰语-英语双语在财政上更划算; 与俄罗斯在多方面有紧密联系的乌克兰文化同样需要双语。但反对赋予俄语官方地位、实行唯一国语政策的支持者认为^[30]: 实行唯一国语政策有助于维护国家统一, 而赋予俄语官方地位则会给国家东、西部地区带来分裂的隐患; 乌克兰语相较于俄语实力单薄、竞争力较弱, 因此不能实行双国语政策; 乌克兰官方层面只应

使用乌克兰语，不懂国语者要学会它，而在日常生活中对使用自己的语言没有明令禁止。

尽管不同的研究机构就是否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的调查存在一定差异，但多数调查的结论是乌克兰国民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赞成赋予俄语这一地位。如在 Research&Branding Group 所做的社会调查中，认为国语只能是乌克兰语的人占被调查者的 45%，倾向于乌克兰语和俄语同为国语的人占到 52%^[31]。2009 年“乌克兰社会舆论基金会”进行的社会调查表明，55%的被调查者赞成赋予俄语第二国语的地位^[4]。另外由学者尤科·西姆爱基就乌克兰地区党关于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问题进行的调查显示，总体上超过一半（55%）的乌克兰公民赞成赋予俄语第二国语的地位，39%的人表示反对；另外，赞成/反对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的人口比例在西部、中部、南部、东部分别是 18%/76%、41%/50%、70%/20%、84%/12%^[32]。但由“民主前景”基金会同期进行的调查显示，30.3%左右的公民认为乌克兰必须实行乌-俄双语制，与此同时接近 60.9%的受调查者赞同乌克兰语应为唯一国语，但其中 41.9%的受调查者支持乌克兰语必须是唯一国语，俄语自由使用；19%的受调查者支持乌克兰语作为唯一国语。而在俄语区的公民认为，俄语应为官方语言^[4]。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机构在进行社会调查时使用的方法有所区别，设置的问题不完全相同，因此调查结果也不尽相同。

2. 地方政府争取俄语官方地位的斗争

在乌克兰，除一些俄语居民或社会组织对唯一官方语言政策表示不满和抗议外，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对该政策不满，并尝试对其进行修正。如 1992 年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俄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和乌克兰语三种语言同为国语。后因乌克兰的相关法律将乌克兰语定为其境内的唯一国语，俄语与克里米亚鞑靼语因此失去了在克里米亚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1998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在宪法中又将俄语认定为本地地区的族际交际语并宣布在某些领域可同国语并行使用，但迫于乌克兰中央政府对全国大部分行政活动中强制使用乌克兰语的要求，俄语难以在官方领域中得到使用。2006 年，克里米亚议会决定拟就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进行地方公投，同时请求中央政府就该问题进行全民公投，但未果。之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政府也不断在为赋予俄语正式官方语言的地位而努力。

再如，1997 年 9 月 19 日，卢甘斯克市议会宣布了公文处理中使用俄语的相关决议，认为这符合宪法关于“在乌克兰保障自由发展、使用和捍卫俄语”（第 10 章第 3 条）的内容；同时还认为该决议符合语言法第 3 章的相关内容，如“在其他民族公民占大多数地方的国家和社会机构的工作中，可以同乌克兰语一起使用他们的民族语言”的条款。但卢甘斯克市的检察院认定该决议是非法的，因此 1998 年 2 月这一决议被迫撤消了。1999 年，卢甘斯克市议会再次尝试赋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并于 2001 年 9 月通过了“关于在卢甘斯克市议会及其执行机构的工作中使用俄语的规定”。该规定指出，通过对卢甘斯克州和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地理特殊性的分析，考虑到政党、社会组织和运动的请求，以乌克兰宪法第 10 章、语言法第 3 章和第 11 章，以及乌克兰“关于地方自治法”第 26 章第 50 条中的规定为依据，考虑到俄语居民的数量，市议会决定“卢甘斯克市议会及其执行机构在工作中及在提供正式说明时，同时使用乌克兰语和俄语”。2002 年 11 月，卢甘斯克州议会在其第 5 次会议中通过了拟向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提交赋予俄语官方地位的请求书，并在其中还警告称，对俄语问题的沉默将会引发明显的消极后果——社会对政府的疏远及语言问题政治化^[33]。

另外，还有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顿涅茨克等地的市议会也多次进行了如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

卢甘斯克市一样的争取赋予俄语官方地位的尝试, 但均以失败告终。2001年12月, 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克夫和赫尔松等城市的议会代表在以“地方自治和俄语的地位问题”为主题的全乌克兰科学实践会议上, 提出同国语一起使用俄语进行全民公决的问题。2002年9月,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相关行政机构在乌克兰全境发起了对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问题进行全民投票的倡议。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最高拉达表示支持, 并向乌克兰议会提出了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的建议。2007年, 敖德萨市议会举办了敖德萨市管辖范围内关于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的会议, 并以82:6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 但最终也被检察院否决^{[33] 142}。之后, 上述各地政府就赋予俄语正式官方语言地位的问题又进行了多次尝试, 但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二) 围绕俄语使用及新语言法产生的冲突

1. 围绕俄语使用方面产生的冲突

自独立以来, 乌克兰政府一直试图重建乌克兰语环境。乌克兰第二任总统列奥尼德·库奇马说: “乌克兰是一个在许多方面被迫重建自己的国家。国语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在乌克兰它自然是乌克兰语。”^[34] 乌克兰政府主要实施将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转向乌克兰语教学的长期计划, 并采取措施将媒体广播转换成乌克兰语。客观地讲, 在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个十年, 乌克兰去俄罗斯化的进程虽然逐渐加快, 但并不是特别迅速和激进。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许多限制俄语在乌克兰使用的相关法令陆续出台, 其中学校教育受到的限制最为严重, 因此在该领域产生的冲突也较为激烈。学校是语言推广或保持的最佳场所, 一种语言是否应用于学校教育, 应用的程度如何, 不仅是国家语言政策的体现, 也是该语言现实价值及应用价值的体现。为此, 乌克兰领导人充分意识到, 年轻一代的教育是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进行的, 他们的目标是将俄语从教育空间中驱逐出去, 并使年轻一代的公民“乌克兰化”。

学校领域的“乌克兰化”主要表现在大力缩减俄语学校和俄语学生比例, 使学校教育普遍使用国语教学。相关资料也表明, 乌克兰俄语学校的急剧减少主要是从2000年开始的。根据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的数据, 2000年初在乌克兰共计有5000所俄语学校, 7月份时俄语学校的数量已减少到了2399所^{[33] 112}。另一统计口径的数据显示, 乌克兰的俄语学校从1999年的4633所急剧缩减, 到2007年已不到1000所, 首都基辅市仅剩6所俄语学校^[35]。另外, 在居住有较多俄罗斯族人的一些州, 俄语学校的数量与乌克兰教育科学部公布的民族组成的比例要求不符, 而在许多区域转变为学校的全面“乌克兰化”。如在基辅, 乌克兰教育科学部要求应有20%的俄语学校, 但实际上仅有4%; 在波尔塔瓦州应有10%的俄语学校, 实际则少于1%; 在基辅州应有9%的俄语学校, 实则为0。另外, 根据乌克兰俄语教师协会的统计, 由于受到乌克兰政府在教育方面推出中学毕业生只能使用乌克兰语参加大学入学考试、高校学生必须使用乌克兰语撰写毕业论文和答辩等规定, 导致高校使用俄语学习的学生比例大幅度减少^[35]。即使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 俄语学校的数量也急剧减少。

不断减少俄语学校的数量、禁止师范院校继续培养俄语教师以及将“乌克兰化”语言政策覆盖于各级各类学校等, 并将俄语、俄罗斯文学列入外语、外国文学课程等全面限制俄语使用的实践行为, 引起了俄罗斯族人的不满, 出现了一些抗议和请愿活动。一些组织、协会甚至上书欧盟人权事务委员会, 要求对乌克兰政府歧视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政策给予关注。如基辅的一些俄罗斯族人组

织在提供给欧盟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称，乌克兰教育科学部的政策不仅忽略了城市居民的民族组成，而且忽视了 40%讲俄语的基辅人的需要，并请求欧盟就此类问题给予乌克兰政府压力^[36]。

因俄语使用方面的语言冲突还反映在信息媒体、图书出版等领域，在此不一一赘述。正如一些政治家所言，同俄语的斗争政策不可避免地变成同使用它的人民本身的斗争。如原乌克兰议会言论与信息自由委员会主席、最高拉达副主席金钦卡曾指出：“乌克兰语应逐渐地、令人信服地但不是强制地进入东部。但最近由于各种形式的最后通牒使状况恶化……这产生了相反的效应：他们将分离并建立自己的语言制度。”^{[36] 156}

2. 围绕新语言法产生的冲突

2010 年亚努科维奇上台后，在对待俄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上采取了相对平衡的策略，并在其推动下于 2012 年 8 月 8 日正式签署了由议会通过的乌克兰《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这标志着自 1989 年后一部新的语言法诞生。在《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中，除再次确定乌克兰语为本国的唯一国语外，还确定了俄语、白俄罗斯语、保加利亚语等 18 种语言为乌克兰的区域语言或少数人语言。根据本法规定，符合相关条件的区域语言或少数人语言，在乌克兰相应区域内可使用于国家权力机关的地方机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机构、地方自治机构的工作中，可在国家和公共教学机构中运用和学习，还可使用于由本法确定的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可见，本语言法的颁布意味着一些乌克兰的区域能够正式实行多官方语言制度，区域语言可同国语乌克兰语平等地使用于许多领域。但在该语言法审议的过程中及通过后，围绕本法的激烈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过，其实质问题依然是俄语在乌克兰的地位问题。如该语言法在议会的“一读”（2012 年 6 月 5 日）、“二读”（2012 年 7 月 3 日）通过后，均发生了由一些社会组织和反对党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尤其是 2012 年 7 月 3 日议会通过《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后，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出现了较多的抗议游行。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的通过虽满足了大多数俄语居民的语言诉求，却引起了长期以来想把俄语定为乌克兰全国“第二国语”的俄语民族主义者以及想置乌克兰的语言状况实际而不顾、忽视俄语应有地位的乌克兰语民族主义者们的不满。

总体来看，《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是一部以人权、尊重和宽容为基础制定的语言法规。该法在乌克兰语和俄语之间采取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策略，一方面使乌克兰语处于政治、法律上的高位，另一方面也使俄语等语言获得了一定的官方地位，使两种语言的绝大部分使用者在心理上和语言实践中都获得了某种平衡^[8]。但 2014 年 2 月，乌克兰发生政权更迭后，该法律被立即废除。这导致该法律已赋予的俄语区域官方语言地位被剥夺，标志着俄语失去了在乌克兰东部及南部 13 个州中已拥有的官方语言地位，冲突随之再起，且演变为更严重的流血冲突。

四、乌克兰语言冲突的影响

语言冲突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其积极的影响有具备社会安全阀、促进新的语言制度产生、有利于多语言文化的保持和发展等，而消极的影响有损失社会资源、破坏社会秩序、伤害民族关系等^[26]。乌克兰语言冲突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国家建构方面，具体表现为对民族团结关系、国家认同建构和国家统一的不利影响。

(一) 对民族团结关系的影响

通常来说, 语言冲突发生后一些国家会采取让对立双方协商或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最后往往能达成让对立双方中的多数人满意的结果。但在一些国家, 冲突的双方往往难以达成共识, 要么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要求置之不理, 要么其中一方的“欲壑难填”, 把语言作为其达到政治、经济或其他目的的工具或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冲突难以得到真正解决, 民族关系也会因此受到严重损害, 有时还会造成严重的民族对立与隔阂^[26]。乌克兰的语言冲突就属于严重伤害民族团结关系的典型案例。

自独立以来, 乌克兰便以“乌克兰化是恢复正义”为名实施主体民族语言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政策, 以期在国内尽快地、全方位地重建乌克兰语环境。诚然, 数百年来在乌克兰隶属沙俄帝国及苏联时期(除本土化时期外), 乌克兰语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全方位充分发展。因此, 1991年独立后, 乌克兰在语言文化上实行一定程度的“乌克兰化”是必要的。但乌克兰的民族构成、语言状况, 在东部、南部几百年来形成的语言使用习惯和语言文化认同, 决定了乌克兰实行唯一国语政策的巨大挑战性。现实情况是, 因乌克兰政府坚持实行唯一国语政策、长期无视俄语居民把俄语定为第二官方语言的强烈要求, 导致以俄罗斯族人为主的俄语居民与部分乌克兰族人、乌克兰政府间在语言问题特别是俄语地位问题上的持续冲突。

2012年8月, 随着乌克兰《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的颁布, 因该法律对俄语“区域语言”地位的承认满足了大多数俄语居民的语言诉求, 使得乌克兰因俄语地位问题产生的不和谐族际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但仅一年多后, 亚卢科维奇政府被推翻, 新政府立即废除了《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 使东部地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 在顿巴斯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语言问题是导致这次抗议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后来演变成乌克兰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基辅政权和顿巴斯地区民兵间的血腥武装冲突。西方一些学者认为, 民族语言问题是导致当代乌克兰民族关系恶化、政治分裂、分离主义和社会不稳定进程加剧的根源^[37-38]。乌克兰驻顿巴斯局势落实明斯克协议三方联络小组代表团副团长维托尔德·福金曾指出, 唯一国语政策是一个错误。他在接受“乌克兰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 顿巴斯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问题引起的, 而且中央政府在这方面辜负了人们的期望^[39]。

在多民族多语言国家, 不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自然形成的官方语言, 其社会功能的增强、语言声望和威信的建立, 以及人们语言使用习惯的转变等, 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 均需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才能实现, 因此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制推行, 更不能用损害其他语言利益的办法来实现, 这将导致族际冲突, 民族团结遭到破坏。历史上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案例也都说明了这一点^[40]。

(二) 对国家认同建构的影响

国家认同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 这里主要强调个体对国家的心理归属感和感情依附。因为国家认同涉及个体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因此在权力来自于人民的现代国家, 国家认同也关系到国家建设本身, 影响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41]。而在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中, 其实行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是否符合国情、是否具有包容性则直接影响着讲非主体民族语言者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由于乌克兰形成历史的非连续性及碎片化,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仅有30余年, 因此其国家

认同不仅存在断裂和缺失，而且具有脆弱性，特别是乌东部、南部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更是十分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应竭尽所能维护已有的国家认同，并在各方面包括语言政策与规划方面采取建设性的措施，以巩固和加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正如乌克兰历史学家托洛奇科所说：“我们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乌克兰。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西部乌克兰、东正教的东中部乌克兰、穆斯林的乌克兰（尽管不大但也存在）以及由人为并入乌克兰的地区组成的俄罗斯乌克兰（顿巴斯、克里米亚、新俄罗斯）……这些人不是生活在我们的领土上，而是生活在成了乌克兰一部分的自古以来就是其自己的土地上。所以，要寻找共同语言，克服上述分裂线……要赋予这些人愿意说的语言以地区语言地位。”^[42]

事实上，在不少多民族国家，如在除法国外的所有欧盟国家，承认少数人语言的区域地位是普遍采用的原则。长期以来，瑞士、比利时、芬兰、新加坡等国家均实行多官方语言制度，讲不同语言的群体对国家有着高度的认同。苏联解体后在国内实行双官方语言制度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虽然发生过政治动荡，但族际关系和谐，国民的国家认同度也很高。因此，应该认识到决定一个国家凝聚力和认同的因素有很多，如国家的形成历史、经济活力等，对少数民族尊严和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然而，乌克兰长期以来坚持实行乌克兰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政策，无视乌克兰东部及南部地区人民对赋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的强烈诉求，以及强行限制俄语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的使用等，严重伤害了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人民的感情，导致其对乌克兰国家的不认同及分离主义情绪增长。总体上讲，乌克兰长期实行的乌克兰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政策及其相关规划十分不利于国家认同的建构。

（三）对国家统一的影响

对在乌克兰实行唯一官方语言制度的一种认识是，双官方语言不利于国家统一，会加剧国家东西部地区分裂的威胁。这种担忧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基于语言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存在“国家的统一被认为是一致性和相同性的同义词”的观点^[43]。也就是说，国家的统一不仅指领土的统一，还包括国家语言文化上的统一。在乌克兰的政治精英中，具有上述类似认识的人占主导地位，即认为只有乌克兰社会达到了某种语言文化的一致性才能成为现代国家，并认为乌克兰不应是两个或多个民族的国家，而是建立在乌克兰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国家^[13]。乌克兰的政治精英把这种政治追求作为长远目标是可以理解的，但应在其语言文化统一性的建构中考虑民族组成状况、语言文化上的“二元性”特征，对这一追求不应急于求成，也不应对俄语居民的诉求采取漠视甚至歧视的政策，如果因此影响到国家统一，无疑得不偿失。

事实上，乌克兰独立后一直把俄语及其文化视为乌克兰的“包袱”，以及建构乌克兰同质社会的障碍，因此不断加速“去俄罗斯化”。长期的语言冲突导致的族际关系恶化，最终因 2014 年对《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的废除，让那些争取语言权利的人彻底失望，从而失去了对乌克兰政府最后的信任。这些因素最终导致试图效仿克里米亚独立的顿巴斯地区的分离运动和两个共和国的诞生。之后，乌克兰于 2019 年 7 月颁布了《关于确保乌克兰语发挥国语作用法》，进一步强化了乌克兰语在各领域的全面使用，俄语最终失去了区域官方语言的地位。这一法律显然与 2014 年联合国安理会关

于实施明斯克协议的 2202 号决议要求背道而驰, 该决议要求保证顿巴斯地区居民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2021 年, 乌克兰政府又通过了《乌克兰原住民权利法案》。上述法律进一步侵害了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和民族平等权利, 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关系。

总之, 克里米亚的脱乌入俄以及乌东地区的冲突和分离运动, 虽然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 但俄语的地位规划问题及强行限制俄语使用的规定则是最清楚和确定的因素之一。乌克兰之所以分裂,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制定者们未能认识到, 语言既可以是促成国家统一的因素, 也可以是导致国家分裂的重要力量。

五、余论

上文在对乌克兰的语言使用状况、语言冲突的主要表现进行描述和分析基础上, 进一步就语言冲突对民族团结、国家认同及国家统一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 乌克兰在其国家建构与治理中, 语言秩序建设方面体现出了“非有效性”甚至“失败”的特征, 后果是语言问题成为导致其民族团结关系遭到破坏、国家分裂的最重要因素。乌克兰在其语言秩序建设过程中的教训是深刻的。乌克兰的案例对多民族国家如何把握好语言文化上“一体”与“多元”的关系、语言学习和使用上的权利等问题提供了镜鉴。

（一）把握好语言文化中“一体”与“多元”的关系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正确处理“一体”与“多元”间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处理好“一体”与“多元”的关系, 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事项。2021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 即“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 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44]。其目的就是要在承认各民族自身特性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地夯实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根基^[45]。我国的语言关系处理需要吸取乌克兰、印度等发生过语言冲突国家的教训, 在不断加强“一体”的同时, 也必须看到“多元”的客观性和长期性, 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和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诚如有研究指出的: “既要清醒地认识到推行国家通用语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同时在制度和政策上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母语的存在和使用空间, 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精英对于母语的深厚情感, 这是各国政府和教育部门必须慎重斟酌、仔细拿捏的敏感议题。”^[46]因此, 中国政府历来十分注意处理好我国语言政策中“一体”与“多元”的关系问题,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妥善处理学校教育中学习民族语言的权利问题

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涉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及其学习、使用和发展权利等问题。在其所涉及的各项领域中, 除了语言的地位规划问题, 由于学校教育是学习、保存和发展语言最重要的场所, 这一领域的语言权利问题最为敏感。如在乌克兰的语言冲突中, 除了俄语的地位问题, 学校教育中的语言冲突是最明显的。人们在讨论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权利时, 主要关注两项基本权利: 一是以“优势语言”（一般是国家通用语言）接受教育, 这是为了使少数民族成员能够“广泛地参与到社会当中”, 实现就业和个人发展; 二是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权利, 其目的是“延续本族的语言社区与文化”^[46]。一般情况下, 学习“优势语言”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 而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权

利却常常遭到忽视或歧视，往往导致少数民族成员的不满或冲突。因此，国家在制定语言教育政策与规划时，要重视少数民族成员学习本族语言的权利，赋予民族语言发展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和空间。在民族母语的学习问题上，应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族语言的选择权，使各族民众感到民族母语受到尊重，学习母语的权利有保障。只有这样，各民族才不易因语言权利问题引发冲突。

（三）高度重视语言的其他意涵和政治敏感性

语言是保障社会交流的工具，是文化的载体，还是标示民族存在和认同的主要依据。另外，语言作为文化群体的重要特征，总是在社会竞争中被形塑为“权利斗争”的工具。“从我们对众多国家语言冲突事件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或明或暗，语言问题其实一直都是一道政治议题，很多民族对自身语言官方地位的追求，其实质要表达的是一种围绕权力、地位、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诉求。”^{[1] 305}可见，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和文化的载体，还被赋予了其他意涵，特别是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涵，关涉身份认同、权利、地位和尊严等其他非语言文化利益。在多民族国家，其语言政策与规划是十分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族际矛盾和冲突，而恰当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是保证多民族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

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对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从国家层面要求本国公民除本民族语言外还要懂得国家通用语言，这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不仅有助于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也有利于形成牢固的国家认同和铸牢国族意识。没有国家通用语言，本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就缺乏共同文化的基础。文化认同是国家政治认同的基础，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统一的市场环境与行政体系的完善，也要求普及作为族际交际语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急于求成。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过程中，应加强政策的宣传解释。要详细阐明推广通用语对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积极意义，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并不是要剥夺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而是要使各族民众感受到本族语言受到尊重，学习、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的权利有保障。

参考文献：

- [1] 何俊芳，周庆生. 语言冲突研究 [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28-58.
- [2] 彭佩兰. 冲突视域下的当代乌克兰语言政策研究 [D]. 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22.
- [3] 梅颖，赵蓉晖. 乌克兰语言冲突升温 [R].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4：321-328.
- [4] 李发元，李莉. 乌克兰语言政策与语言问题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105.
- [5] 何俊芳. 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政策问题的探讨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7：131-143.
- [6] 邢鹏涛. 基于语言法律的当代乌克兰语言冲突研究 [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23.
- [7] 候昌丽. 乌克兰语言政策探析 [J]. 民族论坛，2012（3）：65-68.
- [8] 何俊芳. 乌克兰《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及实施意义 [J]. 民族论坛，2013（3）：10-15.
- [9] 罗冬梅. “颜色革命”背景下乌克兰的语言政策 [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22.
- [10] 戴曼纯. 乌克兰语言政治与乌克兰化 [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2）：26-35.
- [11] 张宏莉，张玉艳. 乌克兰俄语地位问题探析 [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1）：25-31.

何俊芳, 朱国义. 国家建构视角下乌克兰的语言冲突: 影响及镜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22-134.

- [12] 李发元. 论国家层面语言政策制定对国内民族团结和睦的影响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9): 56-62.
- [13] 刘显忠. 历史与认同碎片化: 乌克兰国家建设的困境与镜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147-157.
- [14] 文龙杰. 政治国家有效性缺失: 乌克兰国家建设的教训与镜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3): 155-171.
- [15] 苟利武. 乌克兰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建构研究 (1991—2021)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16] 常士闯, 郭小虎. 后发多民族国家建构如何避免国家失败: 以乌克兰为例 [J]. 理论探讨, 2016 (3): 5-11.
- [17] 张艳波. 当代乌克兰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18] 张弘. 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 乌克兰的案例研究 [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0 (6): 1-9+95.
- [19] 左岫仙. 乌克兰国家身份建构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评析 [J]. 世界民族, 2022 (6): 100-113.
- [20] Гос. ком. СССР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Информ. -изд. Центр [М]. -М.: Финансы статистика. 1991: 12.
- [21]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анные Всеукраинск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2001 г [ЕВ/ОЛ]. (2003-06-12) [2023-10-15]. https://dic.academic.ru/dic.nsf/ruwiki/284635#cite_note-1.
- [22] Население Украины. Статистика и показатели [ЕВ/ОЛ]. (2014-02-25) [2023-10-10]. <https://rosinfostat.ru/naselenie-ukrainy/>.
- [23] Факты о населении Украины [ЕВ/ОЛ]. (2022-01-30) [2023-10-10]. https://countrymeters.info/ru/Ukraine#population_2022.
- [24] Богуслав В, Сухой Я. Правонародное словоещеразповопросу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стиприсвоениярусскомуязыкустатуса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J]. Зеркало недели, 2006 (6).
- [25] Хмелько В.Е. Лингво-етнічна структура України. //Вопросы статус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Украине [ЕВ/ОЛ]. (2010-11-20) [2023-10-18]. <https://dic.academic.ru/dic.nsf/ruwiki/852029>.
- [26] 何俊芳. 论语言冲突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 140-144.
- [27] 宁骚. 民族与国家: 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06.
- [28] Богучаев О. Комумешает два языка [ЕВ/ОЛ]. (2004-12-01) [2019-06-18]. <https://www.nopressa.ru>.
- [29] Назарев Е. В Крыму защищают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ЕВ/ОЛ]. (2008-10-16) [2019-06-18]. <https://www.svobodanews.ru>.
- [30] Le Temps. Что значит Украина сегодня [ЕВ/ОЛ]. (2004-12-01) [2018-05-26]. <https://www.nopressa.ru>.
- [31] Bilaniuk, S. Melnyk. A Tense and Shifting Balance: Bilingualism and Education in Ukraine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008 (11): 340-372.
- [32] Юко Симэк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Украине: анализ факторо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отношения к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дву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страница [ЕВ/ОЛ]. (2010-11-19) [2023-09-28]. https://srch.slav.hokudai.ac.jp/publicn/slavic_eurasia_papers/no3/02_Shimeki.pdfz.
- [33] Фомина И.И. Языковой вопрос в Украине: идеология, право, политика [М]. Луганск: СНУ им. Даля. 2003: 141.
- [34] Кучма Л. Украина-не Россия [М]. Москва: Время. 2003: 267.
- [35] Лебедева Наталья. Как Остановить Вытесн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Украине? [N/ОЛ]. (2007-06-26) [2020-09-28].

<http://www.rg.ru/2007/06/26/ukraina.html>.

- [36] Фомина А.И. Языковой вопрос в Украине: идеология, право, политика [М]. Второе издани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Киев: Журнал «Радуга». 2006: 152.
- [37] KULYK V. Language identity,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cleavages: evidence from Ukraine [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11 (3): 627-648.
- [38] Medvedev NP, Slizovskiy DE, Glebov VA, Medvedev VN, Amini AR. Ethno-Language Issue as a Source of Separatism and Instability in Ukraine [J].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 2019 (5): 111.
- [39] Анна Кузнецова. Фокин напомнил с чего началась война на Донбассе и назвал это главной ошиб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ЕБ/ОЛ]. (2022-09-20) [2023-01-13]. <https://newsua.ru/news/32337-fokin-napomnil-s-chego-nachalas-vojna-na-donbasse-i-nazval-eto-glavnoj-oshibkoj-gosudarstva>.
- [40] 何俊芳. 国外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与民族关系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4): 11-15.
- [41] 林尚立. 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8): 22-46.
- [42] Григорьянц В.Е., Жильцов С.С., Ишина А.В. Федерализация Украины: к единству через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 [М]. М: 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11: 225-226.
- [43] 科林·贝克汉. 双语与双语教育概论 [M]. 翁燕珩, 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408.
- [44]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45] 郝亚明, 杨文帅. 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关键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6): 5-13.
- [46] 菅志翔, 马戎. 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 [J]. 学术月刊, 2022 (9): 123-147.

责任编辑: 刘沛菡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 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

唐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国际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91）

摘要：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是为其亚太战略服务的，服从于其维持亚洲—太平洋霸权的深层次战略逻辑。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接过英国制造的所谓“西藏问题”，将其打造成兼具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效用、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的工具。从地缘政治看，美国炒作所谓“西藏问题”，旨在从西侧对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进行空间挤压，同时利用印度的地缘政治观使其在安全诉求上向美国靠拢。从意识形态看，美国企图借助第十四世达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抹黑中国国际形象，提升美国打压中国的“道义正当性”。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美国政府正抓紧为“后达赖时代”布局，以地缘安全、宗教和人权、水资源等问题为借口，将涉藏政策有机融入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之中，使之成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对达赖集团的资金援助大幅度提高，与“藏独”分子及印度政府的三边互动日益频繁。鉴于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呈现新趋势，中国需加强系统应对。

关键词：中美关系；美国；涉藏政策；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战略竞争

中图分类号：D822.371.2；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1-0135-14

二战结束后，作为域外国家的美国为了建立和维持亚太地区霸权地位，利用所谓“西藏问题”

DOI：10.13946/j.cnki.jcqis.2024.01.010

作者简介：唐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政治战新态势及其对我国影响与对策研究”（20CGJ030）

引用格式：唐健.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35-148.

向中国施加地缘政治压力，将印度捏合进平衡中国的政策框架，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对所谓“西藏问题”进行了明确的批驳，指出这“根本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而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遏制中国、分裂中国、妖魔化中国的问题”^[1]。2018 年和 2020 年美国国会分别通过所谓“对等进入西藏法案”和“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并由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这意味着在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最大地缘政治对手”^[2]、着手推进“印太战略”以重组地区秩序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和战略界正围绕所谓“西藏问题”发力。本文尝试从美国维持亚洲—太平洋霸权的深层次战略逻辑出发，考察其炒作所谓“西藏问题”的动机与目标，详细梳理美国推行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涉藏政策，以期对理解美国的行为逻辑以及如何更好地应对提供一定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转向竞争^[3]。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中国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展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影响范围，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重组地区秩序。”^[4]在此基础上，美国国防部 2019 年推出的《印太战略报告》妄称：“国家间战略竞争，主要内容是自由和压迫性世界秩序图景之间的地缘政治较量，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通过军事现代化、影响力行动，以及经济胁迫等方式寻求重组地区秩序。”^[5]拜登政府继承、调整和发展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拜登政府的《美国印太战略》文件在地缘政治竞争框架内充实了更多有关“多边”制度和价值观的内容。可见，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有着明确的地缘政治重心（亚洲—太平洋），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政策框架（“印太战略”）^[6]。综合来看，美国“印太战略”兼具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目标，包括重建地区权力平衡（即确保美国主导地位）、重组制度体系、强化“自由和开放”的价值观等^[7]；实施手段既有对中国直接采取对抗行为（如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等），也包括在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盟友与伙伴共同行动。

战略手段和目标需要“问题”作为支点来贯彻和实现，比如贸易、南海、东海、台海和科技等。所谓“西藏问题”是美国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对中国施加压力的重要载体，学术界对此已经展开了一些研究。有学者对特朗普和拜登时期美国涉藏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指出“美国对中国西藏事务的干涉总体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8]。另有学者对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国内政治动因进行了研究，认为府会关系对立程度和涉藏议题热度是影响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主要变量^[9]。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智库课题组以美国“2020 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为分析对象，指出其内容表述中的偏见与谬误，揭露该法案背后掩盖的逻辑错误与险恶用心^[10]。有研究指出，《纽约时报》建构的“虚拟西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东移背景下平衡与遏制中国的“武器化”话语^[11]。还有研究基于法律和外交的复合视角梳理和审视美国的“涉藏立法”，揭示了“涉藏立法”行为及内容的非法性^[12]。

总体来看，现有成果尚未将美国涉藏政策置于其对华战略竞争的整体框架中加以深入分析，因此对美国操弄所谓“西藏问题”的深层次动机、运作手段和未来趋势的讨论还不够充分。本文第二

部分将从美国亚洲—太平洋的秩序观出发, 结合盎格鲁—撒克逊的地缘政治思想, 分析所谓“西藏问题”如何产生, 美国又是如何从英国手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话语框架”, 将其打造为冷战时期遏制中国的“武器”。第三部分将分析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是如何加大对所谓“西藏问题”的介入并尝试将其捏合进“印太战略”。本文最后一部分对美国涉藏政策趋势进行评估, 并简要分析中国应对之策。

二、美国操弄所谓“西藏问题”的战略逻辑: 思想渊源与历史实践

美国对所谓“西藏问题”的兴趣与其建立亚洲—太平洋霸权的图谋密不可分。从20世纪初开始, 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一直有两个核心目标: 第一, 不允许该地区出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强国^[13]; 第二, 致力于美国价值规范的传播, 构筑所谓“开放社会”, 本质是确保美国可以从市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 对该区域国家与社会实施干预^[14]。因此, 美国亚太战略的考量一直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混合, 两者高度互补: 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前提, 后者保证一旦有“强国”浮现, 美国能够构筑起稳固的联盟体系来实施“离岸平衡”或直接对抗^[15]。在美国的这种战略逻辑下, 所谓“西藏问题”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 “抗俄遏中”的地缘战略思想与所谓“西藏问题”

所谓“西藏问题”要放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拓殖全球的地缘战略中加以考虑。这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地缘政治理论, 为了对抗“心脏地带国家”(即“抵抗俄罗斯”)和规锁“陆海复合型国家”(即“阻遏中国”)而特意制造出来的“战略武器”。19世纪末, 美国经济总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 阿尔弗雷德·赛尔·马汉的学说为即将到来的“美国世纪”做了理论准备^[16]。马汉将东亚—太平洋作为美国前进的主要方向, 认为能影响该地区权势平衡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对于中国, 马汉的地缘战略构想区分了两种情况: 一种是如果中国没有被有效组织起来, 那么对海权国家最大的威胁就是俄罗斯。美国和英国需要与德国、日本等海上强国联合起来, 同俄罗斯(陆权)竞争以获取优势地位。马汉认为印度在地缘政治上对海权非常重要: “印度在临近程度和结构上都最适合于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 也最适合于在俄罗斯前线延伸的漫长边界线的两端实施军事行动。印度的陆地和中心受到阿富汗和喜马拉雅山脉的保护, 其两翼被作为后方而弃置一边, 因为它们是无法攻破的, 只要其海军保持优势。”^[17]

中国西藏地区由此进入盎格鲁—撒克逊地缘学说的视野, 被纳入战略实践的“棋盘”。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指出了中国西藏地区的地缘价值: “这一屏障的功效, 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极地冰块以外, 在世界上或许是无与伦比的。”^[18]因此, 英国将中国西藏视为保护印度安全的外围屏障。由于清朝时期中国实力衰颓, 英国并不认为印度会受到来自西藏方向的“安全威胁”。但是,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 在英俄角逐中亚的“大博弈”背景下, 时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认为“俄国人想在青藏高原立足”。1903年, 英国军官荣赫鹏率军入侵西藏, 英国人开始炮制出所谓“宗主权”概念, 试图将中国西藏在实质上纳入英印的势力范围^[19]。

美国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实施的是“门户开放”政策, 即维持列强在华势力大致均衡, 以使美国能够共享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利益^[20]。因此, 美国政府对西藏的态度与英国不同, 它能够接受英

国以阻止俄罗斯陆权扩张为由而在西藏攫取的特殊利益，但是不认同英国将中国西藏地区独占为势力范围的计划。1904 年 6 月，在荣赫鹏即将攻入拉萨之际，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指示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H. 乔特提醒英国政府，英国实际上曾经多次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美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十分关注中国的领土完整，不能同意印度政府所谓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只不过是‘法律上的虚构’，是‘政治上的矫饰’的说法”^[21]。

马汉设想的另一种情况是中国将自身广袤疆土和庞大人口组织起来。虽然马汉认为如此巨大人口规模的中国被“唯一的精神所鼓舞”，创建高效的政治组织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他还是想象式地描述了“一个崛起的中国对于美国霸权图谋的挑战”^[22]。他认为要想规避这种“挑战”，海权国家必须延迟中国建立有效政治组织的时间，直至使中国“最终接受西方的教化影响”。他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果能推进中国“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分割，那也很可能是有益的，不仅有益于国家的内部管理，而且有益于世界范围内的整体政治平衡”^[17]。在这种逻辑下，美国以打“西藏牌”遏制中国，正符合马汉的战略意图。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更加凸显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斯皮克曼认为“心脏地带”之所以能够挑战海权国家，原因在于边缘地带即西欧和中国的衰落，从历史上看真正能够对海权构成“致命威胁”的是强盛的边缘地带国家，比如法国、德国。它们是陆海复合型强国^[23]，既能向欧亚内陆即“心脏地带”挺进，又能发展强大的海军，动摇海权国家经略世界的根本。基于“边缘地带论”的构想，斯皮克曼在美日激战正酣的 1942 年就提出，美国不能在战争中彻底摧毁日本，因为战争结束后，美国很快就会发现中国才是自己在该区域“最大的竞争对手”。他声称：“它的地缘位置将类似于美国之于中美洲。当中国变得强大，它在该区域的经济渗透无疑将带有政治含义。完全有可能设想有一天，这片水域将不再由英国、美国或日本的海上力量控制，而是由中国的空中力量控制。”^[24]可见，美国恐惧的不是真实的中国，而是其地缘战略理论透镜折射出来的自己。二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美国在思考如何与这样一个中国打交道时，继续将陆海复合的地缘位置作为重要切入点。

（二）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战略与涉藏政策实践

二战结束后，美国人接过了英国人制造的所谓“西藏问题”，将其与海权优势相结合，成为冷战时期美国从东西两个方向对中国施加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压力的重要抓手。与马汉所诬称的“中国威胁”即庞大的资源基值和不同于美国的文明形态相呼应，美国驻印度代办乔治·梅雷尔在 1947 年 1 月 13 日致信美国国务院，向其论证西藏兼具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双重战略重要性。梅雷尔声称，如果印度、缅甸、东南亚和中国等出现“敌对”政府，美国有了再次武装介入亚洲事务的必要性，那么西藏将会成为很好的军事基地，“可能是唯一可以进行空中和火箭发射行动的广阔领土”。他妄称，除了“军事潜力”外，西藏的意识形态地位也非常重要：鉴于藏传佛教的存在，控制西藏“可能会抵消共产主义活动在亚洲许多地区的影响，因为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延伸到西藏边界以外的追随者”^[25]。时任美国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给梅雷尔的复信中质疑了中国西藏的“军事价值”^[26]。

但是，随着共产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占据优势，制定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人物们开始调整涉藏政策。1949 年 7 月 2 日，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在给国务卿的电报中写道：“（a）随着共产主义中

国的胜利，西藏对于亚洲非中国部分的重要性在上升；因此我们如果在拉萨有自己的观察员将会握有优势；（b）按照我们的观点，美国不能继续忽视这个将会在未来亚洲事务上扮演更加重要角色的地区的人民；（c）如果我们的观察员以合适的方式成功地为我们西藏人中建立友好情感的话，将会是极其有用的；（d）如果我们想与西藏建立非正式关系，现在看起来是合适的时机，我们显然不能通过无能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西藏建立联系，而且此时我们与其他政府（指共产党）也没有联系。如果我们与对中国实现有效控制的政府建立联系，那么事情将会变得更加困难。”^[27]同日，艾奇逊给亨德森复电表示：“国务院正在评估美国涉藏政策，达成共识后会通知您结果。”^[28]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美国在中苏之间植入“楔子”的计划失败，美国的涉藏政策也出现了重大转变。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发表声明称：“我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地区的攻击。”^[29]东线形势的变化让美国和印度更加迫切考虑如何利用西藏做文章。7月15日，亨德森向国务院报告称：“印度已经交付了西藏人所需要的全部武器（但是没有提供更多），后者表示满意。我们同时得知印度在江孜的军事训练团得到了加强。”亨德森向西藏反动上层的代表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原则上准备提供援助，大使馆接到指示要获取具体需求的细节，讨论交货的方法和路线等。”^[30]

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24日昌都解放，25日志愿军发起了抗美援朝的第一场战役，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点说明中国也充分考虑了安全形势的东西联动特征。1951年5月23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认真协商和充分讨论，在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宣告西藏的和平解放。在此之后，美国仍然不断鼓动第十四世达赖公开否认和撕毁《十七条协议》，以便美国在国际上制造所谓“西藏问题”，利用达赖的宗教影响力和西藏的地缘位置，破坏中国稳定形势，扰乱中印关系。美国方面声称：“我们把西藏政府否决协议看成是美国援助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前提，这也是唤醒印度危险在即的前提。”^[31]

1959年，十四世达赖集团武装叛国，解放军很快平息叛乱，顺利推进民主改革。美国利用西藏军事地缘价值扰乱中国的企图破灭^[32]。但是由于印度继承了英国的地缘安全观，试图将西藏作为中印之间的所谓“缓冲地带”^[33]，这给美国利用所谓“西藏问题”扩大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影响力，从西面制衡中国提供了“动力”。美国不断教唆印度在所谓“西藏问题”上“承担更大责任”，并向在台湾的蒋介石当局施加压力，企图在东西两线同时制造地缘政治麻烦。1959年4月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给在台湾地区的“代表”发电报称：“事情现在进展顺利，印度公众舆论迫使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采取了更加直截了当的立场以支持西藏抵抗”，台湾方面“现在能做的最有用的贡献是重申并阐明关于西藏自决的承诺”^[34]。

美国支持达赖集团的另一行径是训练其政治和国际传播能力，用来抹黑中国国际形象。美国方面非常清楚，当中国政府通过彻底铲除农奴制、发展生产带来西藏繁荣和赢得民众衷心拥护后，美国 and 达赖集团所有的无理指控都会不攻自破。因此，他们需要重塑达赖集团的“形象”，把所谓“西藏问题”与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相结合，打着“自由”和“人权”的名义美化达赖集团分裂国家的行径，从而抬升“西藏牌”的战略价值。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和执行主任的欧内斯特·A. 格罗斯，在1959年成为第十四世达赖的顾问和游说代表。他教唆达赖集团建立所谓“海外办事机构”，声称这样可以保持“藏独”势力在政治层面的热度。1964年，所谓“西藏办事处”在纽约和日内瓦

设立，前者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后者为国际难民和人权活动中心。这种炒作行径推动了分裂分子的政治鼓动和意识形态宣传，而办事处的设立与运行均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指导与资金支持^[35]。1964 年在对中央情报局（CIA）的西藏行动进行评估时，美国国务院声称：“CIA 的西藏活动包括政治行动、宣传和准军事活动。现阶段项目的目标是保持西藏自治这样一个政治概念在西藏和国际社会，尤其是印度仍然处于活跃状态，在中国内部建立抵制可能的政治发展的能力。”^[36]

从所谓“西藏问题”产生和延续的历史看，英美对中国西藏的兴趣根植于他们维持世界霸权的需要。在英国霸权时代，中国西藏地区被视为阻止“心脏地带国家”威胁英属印度、南下印度洋的屏障。二战结束后，美国接手并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西藏问题”，以满足“反华（地缘政治）反共（意识形态）”的需要。前者是指将所谓“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美日同盟等相结合，方便美国从东西两个方向给中国施加战略压力，甚至分裂中国。所谓“西藏问题”的存在使印度在安全需要上向美国靠拢，进而阻止中国的影响力向南亚和印度洋辐射。后者是指美国利用第十四世达赖攻击中国的宗教和人权政策，试图在中国国内制造不稳定，在国际舞台上抹黑中国形象。总之，所谓“西藏问题”是美国将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企图达到马汉等美国战略家所设想的“平衡中国权势”，以维持美国在亚洲—太平洋霸权的重要工具。美国从尼克松政府之后开始实施对华接触战略，但仍然将“西藏牌”握在手里。从特朗普开始，美国将中国确立为所谓“主要威胁”，所谓“西藏问题”开始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涉藏政策的演进：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

近年来，美国基于自身的亚太秩序观认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已经威胁到了地区力量平衡”，提出所谓“印太战略”作为其亚太战略的新版本。美国操弄所谓“西藏问题”的战略逻辑再次凸显，并在其中添加了新的内容。美国不少政府官员和政策研究者不遗余力运筹如何更好地利用“西藏牌”，激发其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价值，涉藏政策正在被全面融入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国国会推出的所谓“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等“法律”文件，成为所谓“西藏问题”在国际舆论场上发酵的重要推手，是聚合“藏独”分子、战略研究学者和行政官员的枢纽。特朗普政府侧重将所谓“西藏问题”与“印太战略”挂钩。拜登政府则侧重搞联盟政治和“价值观外交”，其涉藏政策的内容更加繁杂、策略更加多样。

（一）特朗普政府：所谓“西藏问题”成为推行“印太战略”的重要载体

2021 年 1 月，任期即将结束的特朗普政府提前解密了有 30 年保密期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该报告声称：“因为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本质及目标不同，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会长期持续，一个强大的、与观念相同国家合作的印度是制衡中国的重要力量。”该报告声称，“印太战略”的重要目标包括：确保印度在安全问题上偏好的合作伙伴是美国；两国合作对于确保海洋安全和制衡中国在南亚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影响力至关重要；确保印度在南亚保持优势地位，在维护印度洋安全上占据领导位置；与东南亚国家加强接触，扩大它们与美国盟友及伙伴的经济和防务合作；美国与伙伴合作共同抵制“中国使用隐蔽或胁迫力量削弱其他国家主权的行动”。

特朗普政府认为所谓“西藏问题”与“印太战略”上述目标的适配度非常高，故不遗余力地进

行宣传炒作。

首先, 其认为可以增加中国维护国内和边境稳定的成本, 牵制中国发展, 消耗中国实力。曾经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和亚洲事务资深主管, 现为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亚洲资深副主席的迈克尔·格林妄称, “藏传佛教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合法性构成了挑战”^[37]。特朗普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将台湾、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分离主义者”列为中国的“七大恐惧”之一, 认为中国不会用军事手段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擅长使用“政治战”的方式塑造一种情势, 使得其他国家觉得对中国让步是明智的, 比如中国可能要求印度驱逐第十四世达赖在达兰萨拉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 让美国停止对达赖集团的经济资助, 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等^[38]。因此, 白邦瑞声称, 在中国不断削弱这些“牌”的战略价值的背景下, 特朗普政府应该主动利用“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当局、第十四世达赖和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中印边界分歧、韩国导弹防御系统和南海等问题与中国竞争, 并在博弈游戏中重塑它们的功效, 增加美国达成战略诉求的筹码^[39]。

其次, 其认为可以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 特朗普的高级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在日本演讲时, 曾经用盎格鲁—撒克逊地缘政治学说表达了美国对华鹰派所理解的“一带一路”倡议。他诬称: “19世纪和20世纪有三个伟大的地缘政治理论, 它们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一带一路’的大胆之处在于把三个地缘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 组成一个完整的计划。它结合了麦金德关于谁控制了中亚腹地, 谁就控制了世界岛; 谁控制了世界岛, 谁就控制了世界的理论。……‘丝绸之路’的扩张是要把中亚这些重要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用重商主义的市场模式真正把伊斯兰教政治统一到一个市场中去……‘一带’是马汉理论的产物, 这也是大英帝国和后来美国战略计划的基础, 就是把沿途的主要港口都连接起来。”^[40]这种基于狭隘地缘政治学说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曲解, 也产生了对涉藏问题的扩散效应。

最后, 其认为是抑制中国影响力空间扩散的关键一环。在“印太战略”视野中, 美国可以利用所谓“西藏问题”与印度、东南亚和西欧盟友及伙伴加强协调, 从而在中国东(台海)、南(南海、印度洋和水资源)、西(“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冲突)等方向都获得提升战略影响力的“爆破点”。《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在谈到如何支持印度时, 将中印边界分歧与水资源捆绑在一起, 声称“通过外交、军事和情报渠道为印度提供帮助, 解决陆地挑战”^[41]。美国还尝试将所谓“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结合起来, 企图通过“东西联动”施压中国。美国前外交官员帕特里克·孟迪斯等人评论说: “作为印太战略的一部分, 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12月签署了‘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和‘台湾再保证法案’。当特朗普白宫在2021年1月公布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解密版本后, 这些法案的意图已经清楚”, “通过这些立法, 华盛顿向中国传递了一个几乎不加掩饰的信号, 即美国正尝试在一种更广阔的印太计划之下, 将西藏和台湾问题与美印关系捆绑在一起”^[42]。

基于上述考虑, 美国政府显著加大了对达赖集团的支持:

第一, 加强涉藏“立法”, 试图用国内法为“以藏遏华”提供法理依据。2019年9月, 民主党众议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吉姆·麦克高文提出所谓“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2020年12月, 该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 经特朗普签署生效。该法案是对2002年所谓“西藏政策法”的修订与强化。与2002年的版本相比, 所谓“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从立法层面承认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 声称需要通过“多边主义”的渠道来推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第十四世达赖及其代

表或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无条件对话；声称因为藏传佛教在中国、不丹、尼泊尔、蒙古、印度、俄罗斯和美国都有影响力，因此美国需要寻求建立国际外交联盟来阻止中国政府“插手”第十四世达赖的转世问题。该法案还将水资源作为美国介入和炒作所谓“西藏问题”的重要切入点，鼓动建立新的或利用已有的地区框架，如“湄公河下游倡议”等，推动跨境河流相关国家合作，共同提高青藏高原水资源利用和开发的所谓“透明性”、污染治理能力和信息共享水平等^[43]。

第二，向达赖集团注入大量资金。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达赖集团的“国际活动空间”日益萎缩，资金受限，已然是穷途末路。印度有关媒体声称：“根据印度政府的数据，过去 7 年时间在印度的‘藏族难民’数量下降了 44%。从 2011 年的 15 万人下降至 8 万 5 千人。”^[44]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显著提高了对达赖集团的资助，企图帮助其稳固“基本盘”。2018 财年美国政府预算拨款 1 700 万美元，加上奖学金、国务院相关项目费用等，达赖集团该年获得了美国约 3 000 万美元的资助^[45]。相比之下，美国 2015 年度拨款只有约 300 万美元，2016 年约为 600 万美元^[46]。

下面，本文以所谓“西藏基金”为例对美国的“援助”与资金流向做简要分析（详见表 1）。所谓“西藏基金”在 1981 年成立于美国纽约市，在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表 1 中至少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美国联邦政府的拨款占所谓“西藏基金”每年经费的 90%左右。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资金支持是海外“藏独”活动得以持续的经济基础，美国始终把“西藏牌”攥在自己手中，所谓“西藏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美国问题”。第二，美国对所谓“西藏基金”的支持度与其对华政策密切相关。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美国总体对华政策是“适应”，因此对所谓“西藏基金”的支持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下降。但是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美国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所谓“西藏基金”的资金支持呈现上升态势。特朗普上台后，将中国正式确定为“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对手”，对所谓“西藏基金”的资金输入水涨船高，其中 2019 年的拨款达到高峰。第三，从 2016 年开始，所谓“西藏基金”开始加大对“社区发展”的投入，以应对达兰萨拉的人口流失和凝聚力下降等问题，企图巩固达赖集团的“基地”。

表 1 “西藏基金”的资金情况（单位：万美元）

年份	总资金	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	用于“社区发展”的资金
2008	346	319	14
2009	414	317	13
2010	388	341	14
2011	379	298	13
2012	374	330	43
2013	434	370	7.3
2014	531	460	12
2015	548	470	12
2016	596	530	39
2017	965	888	399
2018	919	849	573

唐健.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 135-148.

(接上表)

年份	总资金	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	用于“社区发展”的资金
2019	1 006	913	569
2020	814	664	171
2021	937	767	149
2022	973	824	284

注：资金指所谓“西藏基金”每年收到的未设定使用限制的捐赠；资料来源：“西藏基金”英文官方网站。

(二) 拜登政府：对所谓“西藏问题”的操弄更加系统和具体

特朗普政府开始重塑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意识地将所谓“西藏问题”融入“印太战略”。但是，特朗普政府更倾向基于硬实力的双边对抗，具体涉藏政策推进得较晚。比如，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从2017年1月开始一直处于空缺状态，蓬佩奥在2020年10月份才任命时任民主、人权和劳工局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担任此职位。拜登政府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时期“印太战略”的核心逻辑，加大了对西藏事务的干预力度。美国民主党擅长多边协调和“价值观外交”的特点显示了出来，所谓“西藏问题”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拜登政府在国内政策和人事安排上围绕所谓“西藏问题”采取了一系列行动。2021年3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20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在所谓“西藏地位”问题上，措辞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删除了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表述^[47]。2021年12月，印度裔外交官乌兹拉·泽亚被布林肯任命为所谓“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加上2022年1月任命的“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赛因，美国国务院目前至少有两名印度裔高级官员处理涉藏事务，意图方便与印度沟通与协调立场。泽亚宣称自己上任后的主要任务包括：推动中国中央政府与第十四世达赖或其代表进行无条件对话，处理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以及关注第十四世达赖的转世问题等^[48]。侯赛因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将中国作为所谓“重点批评对象”，声称西藏和新疆将会是自己工作的重点内容^[49]。

第二，在与中国的外交对话中，拜登政府从人权和宗教等角度切入所谓“西藏问题”，将其与新疆、香港和台湾捆绑在一起，明显表现出从东西两个方向对中国加强压力的意图。2021年3月，布林肯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上声称，中美在很多问题上存在“根本不同”，“包括中国在新疆、香港、西藏以及越来越多的针对台湾的行动，以及中国在网络空间的行为”^[50]。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纪要声称，2021年11月在与习近平主席的视频会议中，“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护其利益和价值观，并且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确保21世纪的规则能够促进一个自由、开放、公平的国际体系”，“拜登总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以及在更广泛的人权方面的做法提出了关切”^[51]。2023年11月，在中美元首会晤中，拜登继续对所谓“中国（包括新疆、西藏和香港）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切”^[52]。

第三，美国政府与达赖集团的关键人物频繁互动。2021年7月，布林肯访问印度期间会见了第十四世达赖的代表，预示着美国、印度和“藏独”势力正为应对“后达赖时代”的各种问题加强勾连。2022年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奎肯、参议院外

交关系委员会资深顾问迈克尔·谢夫、驻印度使馆参赞格雷厄姆·迈耶等，到达拉萨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头目边巴次仁见面^[53]。2022 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12 日，边巴次仁在德国、美国和加拿大窜访，其中最重要的是其美国之行。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库特·坎贝尔、泽亚、侯赛因等与其见面。“藏独”分子在美国卖力鼓噪宣传，说明达赖集团正试图抓住美国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契机，与美国一些学者、智库、社会组织和议员加强合作，突出所谓“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和价值，企图争取更多的援助和支持。此外，边巴次仁与在美国访问的捷克外长杨·利帕夫斯基见面，并在推特上进行互动，因此不排除美国为了进一步激发“西藏牌”的效用，推动某些国家在涉藏政策上采取挑战中国底线的做法。2022 年 5 月，在拜登出访韩国、日本的同时，泽亚率团抵达印度。5 月 18 日，泽亚前往达拉萨与第十四世达赖见面。泽亚的行程是对美国涉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与拜登的行程形成东西呼应。着眼面向“后达赖时代”，美国政府可能会更加频繁和密切地介入达赖集团的内部事务，以保持“西藏牌”的战略价值。

四、趋势与应对

自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下，西藏各族人民正与全国人民一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奋斗。但是达赖集团和国际上反华反共势力相互勾结，试图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设置障碍。我国需要在美国维护亚洲—太平洋霸权的地缘战略中研判其涉藏政策态势。

第一，美国不会轻易放弃“西藏牌”，将继续榨取达赖集团的利用价值。美国里根总统基金会暨研究所发布的 2023 年度《国防调查》发现，51% 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最大威胁”；相比之下，只有 24% 的美国人对俄罗斯持这一看法^[54]。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会继续将中国锁定为所谓“最大的竞争对手”，达赖集团仍然是美国用于动员国内和盟友支持以及给中国制造麻烦的一张牌。2023 年 11 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的所谓“法案”，声称美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企图继续为达赖集团造势^[55]。

第二，美国 2024 年大选结果将会影响其涉藏政策。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偏好上存在较大差异，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政党轮替会给出其对外政策带来变化^[56]。民主党倾向“多边主义”和“价值观外交”，重视盟友与伙伴的支持。共和党更倾向权力政治，偏好单边行动，因此往往会完成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型，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更多地从地缘政治和实力对比出发。如果特朗普或其他共和党候选人赢得大选，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和冒险的涉藏政策。

第三，美国政府正投入资源扶持达赖集团适应数字时代信息收集和传播的需要。2023 年，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发布了所谓“支持西藏组织提高基本自由、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公开招标项目，资助上限为 300 万美元。该项目声称，目标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民间社会组织平台”，在亚洲建立实体前哨，协调和提供有关所谓促进“西藏人权”以及打击所谓中国“虚假信息”方面的专业知识^[57]。可以预见，在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时代，围绕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舆论斗争将会越来越激烈。

面对美国的涉藏政策，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战略性应对。首先，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

唐健.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 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35-148.

同体意识。2021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强调: “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58] 其次, 做好网络舆论工作。网络已经成为全球信息流动的主要渠道。美国和达赖集团始终在与我争夺网络叙事主导权。我们要讲好西藏故事, 充分利用境内外社交平台发出正面声音, 提升国际涉藏议题话语权, 有效破解应对达赖去世转世问题上美国、印度、加拿大等国家可能联手制造对我国不利的国际舆论^[59]。最后, 敢于和善于斗争。所谓“西藏问题”关乎我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 对于美国的涉藏政策, 要敢于和善于斗争。一是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争取它们的舆论支持。二是统筹我国东西两个方向的安全形势, 破除美国“东西联动”制造麻烦的企图。三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看待所谓“西藏问题”, 坚定战略自信。对美国而言, 应该认识到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 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西藏牌”的利用价值将会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而日渐萎缩, 人为制造出来的所谓“西藏问题”终将消弭于无形。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 [EB/OL]. (2014-08-13) [2022-04-30]. http://www.scio.gov.cn/gxzt/dtzt/2014_23175/2014zgxfzlt/xzbps_23319/202209/t20220920_390773.html.
- [2] Lingling Wei. Blinken China Speech to Affirm Beijing as Main U.S. Rival [EB/OL]. (2022-05-04) [2022-05-06]. <https://www.wsj.com/articles/blinken-china-speech-to-affirm-beijing-as-main-u-s-rival-11651684767>.
- [3] 达巍, 蔡泓宇.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 50 年 [J]. 国际安全研究, 2022 (2): 3-46.
- [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B/OL]. (2017-12-18) [2022-05-01].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 [5]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 Region [EB/OL]. (2019-06-01) [2022-05-01].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 [6] 陈宇.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视域下的“印太”及其内在张力 [J]. 东北亚论坛, 2022 (2): 66-80.
- [7] Kai He. Three Faces of the Indo-Pacific: Understanding the ‘Indo-Pacific’ from an IR Theory Perspective [J].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018 (2): 49-161.
- [8] 郭永虎, 朱博. 从特朗普到拜登: 美国涉藏政策的动向、影响及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95-105.
- [9] 肖杰. 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国内政治动因研究 (1987—2020) [J]. 中国藏学, 2021 (1): 168-178.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智库课题组. 美国涉藏法案的谬误分析 [J]. 中国藏学, 2021 (3): 15-23.
- [11] 江灏锋. 霸权的傲慢与护持: 《纽约时报》涉藏报道 (2011—2020) 的话语分析 [J]. 中国藏学, 2022 (3): 189-199.
- [12] 孙舒. 美国“涉藏立法”的动因、效能与应对: 基于法律与外交的视角 [J]. 中国藏学, 2022 (5): 197-205.
- [13] Michael J.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 [14] Justin Rosenberg.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A Critique of the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Books, 1994.
- [15]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A Superior U. S. Grand Strategy* [J]. *Foreign Affairs*, 2016 (4): 70-83.
- [16] 徐弃郁. *帝国定型: 美国的 1890—1900*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17] 阿尔弗雷德·塞尔·马汉. *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M]. 范祥涛,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17.
- [18] 哈·麦金德. *历史的地理枢纽* [M]. 林尔蔚, 陈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61.
- [19] 恰白·次旦平措, 诺章·吴坚, 平措次仁. *西藏简明通史* [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7: 295-309.
- [20] 李庆余. *争取大国地位: 门户开放照会新论* [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1999 (1): 138-145.
- [21] 胡岩, 周新. *美国人眼中的旧西藏*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20: 29.
- [22] A. T.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7: 31-55.
- [23] 吴征宇. *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2): 38-50.
- [24] Nicholas John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469.
- [2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The Chargé in India (Merr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EB/OL]. (1947-01-13) [2022-06-09].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7v07/d496>.
- [2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é in India (Merrell)* [EB/OL]. (1947-04-14) [2022-06-10].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7v07/d497>.
- [2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IX,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EB/OL]. (1949-07-02) [2022-06-1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9v09/d1031>.
- [2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IX,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EB/OL]. (1949-07-02) [2022-06-1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9v09/d1032>.
- [2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ume VI, Editorial Note* [EB/OL]. (1950-06-27) [2022-06-13].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0v06/d195>.
- [3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ume VI,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EB/OL]. (1950-07-15) [2022-06-15].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0v06/d206>.
- [31] 梅·戈尔斯坦. *美国插手西藏问题* [J]. 程早霞, 宋伟, 译.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09 (6): 122-132.
- [32] Patrick Anders. *The CIA in Tibet, 1957—1969* [EB/OL]. (2021-11-09) [2022-06-15]. *Small War*

唐健.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 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35-148.

- Journal, <https://smallwarsjournal.com/jrnl/art/cia-tibet-1957-1969>.
- [33] 韩敬云, 王伟. 印度涉藏政策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取向 [J]. 南亚研究, 2020 (2): 68-85+153-154.
- [3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B/OL]. (1959-04-02) [2022-06-15].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9/d370>.
- [35] 温强. 肯尼迪政府联印制华与“藏独”活动的嬗变 [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4): 106-119.
- [3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XXX, China, Memorandum for the Special Group [EB/OL]. (1964-01-09) [2022-06-15].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4-68v30/d337>.
- [37] Michael J. Green. Tibet, Geopolitics,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s [EB/OL]. (2018-02-15) [2022-05-10]. <https://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documents/Michael%20Green%20Testimony.pdf>.
- [38]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6: 148-214.
- [39] Michael Pillsbury. Trump Can Stand Up to China Without Sparking War [EB/OL]. (2017-01-12) [2022-06-09].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rump-can-stand-china-without-sparking-war-19038>.
- [40] 滕建群. 三种地缘政治学说与“一带一路”倡议 [J]. 和平与发展, 2018 (5): 1-15+131+136-142.
- [41] The White House. 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EB/OL]. (2021-01) [2022-05-03].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IPS-Final-Declass.pdf>.
- [42] Patrick Mendis, Antonina Luszczkiewicz. The Geopolitics of Water and the New Indo-Pacific Strategy [EB/OL]. (2021-03-22) [2022-03-10].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https://hir.harvard.edu/geopolitics-of-taiwan-and-tibet/>.
- [43] Subtitle E-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of 2020 [EB/OL]. (2020-12) [2022-06-08]. <https://savetibet.org/wp-content/uploads/2020/12/TPSA-bill-text-from-consolidated-spending-bill.pdf>.
- [44] Anubhuti Gaur. Citizenship Woes & The Greater Cause: Crisis of Tibetans in Exile [EB/OL]. (2020-12-04) [2023-11-10]. oneindia, <https://www.oneindia.com/feature/citizenship-woes-the-greater-cause-crisis-of-tibetans-in-exile-3184933.html>.
- [45] 美国国会拨款三千万美元用于援助西藏境内外项目 [EB/OL]. (2018-03-24) [2022-04-30]. <https://cn.vot.org/2018/03/24>.
- [46] 王山. 美国国会批准给境内外藏人 1 700 万美元援助经费 [EB/OL]. (2018-03-25) [2022-04-20].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https://www.rfi.fr/cn/中国/20180325>.
- [47]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2020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 [EB/OL]. (2021-03-30) [2022-06-02].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0-country-reports-on-human-rights-practices/>.
- [48] Interview: US “Deeply Concerned” by China’s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ibet [EB/OL]. (2022-01-13) [2022-06-04]. Radio Free Asia,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abuses-01132022162722.html>.

- [49] Indian American Diplomat to Make China Accountable for Treatment of Minorities[EB/OL]. (2021-10-27) [2022-06-05]. The Quint, <https://www.thequint.com/us-nri-news/indian-american-diplomat-to-make-china-accountable-for-treatment-of-minorities#read-more>.
- [50] Nahal Toosi, Natasha Bertrand. “Fundamentally at Odds”:China, U. S. Retreat to Their Corners after Alaska Talks [EB/OL]. (2021-03-19) [2023-04-10].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3/19/china-usa-alaska-477267>.
- [51] 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 拜登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习近平主席视频会晤纪要 [EB/OL]. (2021-11-16) [2022-03-09].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readout-of-president-bidens-virtual-meeting-with-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cn/>.
- [52] 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 乔·拜登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纪要 [EB/OL]. (2023-11-17) [2023-12-02].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readout-of-president-joe-bidens-meeting-with-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2/>.
- [53] US Delegation Visits Kashag Secretariat of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EB/OL]. (2022-04-21) [2022-06-06].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https://tibet.net/us-delegation-visits-kashag-secretariat-of-central-tibetan-administration/>.
- [54]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Foundation and Institute. Reagan National Defense Survey [EB/OL]. (2023-11-30) [2023-12-02]. <https://www.reaganfoundation.org/reagan-institute/centers/peace-through-strength/reagan-national-defense-survey/>.
- [55] Business Standard. US House Committee Approves ‘Resolve Tibet Act’ for Tibet-China Dispute [EB/OL]. (2023-11-30) [2023-12-02].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world-news/us-house-committee-approves-resolve-tibet-act-for-tibet-china-dispute-123113000076_1.html.
- [56] Colin Dueck. Hard Line: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57]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DRL Notice of Funding Opportunity (NOFO): Supporting Tibetan Institutes Promoting Fundamental Freedoms,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EB/OL]. (2023-03-20) [2023-11-20], <https://www.state.gov/drl-supporting-tibetan-institutes-promoting-fundamental-freedoms-human-rights-and-religious-freedom/>.
- [58] 习近平在西藏考察时强调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N]. 人民日报, 2021-07-24 (1).
- [59] 朱德涛, 邓妮. 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藏传佛教因素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1): 189-200.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 [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年第1期 总第43期 第8卷

双月刊 2024年1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微信公众号

定价：20.00 元

统一
战
线
学
研
究

二
〇
二
四
年
第
一
期
（
总
第
四
十
三
期
第
八
卷
）